



12军/12军

3军和49军

决战扶眉

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历史与军事学研究中心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第一章

毛泽东决定调兵西北

1949年5—7月，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八百里秦川爆发了一场大战。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称之为陕中战役和扶眉战役，台湾方面的战史称之为关中全会。

如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国共两党在全国的战略决战，那么陕中战役和扶眉战役则是国共两党在西北的战略决战。

曾几何时，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与青海马步芳和宁夏马鸿逵的联军，是多么的“唇齿相依”，多么的骄横一时，多么的不可一世！

然而，经过决战，胡宗南主力被歼，二马北撤，胡马联盟被彻底粉碎。

听到这一胜利的消息，西北解放区军民欢欣雀跃；毛泽东来电祝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扶眉战役结束的第二天不仅没有反对加餐，而且吃得是那么甜、那么香！

西北大决战的胜利，离不开第一野战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更离不开毛泽东及其将帅们的运筹帷幄。

将帅协谋，规划增兵西北路线图

1945年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美军密苏里号军舰上，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同盟国正式投降，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结束。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纪念日。

然而，抗战的胜利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和平。听到日本投降的

消息，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中国人民经过八年全国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忧的是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存在。蒋介石正是依靠手中的强大军事力量，用大炮轰走了中国的和平鸽，撕毁了国共两党经过重庆谈判达成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于1946年6月26日发动了反G反人民的全面内战。与蒋介石武力灭G的愿望相反，中国人民解放军尽管只有127万人，国民党军有430万人，但经过两年多的作战，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逆转。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展开决定国共最后胜负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由于西北战场长期以来敌强我弱，西北野战军在全国战略决战中只能起牵制配合作用。这一特殊情况决定：只有增兵西北才能与胡马决战。于是，彭德怀盼望已久的增兵西北问题，在全国战略决战期间开始提上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

翻开档案，我们发现，确定增兵西北走由晋入陕的路线，还与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等人有关。

东野的林罗怎么管起了西北的事儿？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进入到全国战略决战阶段，各战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毛泽东手下的将帅们不仅能征善战，而且能够站在局部看战争全局，屡屡向毛泽东献计献策。毛泽东则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最终形成一幅幅作战蓝图，导演出一部部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创造出一个个战争奇观。

当时，从华北到西北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由晋入陕，经禹门口或风陵渡进入陕西，与西野合兵一处；一条是经呼和浩特、包头，沿黄河“几”字形的顶部西行南下，经银川在兰州附近与西野会合。

这两条路线毛泽东都考虑到了，但林罗主张放弃第二条。

要说明其中的原委，还得从中央军委的“亥文”电谈起。

到 1948 年 12 月中旬，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鏖战正酣：

在淮海战场上，从华中地区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黄维兵团被包围在安徽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刘汝明和李延年两兵团救援黄维兵团失败退回到淮河以南，杜聿明见大势已去率部从徐州西逃被包围在河南永城县的陈官庄地区，形成了解放军“吃一个（黄维兵团）、夹一个（杜聿明集团）、看一个（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的局面。

在华北战场上，由徐向前、周士第率领的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继续包围太原；由杨成武率领的华北军区第三兵团从绥远东进包围了张家口，由杨得志、罗瑞卿率领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北上包围了新保安，80 多万东北野战军正在入关，分割北平和天津地区之敌，傅作义集团马上就要成为“笼中之鸟”，毛泽东关于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就地歼灭的设想就要实现。

这一宏大的战争场面告诉世人：在决定国共最后胜负的全国大决战中，国民党即将失败！共产党即将胜利！

失败使蒋介石陷入绝望，胜利使毛泽东更加踌躇满志。

就在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邓小平全力关注如何尽快歼灭黄维兵团，林彪、罗荣桓全力关注分割平津地区之敌的时候，毛泽东则开始考虑战略决战胜利以后怎么办。

1948 年 12 月 12 日，一份由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亥文”电，放在了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办公桌上。

这封电报的抬头是“刘陈邓，粟谭”。当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是淮海战役总前委常委，一起住在中野司令部，而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华野司令部，住在别的地方。军委只把电报发给了刘陈邓，没有发给粟谭，并要粟谭到总前委开会时，由邓小平负责给粟谭一阅，阅后焚毁，保守机密；如果粟谭不能分身，则由刘伯承到粟谭指挥部征询意见，之后带着总前委

的意见到中央商谈战略方针。

这封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华野和中野于淮海战役后协力经营东南地区；东北野战军于平津战役后经营中南地区。

华北主力协同东北我军夺取平、津、张、唐后，如那时太原尚未攻下，则协力夺取太原，然后以杨罗、杨成武两部夺取绥远、宁夏，与彭贺会合。徐周兵团则早日与彭贺会合，先肃清兰州、潼关线上及以南以北诸敌，并夺取潼关、西安、天水、汉中诸城，然后入川。

这封“亥文”电关于西北战场透露了4条重要信息：一是太原战役后，华北的3个兵团都要加入西北战场作战；二是由华北增兵西北的路线就是前面所说的两条；三是华北第一兵团协助西野作战胜利后，还要南下四川；四是电文还特别提到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贺龙，这说明军委对贺龙将另有任用。

林罗之所以主张从华北增兵西北的道路由两条变成一条，这又起因于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兼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等人的一个建议。

平津战役开启后，杨成武兵团到了东边，西边的绥远（以呼和浩特和包头为中心的内蒙古中部地区），只剩下了由姚喆率领的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其任务是监视归绥（今呼和浩特）的董其武部。而姚喆的第八纵队不到1万人，董其武部则有4万之多。为防止董部逃跑，1949年1月15日李井泉等致电中央军委：

我们建议在攻占天津后，北平未下前，即抽一个纵队秘密行动，配合八纵急占包头，截断归绥敌西逃道路，以主力控制归绥附近，骑兵控制归绥，因此监视归绥之敌，以待主力到达攻歼之。

按照李井泉等人的建议，平津战役后，解放军还要分兵一部赴绥远作战。这与毛泽东南北两路包抄西北之敌的想法不谋而合。

17日，中央军委将这一建议转告林彪、罗荣桓及华北第三兵团

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天焕征求意见。

这时，新保安、张家口和天津已被攻克，北平傅作义的 25 万军队被百万解放军包围，双方就和平解放北平问题展开最后谈判。在此形势下，18 日林彪、罗荣桓复电中央军委：

攻北平兵力已足，三纵抽往绥远无影响。

我军如由东往西歼灭绥远、宁夏等处之敌，敌则节节后退，甚难达到歼敌目的。绥远之敌逃跑的可能性尤大，在北平、大同、太原之敌歼灭后，宁夏敌亦可能西退，即令不退，对我亦无重大威胁。故我们意见，绥远、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五省目前暂时不管，待西安打下后，以我军之某一部配属一千辆汽车及集中尽可能的骑兵占领兰州，由西向东歼灭宁夏、绥远之敌，然后解决青海、新疆之敌。

如由单纯步兵由东向西近逼，则敌有广大之后方回旋地区，使我军到处扑空，则收效甚小，愈向西敌之骑兵愈多，非单纯步兵所能解决。

尽管林罗的 1000 辆汽车如何如何，显得有些财大气粗，但他们主张放弃沿黄河“几”字形追击的建议，还是颇有几分道理。

杨成武、李天焕也表示，绥远守军达 4 万之多，即使派一个纵队西去，也很难不使西逃。

有鉴于此，19 日中央军委复电林罗：

同意你们暂不派兵去绥远的意见。

中央军委决定不再派兵去绥远以及后来傅作义等人对解决绥远问题的意见，直接催生了“绥远方式”。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

2 月 22 日，傅作义一行来到西柏坡，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提出，希望绥远能保持现状。毛泽东则表示，绥远的军队及政府暂时维持现状，一个时期以后，再按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整编。

这样，除了“天津方式”（战斗方式）和“北平方式”（和平方式）之外，又产生了消灭国民党军残余的第三种方式——“绥远方式”——暂时搁置。

林罗的建议和“绥远方式”的产生，不仅意味着解放军不再出兵绥远，还意味着华北各兵团进入西北的路线只能是由晋入陕。

增兵西北的路线图就这样确定下来！

美国出兵怎么办？

大决战不仅使毛泽东踌躇满志，也使林彪、罗荣桓等兴奋异常。

到1948年12月24日，在淮海战场上，黄维兵团被全歼，只剩下杜聿明部；在华北战场上，杨罗兵团攻克新保安，全歼傅作义的嫡系——郭景云的第三十五军，张家口守军突围逃跑，杨成武兵团和东野第四纵队正在展开追歼。

在胜局已定的形势下，林彪、罗荣桓也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他们先是消灭了东北的卫立煌集团，现正与华北第二、第三兵团一起消灭华北的傅作义集团，眼睛却开始盯上西北的胡宗南集团。可谓“吃了一个，正吃一个，又盯上一个”。

为抓住胡宗南集团，1948年12月24日11时，林彪、罗荣桓致电中央军委：

平津和太原敌人，全部歼灭，已成肯定的问题。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防西安敌人逃走。因此，我们建议我西北野战军立即迅速全力插到西安以南，断敌退路。我徐向前部全力向西安前进与彭会合，我杨得志部立即出发向太原前进，接替徐的围城任务（但徐主力可先走）。杨成武部待追击战结束后，亦转向太原前进。我东北部队待解决平津敌人后，以一部兵力、火力协助两杨攻太原。为了使西安敌人不过早逃跑，建议对杜聿明兵团的攻击等待我北面大军转到西安以南后，再开始打。

这时，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高岗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也来到了东野司令部。因此，林罗在电报的最后说：

高聂均在我处，他们均主张这样作，请军委考虑。

林罗的建议，可谓雄心勃勃。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由东野进入西北与毛泽东“亥文”电的精神不符。毛泽东是想让东野于平津战役后进军中南，消灭白崇禧集团，林罗却自己提出要消灭胡宗南集团。如果按林罗的意见，整个战略部署就要重新调整。二是，林罗等高估了西野的实力。

东野于辽沈战役后兵强马壮，光野战军就有 80 多万人，其 1 个军就下辖 4 个师、每师 1.5 万人共 6.5 万人。至于炮兵、铁道兵等特种兵建设，更是走在了全军的前列。与东野相比，西野的确相形见绌，但两者所处的生存环境不同，又没有可比性。

说起来，西野有 7 个纵队，但姚喆的第八纵队远在绥远，第七纵队和另外两个旅在太原前线，第六纵队只有两个旅，彭德怀实际指挥的西野从番号上看是 5 个纵队，实际兵力如果按 1 个军辖 3 个师计算只有 4 个纵队 9 万余人。以这 9 万人到陕南去切断胡宗南集团的退路，几乎不可能。

所以，中央军委于 12 月 24 日 22 时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

胡宗南尚有二十八个师，十五万八千人，又有青海回军（战斗力较强）在陇东配合，胡军退川退鄂亦尚未定。西北我军实力弱于胡军，更弱于胡马联军，因此目前不能切断其退路，即增加徐向前部亦无此可能，只有杨得志、杨成武、徐向前三部齐去才有此可能。蒋介石整个部署亦尚未定，如以胡军调京沪，则四川门户洞开，如以胡军守川，则他将以西安为第一线，不会轻易放弃西安，故目前不要忙于去包围胡军。

兹将亥文致刘陈邓、粟谭电发给你们，请你们会谈一次，由罗高

以你们共同意见带来中央。

林罗的建议虽然就此作罢，但他们点到了西野的痛处。这就是西野缺兵，这是不争的事实。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各战略区纷纷派出大员，到西柏坡参加中央于1949年1月6——8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刘伯承、陈毅、罗荣桓、高岗外，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也出席了会议。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党内指示。这个指示要求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夏秋冬三季，要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9个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

不言而喻，解放这9个省的具体任务分工是：东北野战军解放湘鄂赣3省；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解放苏皖浙闽4省；西北野战军解放陕甘两省。

如果把这个指示与中央军委过去的电报加以对比，就不难发现，解放军在1949年的任务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比如，1948年12月12日的“亥文”电曾要求东野在1949年不仅要解放湘鄂赣3省，还要解放两广，但在这个指示中“两广”却没有了。

毛泽东之所以要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步伐慢一点，稳一点，目的只有一个——防止美国出兵。

抗战胜利后，美国对华采取了“扶蒋反G”的反动政策。但事与愿违，美国政府做梦也没有想到，从1947年1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离华返美算起，整整两年时间中国就要江山易主了！蒋介石政府的失败宣告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破产！

尽管如此，在蒋介石政权行将覆灭之时，美国会不会替蒋介石大打出手呢？这是毛泽东必须考虑的问题。

其实，在毛泽东看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用 358 万人民解放军去消灭 146 万国民党军残余，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防止美国可能的军事干涉，才是最大的战略问题！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向全党指出：

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

对任何强敌，毛泽东从来都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重视敌人。他之所以把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东北野战军从沪宁杭地区开始，由东向西一字排开，呈梯次配备，目的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准备对付美国可能的军事干涉。

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战略安排，是遵循了一切都要从最困难情况出发的指导中国革命的原则。1945 年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就估计了可能遇到的内战爆发、几块大的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占去以及由于外国军事干涉中国将变成希腊等 17 种困难。即使到了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更加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因为中国革命长期而复杂，革命的敌人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都可能随时发生，只有坚持一切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并预有准备，才能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不会在阴沟里翻船，才能使中国革命的航船顺利地抵达胜利的彼岸。

这正是毛泽东作为大战略家的过人之处。

渡江战役开始后，毛泽东密切注视美国的动向。因为沪宁杭地区特别是上海，为美国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美国为维护其利益，在

解放军攻占上海时实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也最大。

然而，就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第三天，1949年4月26日美国驻上海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撤到了吴淞口以外。英国军舰也跟着美国军舰撤出了吴淞口。整个上海战役期间，美国一点动静都没有。由此，美国实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相对减小，毛泽东摸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底。

“敌变我变”。以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为标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把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的任务由原来解放9个省扩大为解放17个省，新增加了8个省。其中，第一野战军（由西北野战军改称）增加了宁青两省，第二野战军（由中原野战军改称）改向西南进军，解放川黔滇康4省，第四野战军（由东北野战军改称）增加了两广。

我们说帝国主义对华实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相对减小，并不是说从此就没有了、消失了，它可能随时到来。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帝国主义要对华实行武装干涉，又必须借助中国内部的反动力量作为内应。因此，中央军委指出：

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

第一野战军在1949年的任务扩大为解放陕甘宁青4省，这既是为了迅速解放大西北，同时也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可能的武装干涉，任重而道远。

而要完成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第一野战军就必须彻底打败胡马联军，解决制约西北战场的瓶颈问题。而要解决这一切，第一野战军就必须扩大建制——增兵！

西北野战军几乎变成了“川军”

提到增兵西北，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增兵西北？

答案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西北我军实力弱于胡军，更弱于胡马联军”。西北野战军除王震的第二纵队超过了两万人，多数纵队是1万多人，最少的纵队只有七八千多人。所以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9万余人，只相当于战略决战后华北1个兵团的兵力。当然，这9万多人中不包括在太原前线的第七纵队和另外两个师以及在绥远的第八纵队。而胡马联军则有30多万人。要想迅速消灭胡马联军，就必须增兵西北。

谈到这里，人们不禁还要问：为什么长期以来西北野战军发展缓慢？原因何在？

答案很简单：这是由陕北的特殊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

打开中国地图，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处于黄河的“几”字形之内。这里水土流失严重，地瘠民贫，人口稀少，人力物力资源匮乏，兵源严重不足。况且，陕北解放区北面是驻榆林的邓宝珊部，西面是马家军，南面是胡宗南集团，东面是黄河，人口只有150万。陕北解放区的人口基数，决定了西北野战军的兵员不可能太多，否则是养不起的。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块解放区，还遭到了胡宗南大军的毁灭性摧残。

1947年3月，蒋介石令胡宗南率34个旅23万人发动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蒋的如意算盘是：进攻陕北，摧毁中国共产党的神经中枢，或驱逐人民解放军总部东渡黄河进入华北，同时发动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迫使华东野战军北渡黄河，然后与解放军主力在华北决战，最后再出兵东北，结束中国战事。

在敌人的重点进攻之下，陕北解放区的全部县城和大部乡村均曾被敌侵占，人口锐减至20万。胡宗南的部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1947年5月1日，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习仲勋致电中央军委：

胡军所到之处，木器、门板大部烧光，牲畜杀光，一切工具均损坏，壮丁抓走亦不少，与日本三光政策同。人民损失五年难以恢复。

经济状况的恶化，直接影响到了部队的作战，导致了个别部队在陇东战役中发生了不抓俘虏而争抢战马的现象。1947年6月5日午时，彭德怀、习仲勋致电第二纵队和教导旅：

在二十九日来看，三十日以两个团围城，集中六个团打援，且是事先伏击，是日援敌仅骑兵四个连，即每连以二百五十人计亦不过千余人，我则十倍于敌，此敌未能歼灭，未俘一兵一官而获马近二百匹，如说战术上未截断归路，又获大量战马，是否因争马而致敌兵逃脱。

彭习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在饿肚子打仗的情况下，抓到马家军的俘虏既不容易争取还要吃粮，抓到战马则既能驮伤员又能驮装备，还可以杀掉果腹充饥。这种一时的个别现象，是战争的残酷性使然。

为支持西北战局，1947年7月21——23日，中共中央前委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陕北要以晋绥为战略后方，将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以贺龙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同时调习仲勋离开野战军回后方工作，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解放区，全力保障西北野战军作战。

然而，晋绥解放区除了相对稳定之外，自然条件与陕北几乎是一样的，也不能提供太多的人力物力支援。1947年一年，晋绥的战勤任务就“超过抗战八年的总和。在榆林作战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全部动员背粮，仅临县，三个月就动员了六十九万人次，其中妇女占三十二万人次。”“有个民夫赶了6头毛驴，从晋绥李家塔运粮到黄河边磧口，因来回花费返回时卖掉了5头毛驴。”可见，西北野战军吃粮有多么不容易。

西北解放战争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

毛泽东也曾试图把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从晋南调赴西北战场，直接协助西野打开局面。但陈谢纵队再加上民工就有5万人，牲口1000余匹，日需粮食2万公斤，马料2000余公斤，草5000余公斤。当时，陕北正遭遇旱灾，如果陈谢纵队长期在西北作战，给只剩下几十万人口的陕北所造成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为了协助西北打开局面，同时为了支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小河军事会议才决定陈谢纵队由渡黄河西进改为渡河南进，挺进豫西。

西府陇东战役后，为进一步打开西北战局，1948年6月16日，彭德怀等向军委建议，能否考虑让徐向前的华北第一兵团推迟一下对阎锡山集团的作战，西渡黄河与西北野战军一起共同组织渭北战役，消灭胡宗南的12个师，使渭河以北之敌不能与渭南连成一片。但军委认为：

你们以七万人左右担负西北作战重任是很艰苦的，但别方面很难给你们以兵力的直接援助。

我集中敌亦集中，不一定能打好仗，我集中兵力太大，粮食决难持久，别方面则失去歼敌机会，不如固定各兵团之兵力与任务，不惜时间，各自寻机歼敌为有利。

西北缺兵，其他兄弟部队又来不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西北野战军暂时孤力支撑，以小搏大，与胡马死磕到底。

其实，在蒋介石企图荡平陕北、割断中共右臂的形势下，中央军委赋予西北野战军的任务，不在于歼敌多少（当然歼敌越多越好），而主要是把胡宗南集团牵制在西北，不使他调，以利其他解放区的作战，进而彻底粉碎蒋介石企图使解放军不能在战略上持久的阴谋。待其他解放区作战胜利，再移兵反哺西北战场。

由此，也就决定了西北野战军将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

毛泽东之所以率中共中央留在陕北不走，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就是要振奋陕北乃至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士气，吸引蒋介石的注意力，把胡宗南集团牢牢地牵制在西北。

蒋介石要把战争逐步引向解放区，尽情地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用解放区的骨头熬解放区油，使解放军即使取得若干的军事胜利，但在战略上难以持久。毛泽东则针锋相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组织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将进攻解放区的敌人拖出解放区，同时破坏蒋介石的战争潜力，用蒋介石的骨头熬蒋介石的油，从而使解放军转入了战略进攻。

在此形势下，西北野战军把胡宗南集团牵制在西北的时间越长，全国胜利也就来得越快。

西北野战军不负众望，尽管只有区区几万人，却在彭德怀、习仲勋的率领下搞得风生水起，彭德怀的军事指挥艺术也是可圈可点！

提起彭德怀，人们自然就会想起毛泽东称赞他的诗：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首诗的来历是，1936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马鸿宾、马鸿逵和东北军白凤翔的骑兵也跟踪而至。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人困马乏，疲惫不堪，打还是不打？毛泽东说：“我们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彭德怀遂在吴起镇西南地区布置口袋阵，结果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抱头鼠窜。战后，毛泽东赋诗一首，称赞彭德怀的卓越军事才能和无畏的作战精神。彭德怀则把“唯我彭大将军”改成“唯我英勇红军”送还毛泽东。

长期的革命战争生涯，使彭德怀练就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他

军政兼优，作风硬朗，善于打硬仗、恶仗。正因为如此，他的名字总是与“受命于危难之时”联系在一起。

胡宗南集团开始进攻延安时，西北野战军的兵力只有两万余人，敌我力量对比为 10:1，在全国各解放区中敌我力量对比是最悬殊的。彭德怀既要领兵打仗，又要保护中共中央在陕北的安全，所承受的战争压力是其他战略区领导人所无法比拟的。

然而，敢于横刀立马的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洋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初步稳定了陕北局势；接着西出陇东，北攻榆林，调胡军北上，以策应陈谢集团南下。

正在延安“视察”的蒋介石判断毛泽东要东渡黄河，遂命令胡宗南派刘戡率大军围追堵截。在北面是沙漠，西面是无定河，东面是黄河，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机关就在西北野战军驻地以北的梁家岔，而东、南两面尽是刘戡大军的险恶形势下，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发起沙家店战役，一举歼灭钟松任师长的整编第三十六师，使西北野战军从此转入内线反攻，陕北形势开始好转。

侧水侧兵乃兵家大忌，然而彭德怀却能够险中求胜。战后，毛泽东再次把“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抄送彭德怀。

随着歼敌数量越来越多，西北野战军的武器装备也得到了改善。到 1947 年 11 月，西北野战军的自动火器与重武器大量增加，除六〇炮外，相当于胡宗南之王牌第一军的装备，不满百人以上的连队还感觉拿步枪的人太少了。

为解决兵员问题，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六旅旅长张仲瀚、政治委员曾涤，曾于 1947 年带干部到华东的渤海军区扩军。当时，华东野战军领导人鉴于经过外线出击作战，部队减员较大，想先借用他们征来的兵，表示年底肯定补还。为此事华东方面还经过军委协调，搞得双方多少有些不愉快。

事实上，西北野战军的兵员主要来自俘虏。到1947年11月，西北野战军有的部队俘虏兵比例占80%，有的占60%，平均占到70%。到1948年底至1949年初，西北野战军的俘虏兵比例占到全军的80%，而且多数是四川人。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胡宗南集团不仅占据着人力物力资源丰富的八百里秦川，还以四川为战略后方，把大量的四川青年抓来西北前线，结果成了解放军的俘虏。由于部队四川人居多，西北野战军几乎变成了“川军”！

1949年2月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

俘虏兵约占全军百分之八十，连队比例更大，班长绝大多数是俘虏兵，排长副排长亦近半数，连长指导员各军中均有个别。绝对多数是四川人（除四纵外），基本上已成为南方军队。

如何把一个大量俘虏兵成分的部队改造成一支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是彭德怀长期以来思考的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使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947年12月的一个深夜，彭德怀发现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的一名四川籍解放战士（被俘后参加解放军），一个人在野地里，写着他母亲的神位，哭诉他母亲是怎样惨死的，仇恨国民党和当地的恶霸地主，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要如何为母亲报仇。一位连指导员悄悄在旁听着，他也有类似苦难，结果他们拥抱相诉相哭。

彭德怀抓住这一事例，于1947年冬在西北野战军展开了诉苦三查运动。通过控诉旧社会和国民党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最后集中到“苦从何来？仇向谁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总任务上来，使广大指战员特别是解放战士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在此基础上，通过查思想、查工作、查斗志，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彭德怀由衷地感慨道：

经过这次运动之后群众纪律好了，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相互关系好了，这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种诉苦会的形式是很好的，红军和抗日时期，都没有找到这种形式；要是早找到这种形式，对争取俘虏兵加入红军，扩大红军的成绩，要快、要大得多。

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真正懂得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为理想信念而战的部队才是最有战斗力的。

彭德怀正是带着这样一支复仇之师，于1948年二三月间在宜川战役中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等部5个整编旅2.9万余人，击毙中将军长刘戡，获得了“以不足二个人消灭一个敌人的辉煌胜利”，创造了“西北人民解放军空前的歼敌纪录”。

毛泽东为此于1948年3月7日为新华社撰写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评论，指出：“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宜川战役，使关中平原门户洞开！

八百里秦川处于西北野战军的鸟瞰之下！

随后，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先后进行了西府陇东、澄郃、荔北和1948年冬季等战役，牵着胡宗南东奔西走，并不断歼灭其主力，圆满地完成了中央军委所赋予的将胡宗南集团牵制于西北的艰巨任务。

随着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炮声隆隆作响，彭德怀和西北野战军的艰苦之路终于走到了头！西北野战军与胡马决战的日子也即将开始！

西北缺兵，调20万部队给彭德怀

尽管西北野战军没有直接参加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但其身上的担子依然不轻。

毛泽东、周恩来判断胡宗南部有东调南京、上海或增援中原杜聿

明集团的可能，要西北野战军继续牵制，不使他调；林彪、罗荣桓也担心胡宗南逃跑，向军委建议由西北野战军断其退路。但彭德怀并不这样看。

就在林彪、罗荣桓向军委提出建议的当天，即1948年12月24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

（一）以目前情况看，蒋介石之军事方针似是依托巴山，扼守长江，图保江南及西南各省。即杜部十九个师、傅部四十五个师被全歼，如其内部无大变化及我大军尚未渡长江时，此方针可能不会轻易放弃。假设如此估计符合目前情况，胡匪也就暂时不会放弃西安。但我中原区有适当强大兵力沿汉水西进，威胁汉中（特别是入川）；或者太原打下后，晋绥部队及华北一兵团转至西北；或者平、津、张打下后，华北二、三两兵团入绥、宁、甘、青；或者西野本身在三五个月内全歼该匪三四个军（目前情况，无此把握）。在上述各项威胁下，胡军则将弃长安退守汉中。西北野战军须抓紧上述胡匪两种情况（走与不走）布置工作。如胡匪军不走，拟继续在渭北、西府逐次消灭胡匪主力。如调走，乘其在移动中，尽量追歼其有生力量，并尽最大可能准备于部。

（二）按十二月整理敌军材料，胡匪嫡系及属其指挥者，现有十四个军，三十五个师。属张治中之各系共七个军，二十四师（包括青宁两马十二个师及新疆三军八师，及新成立之四个师），再加邓宝珊之二十二军。以上总共有二十二个军六十一个师。如使胡及新疆蒋系有十七个军不能调集江南或西南，对全局是有利的。但根据本年（一九四八年）作战经验证明，仅消灭敌人十五六个师（旅），敌之补充甚快（我们补充缓迟）。故敌数量未减少（但质量已降低）。我军之扩大甚慢；消灭刘戡部时（三月），全军即有六万八千人，现才九万余人。估计明春攻势时亦不过十万人。似此，如胡匪军他调时，欲

钳住其主力于西北，恐难完全做到。

应当说，彭德怀对战略决战期间胡宗南部不会他调的基本判断，是符合后来实际情况的；其对胡部撤与不撤的两种对策也无可挑剔；客观说明西北野战军在制止胡部主力他调上的困难，则是要求增兵西北。

毛泽东当然明白彭的意思。1949年1月17日他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

中原、华东两军已进入休整，暂定至三月底止。林罗及华北各部已克天津，大约本月底或二月初可克北平，二月底或三月初可克太原、大同，须休整两至三个月然后南进。

二三月间拟开二中全会，希望彭贺习三同志均能到会，如有可能，并望张宗逊、王震二同志中能来一人，时间在北平攻克后再通知，如情况许可，西北我军能在你们动身前打一仗再休整为好，如不可能则不强求。

华北部队参加西北作战问题，待你们来中央时面商。

毛泽东要彭德怀、贺龙和习仲勋来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时当面商定增兵西北问题。但彭德怀却等不及了。

平津战役一结束，彭德怀就于1949年2月8日致电毛泽东，提出如暂不增兵西北，第一野战军（1949年2月1日由西北野战军改称）准备夺取铜川、耀县、蒲城、富平、大荔、朝邑、平民、淳化等8个县，以解决粮食问题，秋季再入西府；如果太原战役后，能把彭绍辉的第七军和第一军的第三师以及第三军的第八师归还一野，徐向前、周士第的第十八兵团（由华北第一兵团改称）又能加入西北作战，进而东取潼关，进逼西安，则一野即可攻击西府，夺取宝鸡；这时如胡宗南放弃西安向陕南逃跑，则在追击中歼灭其主力，夺取汉中。

一句话，能不能增兵西北，是决定一野下一步怎样打的关键。所

以，彭德怀在电报的最后指出：

太原解放后，徐、周部用于何方，盼示，以便早作准备。

听了彭德怀对西北下一步作战的考虑，毛泽东终于把自己对增兵西北的考虑合盘托出。他于1949年2月12日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

太原、大同解决后华北三个兵团二十三万人可全部用于西北，至少徐周、杨罗两团十七万人可以用于西北。彻底解决胡马，占领潼关、西安、汉中、天水、兰州，有待于徐杨等部之到达。

毛泽东这样一说，彭德怀、贺龙和习仲勋心里总算有了底。

但毛泽东同时又强调，彻底解决胡马有待于徐向前的第十八兵团、杨得志的第十九兵团（由华北第二兵团改称）之到达。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这一点，除了西北敌我力量对比的客观形势外，还来源于他对马家军特别是对青马的了解。

1947年5月下旬，西北野战军在陇东战役中进攻合水，遇到了由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指挥的整编第八十二师（以后改称第八十二军）的顽强抵抗。30日辰时，彭德怀、习仲勋致电毛泽东：

青马之八十二师甚顽强，夺取合水东二坨山阵地及城南阵地，全部击毙，无一生俘。三十日击溃援敌千余，获战马二百匹，击毙战马二百余，亦无生俘。并以不住民房住帐篷，以“蒋毛争天下与民无关”欺骗人民。捉获民兵及我干部士兵割头破脊开肚，异常残暴，是一支劲旅，不可轻视。

从此，毛泽东对青马有了深刻认识，称“青马八十二师颇顽强”，并把它作为解放军在战略追击阶段的主要对手之一。

心里有了底的彭德怀，鉴于一野马上就要开始1949年春季战役，自己又要前往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遂报经中央批准，决定一野由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以及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和参谋长阎揆

要指挥，以张宗逊为主。

安排好作战计划和人事后，彭德怀和第二军军长王震于2月17日离开一野，前往西柏坡。张宗逊等则于19日率一野发起了1949年春季战役。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调兵问题有了着落，但大军入陕所需的粮食又成了问题。为此，彭德怀、贺龙和习仲勋到达西柏坡后，仍然心系西北，协调各方面，为即将开始的西北大决战做准备。2月28日，他们联名致电张宗逊等：

太原得手后将二十万人入陕，并西野现有人数每月需粮拾贰万石，故四月中仍须按预定计划进行一个战役。根据目前情况，以消灭三十八军、五十七军，进占乾、礼、永、兴、麟等县，逼敌放弃渭北陕东各县，我即可于夏季征粮三十至四十万石，作为与胡匪决战粮食，目前请作西府战役具体准备：1. 在通润镇附近囤粮壹万至壹万五千石，准备西野进攻乾、礼、永之用。2. 侦察泾河下游徒涉场准备架桥材料及造渡船数只。3. 修好合、澄、白一带汽车路及三眼桥、永丰镇桥，弹药运东西文化村一带设库保存。4. 韩、合段黄渡口须加修理。

晋南工委商决再拨粮三万石，接济西野，如新区筹粮够吃时，此粮最好留给华北兵团入陕时使用。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作为西北解放区的三位最高领导人，彭德怀、贺龙、习仲勋一到西柏坡，就对未来作战所需的粮食、道路、桥梁、渡口等精心布置，对即将开始的西北大决战可谓殚精竭虑。

张宗逊等对彭贺习的指示一一落实，并协调地方制定了一个10.6万至11万石的筹粮计划。尽管后来由于情况变化，一野并未进行西府战役，但修路、架桥、修理渡口，在第十九兵团等部由晋入陕时却派上了用场。

1949年3月28日，彭德怀参加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来到太原前线。

为了打好太原战役，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太原前线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中共太原战役总前委，以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为第一副书记，周士第为第二副书记，统一指挥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等部作战。

当时，徐向前正患肋膜炎，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彭德怀代替徐向前指挥作战。

彭德怀一面考虑如何攻打太原，一面思考第二、第三野战军（分别由中原、华东野战军改称）发起渡江战役及攻克太原后胡宗南集团可能的变化，进而对一野的作战进行指导。4月3日，他致电中央军委请转一野前委：

（一）我于三月二十八日至徐周罗司令部，得悉阎匪守兵十六[个]师约七万余人，火炮六百余门，据太原纵横三十余里，以钢筋洋灰构成坚固设防区。惟守敌士气低落，日有逃亡。我华北三个兵团及晋绥部队决于四月十五日攻击。如能割裂外围，首先歼灭六、七个师，半月内当可全部解决。否则，可能延长若干时日。我拟参加此役，学习攻坚经验，五月初旬回部。二中全会决议，请王震同志传达。惟王随贺习去平津参观，估计日内可返晋。

（二）太原得手，大军渡越长江后，胡马匪军可能后缩，请考虑乘敌移动时消灭敌数师，取得渭北粮食，供给入陕大军之用。

这时的胡宗南犹如惊弓之鸟，神经高度紧张。他后来收缩防线直至放弃西安逃跑，都被彭德怀不幸言中。

太原古称并州，阎锡山在这里做了38年的土皇帝。当然，此时他已经逃跑，把部队留给了孙楚、王靖国指挥，由其心腹、特务头子

梁化之督战。解放军攻城部队达到3个兵团、10个军、36个师，另加2个步兵旅、2个炮兵师，共32万余人，拥有各种火炮1150余门。彭德怀在西北打了那么多仗，从没有见过这种阵势！

4月5日至7日，太原战役总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在会上开门见山地说：

我这次来太原前线办两件事。一是总攻太原。太原敌人城防坚固，我参加此役，主要是学习攻坚的经验。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以后，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将调西北战场参加对胡、马军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解放大西北。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次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各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发起向全国进军作战。

1949年4月20日，是值得中国人记住的日子。

这一天，人民解放军同时发起两个战役：

一是第二、第三野战军联合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覆灭。

二是华北3个兵团发起太原战役，至4月23日全部扫清外围，只待最后攻城。

在此形势下，彭德怀就调兵西北之事与毛泽东作最后磋商。

在毛泽东与彭德怀过去来往的电报中，第十八、第十九兵团调往西北已经没有问题，第二十兵团是否调赴西北还没有最后敲定。随着太原战役结束，这一问题也有了结论。

4月23日午时，彭德怀致电住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

攻并得手后，十八兵团拟位于徐沟、榆次休整，准备从陕县潼关线渡黄河。十九兵团、七军，拟位于太谷及以南休整。准备从荣河、

韩城线入陕。二十兵团（杨成武同志）等希望同往。如三个兵团全部入陕，估计今冬可占南郑、兰州、西宁，相机解决宁夏。明年分两路入川入疆，惟看守绥远，攻取大同，巩固华北，似嫌兵力太弱，可否以杨成武部一个军，姚喆、王平两部，共约四五万人，暂归唐延杰、李井泉统率，担任上述任务。杨成武率两个军入陕。

攻并得手后，我拟参加一次军以上座谈会。时间至多三天，交换整训经验。于五月一、二日起程回陕。

姚喆时任一野第八军军长，王平时任华北军区之察哈尔军区司令员，唐延杰时任第二十兵团（由华北第三兵团改称）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德怀的意见是，第二十兵团只留下唐延杰和1个军，华北3个兵团的其他部队都由他全部带走，留下的以及当地的部队统归唐延杰、李井泉指挥。

4月24日，太原战役结束。25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并告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

杨成武兵团需留华北暂不入陕，该兵团如损伤不大可迅开平绥线夺取大同，尔后即控制于该线，准备将来配合西北我军解决绥、宁问题。

同意你于五月初回陕，在回陕前对十八、十九两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尔后该两兵团即由你直接指挥。

其实，毛泽东把第二十兵团留于华北，不光是为了解决大同、绥远等问题，同时也是为了防止美蒋在解放军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时偷袭平津后路。

4月25日，中央军委致电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并告彭德怀：十八及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区处。

至此，第十八、第十九兵团正式划归第一野战军建制，调兵西北

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太原战役后，徐向前需要治病，中央军委对第十八兵团的领导作了较大的调整，由周士第接替徐向前出任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陈漫远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由于罗瑞卿就要奉调北京（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中央军委决定其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的职务由第二十兵团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接任。

按照彭德怀的部署，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开到太原以南地区休整，准备随时开赴西北战场与胡马较量！

西北大决战的能量正在聚集！

偏师借重刘金轩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对由陕入川、翻越秦岭等山脉之难的由衷感慨，堪称千古绝唱！

千百年来，人们不断探索从关中平原翻越秦岭向南行进的道路，最终从潼关到宝鸡的秦岭北坡找到了 108 峪，其中有名的就有 72 峪。峪者，山谷也。这 72 峪，有的是死胡同，有的可以通往陕南、巴蜀等地，被称为秦岭古道。其中，自长安经蓝田、商州、武关到南阳盆地的叫武关道；自长安东南经柞水、镇安到陕南旬阳的叫峪谷道；自长安正南穿越子午谷到汉中的叫子午道；经周至西骆谷到陕南洋县的叫骆谷道；沿陕南褒谷关到关中斜峪关的叫褒斜道；从宝鸡经大散关、凤县到汉中的叫陈仓道。

秦岭古道承载着厚重的中国历史：刘邦先于项羽进咸阳走的是武关道，后来他“火烧栈道”入汉中及“暗度陈仓”杀回汉中走的是陈仓道；邓艾灭蜀走的也是陈仓道；唐玄宗李隆基为杨贵妃用快马从四川涪陵运荔枝到长安走的是子午道，为避安史之乱逃往四川走的则是

陈仓道。

正因为秦岭古道把关中平原与陕南和四川联系在一起，才引起了彭德怀对陕南刘金轩部的注意。

1947年8月，陈谢集团由晋南挺进豫西。刘金轩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二旅旅长，是陈赓手下的一员猛将。同年冬，刘金轩奉命率部离开主力向西挺进，与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一起，开创了陕南根据地。1948年6月7日，中原军区以刘金轩旅和第十七师共同组建陕南军区，以刘金轩为司令员，以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政治委员汪锋为政治委员。刘金轩随即率部参加了襄樊战役，活捉了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此后，刘金轩又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胜利后，刘金轩率部回到陕南解放区。1949年5月1日，陕南军区的部队奉命组成第十九军，刘金轩兼任军长，张邦英兼任第一政治委员，汪锋兼任政治委员，陈先瑞任副军长，李耀任副政治委员，第十二旅改编为第五十五师，第十七师改编为第五十七师。第十二旅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团和第十七师之第五十一团，依次改称第五十五师第一六三、第一六四、第一六五团，第十二旅第三十六团、第十七师第五十团和陕南军区郟白独立团依次改称第五十七师第一六九、第一七〇、第一七一团。全军共1.5万余人。

彭德怀十分清楚，胡宗南集团将来从关中撤退或逃跑，必经陕南进入四川，而陈先瑞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陕南坚持斗争，对陕南情况又比较了解。这样，在将来与胡马的决战中，刘金轩部必能派上用场。因此，他在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就与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商定，刘金轩部将来要配合关中作战。

正因为如此，彭德怀于1949年4月23日致电毛泽东：

前与李先念同志商定，以鄂西北之刘金轩部约两万人配合陕作战。

如军委同意，请告其五月底准备毕。该部行动所取道路，经山阳、镇安、宁陕，夺取石泉，截断子午谷及安康敌退路，最为有利。如自己有困难，不可能绕道，亦应取道竹溪、安康出石泉。

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是抓大事，抓敌我双方主力之间的互动，对刘金轩部的情况并不了解。4月25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并告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刘金轩部情况不明，待查明后再定行动。”

查明情况后，5月8日中央军委致电中原局并告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西北局：

（一）我第一野战军（三十五万人）六月间开始举行夺取潼关、西安、宝鸡、汉中、天水及陇南地区之战役，希望我陕南刘金轩部沿汉水向汉中方面行动，最好能直取汉中区域，切断胡宗南向川北的逃路。（二）在上述战役期间及战役结束后一个时期内，刘金轩部受彭张赵指挥，请令刘金轩与彭张赵联络并接受彭张赵命令。（三）在上述战役完毕之后，西安等处之敌已被歼灭或驱逐，陕南、陕北之联系已经打通，陕南区党政军领导关系应予改变为受西北局、西北政府及西北军区的领导，此种改变之时间大约在七月或八月。在歼灭胡宗南的战役中，陕南区应起配合作用。

不久，第十九军即与一野沟通了电台联络，开始接受一野指挥。

如果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赣江西岸搞得红红火火，把赣西南小块的根据地连成一片，直接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反“围剿”作战，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到长沙》一词中曾经写下“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那么，这次彭德怀则要偏师借重刘金轩，由其配合一野主力与胡马决战！

第二章

关中拉锯——先进后退，诱敌深入

西府地形凹凸不平

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意思是说，只有对敌我双方的情况都能了解透彻，打仗才不会有危险，或者说方能百战百胜。

除这些之外，还必须对作战区域内的地形了如指掌，因为地形决定战法，决定了你只能这样打而不能那样打。这就是为什么在打仗之前，指挥员都要亲自或派人去勘察地形。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

为了增强对西北大决战的身临其境之感，有必要了解一下关中平原。

关中平原，指秦岭以北由渭河冲积而成的平原，又称渭河平原。它南依秦岭，北界北山，西起宝鸡，东至潼关，东西长约 360 公里。但南北宽窄不一，东部最宽达 100 多公里，西安附近约 75 公里，眉县一带仅 20 公里，到了宝鸡只剩下一二公里，宝鸡往西逐渐闭合成峡谷。关中平原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为秦国扫六合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所以号称八百里秦川。

所谓北山，是指一系列大大小小山脉的组合，其中主要有陇山、子午岭、黄龙山和桥山。北山是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分界岭，其北面是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南面则是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

经过千百年来历史沿革，人们把西安，咸阳以西的泾河与渭河之间的三角地区称为西府，把西安以东的渭南地区称为东府。东府地区地势平坦，酷似华北平原，但西府的地形则凹凸不平。

西北大决战的主战场在西府地区。这一地区的兵要地志主要涉及

一条河、两个塬、三条公路、三个要点。

所谓一条河，是指渭河。它与北方的其他河流一样，枯水期河道断流，汛期水深流急，难以徒涉。河道两旁有几百米至若干公里不等的河滩地，人们在此种起了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陇海铁路就穿行在渭河北岸的河滩地上。

渭河支流众多，最大的是西北东南走向的泾河，在高陵县的船张村与渭河交汇。在咸阳以西的渭河北岸，主要有漆水河和千河，它们分别在武功县以西和宝鸡以东汇入渭河。在西安以西的渭河南岸，由秦岭几十个峪形成的大小河流比比皆是。

所谓两个塬，是指高出渭河河滩地 40——100 米的南北两个黄土台阶地。渭河以南的为南塬，渭河以北的为北塬。北塬开阔，相对平坦，但上面也有不少沟沟坎坎。南塬较窄，由于河流冲刷，形成一个个高出地面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东西北三面峭壁或 70 度左右的陡坡、南面与秦岭相连的马蹄形高地；在南塬与渭河河滩地之间，则是由南向北倾斜的河流冲积扇，我们暂且把它叫作南塬冲积扇，人们在冲积扇的壕沟或池塘内种起了水稻和荷花，形成一片片稻田和藕塘。由于北塬在渭河河滩地几乎是垂直升起，塬壁就像一堵满眼碧绿的高墙，站在河滩地远远望去，多少带有几分神秘色彩。

所谓三条公路，是指西兰公路、咸宝公路和长益公路。西兰公路是西安经咸阳、礼泉、乾县、永寿、彬县、长武到甘肃平凉、兰州的公路，是陇东进入关中平原的必经之路；咸宝公路是咸阳经兴平、武功、扶风、岐山、凤翔到宝鸡的公路；长益公路是长安（西安）经户县、周至、眉县到宝鸡以南益门镇的公路。西兰公路和咸宝公路在北塬上，长益公路在南塬冲积扇上。

所谓三个要点，是指西安、咸阳和宝鸡。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腹地，是陕西省省会，十三朝古都，也是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中心，其战略地位不言自明；咸阳位于渭河北岸，东南距西安 30 公里，为咸（阳）榆（林）、西兰和咸宝公路的交汇点，是西安北部的交通枢纽和重要屏障；宝鸡地处渭河北岸，北接平凉、南通陕南和四川、西接天水、东连西安，是关中平原西端的战略要地。

国共两党在西北的大决战，就是在关中平原中西部的南北两个塬、南塬冲积扇及渭河的河滩地上展开的。

对国民党军来说，在西逃无望的情况下，被解放军从北塬赶下河滩地，为逃命而南渡渭河，结果被歼 4 万余人，几千人葬身河水，真可谓一场噩梦！

然而，这场噩梦：

是胡马“规复西安”梦的延续！

是胡马联盟的历史终结！

它是迟早要到来的！

胡军撤了，那就追嘛

提起胡宗南，没有人比彭德怀对他更了解。彭德怀对他的评价是“志大才疏”。

纵观胡宗南的一生，说他“志大才疏”真是太准确不过了！

胡宗南的“志大”，首先表现在于他对权力的无止境追求。

胡宗南之所以能成为蒋介石的嫡系之一，黄埔系实力派的首领，除了他确实有些本事外，主要得益于他是黄埔一期和祖籍是浙江镇海的天然投名状，并且唯蒋介石马首是瞻。

中原大战结束后，1931 年 1 月胡宗南升任第一师中将师长。其前任师长刘峙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因而任用了不少保定系和其他军校出身的军官。胡宗南接手后，将第一师的旅、团主官全部换成黄埔一、二期毕业生，开始建立自己的军事体系，形成黄埔系“少壮派集团”，蒋深以为然。

由于得到了蒋介石的欣赏和重用，胡宗南在官场上一路扶摇直上。1936年第一师扩编为第一军，胡升任军长。1937年胡率部参加淞沪抗战，由第一军军长升为第十七军团军团长。1939年8月，胡被提拔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成为黄埔系中第一个任集团军总司令的人。1942年7月，胡又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在西安开设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掌握第八战区的实权，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号称“西北王”。1945年7月接替陈诚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成为黄埔系中唯一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的部队有5个集团军、25个军，总兵力达50万人，连西北“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都要受其挟制。

随着所辖部队数量的不断增加，胡宗南坚持“黄、陆、浙、一”的用人标准，即必须是黄埔军校毕业、陆军大学毕业、浙江人和第一师的老干部，才能得到提拔重用，否则只能当副职或干其他一般性的工作，从而使其掌握的部队成为蒋介石的嫡系或铁杆。

应当说，胡宗南从一位小学教师到投笔从戎官至战区司令长官，可谓“功德圆满”，实现了其“鸿鹄之志”。然而，随着抗战的胜利，他的野心还在不断膨胀。他除以陶峙岳据新疆，李铁军驻甘肃河西走廊，自己坐镇西安，继续控制西北外，还把触角伸到豫西和晋南，同时以“受降”为名，派马法武的第四十军和鲁崇义的第三十军沿陇海、平汉路北上，以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及第十六、第三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沿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挺进保定、平津地区受降，甚至还企图派出先遣部队出山海关染指东北，当上北中国王，以遂其狂妄野心。

尽管胡宗南费尽心机，但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他的梦想就像肥皂泡一样很快破灭了：其马法武的第四十军和鲁崇义的第三十军和平汉战役中被歼；其黄正诚的“天下第一旅”在临浮战役中被消灭；其

罗历戎的第三军在清风店和石家庄战役中全军覆没；其范汉杰率领的一个兵团在辽沈战役中被歼，范本人亦在锦州被活捉；其第十六军在平津战役中被歼，其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后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四兵团司令），带着家眷乘飞机逃回西安。

胡宗南的“志大”，还在于他妄想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荡平陕北，实现蒋介石消灭或驱逐西北野战军和中共中央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的战略企图。

1947年3月，蒋介石开始实施其蓄谋已久的“黄河战略”，使黄河重归故道，用以分割晋冀鲁豫与山东解放区的战略联系，阻止刘邓大军南下，同时发动对陕北、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并任命胡宗南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执行进攻陕北的任务。

胡宗南踌躇满志，对进攻陕北充满信心。他早在1947年2月的三原军事会议上就对手下将领说：“我们要消灭共产党，必须首先消灭它的武装力量；要达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是拿下延安，消灭它在陕甘宁边区的主力军，摧毁它的首脑机构。我相信可以在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六个月内消灭整个G军，解决全国对共作战的军事问题。”陈诚曾吹嘘要在3——6个月内消灭共军，胡宗南则要在2——6个月内消灭共军，其“鸿鹄之志”不可谓不大。

胡宗南的“才疏”，使他空怀两个月内消灭陕甘宁G军的“壮怀激烈”，但又没有这个本事！

从1947年3月到1949年3月，经过两年作战，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2万余人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增加到9万余人；胡宗南自己倒是损兵折将，据不完全统计，两年被歼18.6万余人（包括马家军和地方部队），整编第七十六师中将师长廖磊、第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以下30多名将官被俘，整编第二十九军中将军长刘戡以下7名将官被击毙。西北的战争形势由原来胡宗南的部队追着西北野战军打，

变成了被彭德怀的部队堵在关中平原的家门口打。

这一切只能说明：胡宗南的确就不是彭德怀的对手！难怪彭德怀说他“志大才疏！”

胡宗南确实应当反思，为什么会输得这样惨？

然而，令胡宗南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第十八军先后被歼，东北、华北和中原被解放军席卷而去，自己这点损失也算不了什么。

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以后的胡宗南，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必然成为解放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以其主力与解放军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打不过就跑！向陕南跑！向四川跑！向云南跑！实在不行就“退印度转台湾！”

太原战役后，胡宗南和张宗逊都在关注着解放军第十八、第十九兵团的到来。对一野来说，增兵西北犹如久旱之望云霓，第十八、第十九兵团的到来将使一野如虎添翼。对胡宗南来说，第十八、第十九兵团的到来，就是他遭遇灭顶之灾的开始。因此，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密切注视着黄河边的风吹草动，准备随时放弃关中向陕南逃跑。

其实，彭德怀在1949年1月就为胡宗南想好了退路。他认为：“胡宗南是没有远见的，看不到问题的中心，常常被现象所迷惑，敌人最好是该守咸阳、宝鸡，以三原为依托，以此保守西安。”

3个月后，胡宗南对彭德怀开出的药方可谓“依计而行”。太原战役一结束，他就于1949年4月26日开始，命令部队撤出同官（铜川）、耀县、蒲城、富平等地，向三原、高陵及其以南地区收缩，形成跨泾河、渭河，保守西安的弧形防御地带。

胡宗南收缩防区，对解放军当然是好事。“为了让出澄、合地区粮食给十九兵团、七军入陕时用，及适时的发觉敌人动向”，从5月3日开始，张宗逊、赵寿山指挥一野向南推进到铜川、耀县等地。

然而，彭德怀给胡宗南开出的“药方”是收缩而不是逃跑。但随后的各种情报显示：胡宗南准备放弃西安向陕南逃跑！

是什么原因导致胡宗南突然下决心撤逃的呢？

原来，这时的胡宗南已经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副军长张贤约从天津带回的补训师引起了胡宗南对形势的误判。

由于西北缺兵，中央军委决定从平津战役的俘虏中抽调一部为第一野战军补充兵员。1949年2月底，张贤约率干部从石家庄乘火车到达北平，向林彪、罗荣桓和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报到，之后到天津去接收2.3万名俘虏。经过教育和淘汰，4月8日张贤约率1.6万人、火炮18门为第一梯队，第四军第十师政治委员左爱率6000人、火炮18门为第二梯队，由天津西返。5月上旬，补训师来到黄河东岸，准备西渡。一时间，黄河边人头攒动，战马嘶鸣，炮车滚滚。胡宗南派飞机从空中侦察到这一情况，误认为华北第十八、第十九兵团正在西渡黄河，不禁大惊失色，立即部署放弃关中，向陕南撤退。对此，张宗逊回忆道：

原来胡宗南把由六军副军长张贤约率领的，在北京和平解放后改编补充一野的七个团向陕西开进，当作华北两个兵团入陕，胡宗南亲自召开紧急疏散会议，会议结束，我地下党的同志就立即发出这一重要情报。

一个补训师就能叫胡宗南下决心逃跑，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但无论如何，只要胡军有动静，张宗逊等就必须高度关注。

中共打入国民党军内部的谍报人员传回的“谍息”称：胡宗南及其绥署、第一军、第六十五军、第三十六军、第九十军、第三军、第二十七军于5月15日南撤，西安、宝鸡各留一指挥所，分别由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参谋长罗列和副参谋长沈策负责。

通过破译国民党军的密码电报而形成的“密息”也显示：胡宗南

要留下第三十八军（高陵及其以南）、第十七军（其第十二师在三原，其余在西安）、第五十七军（乾县、礼泉）、第六十九军（咸阳）为掩护部队。

同时，中央军委也向一野提供了有关西安方面的情报。

根据这些情报，5月11日张宗逊、赵寿山立即召集各军首长开会，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为了在关中地区歼敌一部，重点的打乱其撤退计划，尽量抢救其残余物资不致破坏，并有利于我下一战役开进”，“拟于五月十五日出动：第一步以歼灭三原地区之敌为目标，第二步看情况逐次夺取咸阳、西安、宝鸡，歼灭以上地区之敌”。

同日，张宗逊、赵寿山把这一决定上报了中央军委和彭德怀。

1949年5月11日，随着各军派出侦察队向南开进，陕中战役也随之打响。西北大决战的帷幕由此拉开！

第二军侦察队13日午夜袭占高陵县城，第一军先头部队和三原县大队14日占领三原县城。

各军先头部队不断把胡军逃跑的消息传回野战军司令部。17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张宗逊、赵寿山的11日作战计划。

在此情况下，张宗逊、赵寿山于17日晚在富平县谢家村召开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决定第一、第二、第四军南渡泾河向西追击；第六军向西安前进；第三军为预备队，机动使用。

王震率领的第二军成为追击作战的先头部队。该军扫清泾阳塔、永乐镇之敌后，于17日10时30分解放泾阳，当晚20时西渡泾河，18日10时进入咸阳。第一、第三、第四、第六军也于18日先后渡过泾河。

鉴于胡军不战而逃，为避免追击队形交叉紊乱，18日17时张宗逊、赵寿山对各军的行动再次作出部署：

第二军沿陇海铁路向宝鸡追击前进；

第一军经临平镇、法门寺、岐山向凤翔、千阳追击前进；

第四军经礼泉、乾县向麟游追击前进；

第三军为打击马家军的预备队，随第一军跟进；

第六军经咸阳向西安前进（甘泗淇主任随行）；

野司随第六军跟进。

在解放军的追击之下，胡军拼命撤退，其小股部队和各县保安团等地方武装或被消灭或起义投诚。

在追击作战中，能不能追上逃敌，就看能不能比敌人跑得更快。第四军不顾疲劳，勇猛追击，终于追上了一条大鱼——青年军第五十七军和第三十师。

青年军是蒋介石在抗战后期建立起来的一支政治性很强的部队。1944年，日寇发动豫湘桂战役，打通了中国大陆交通线，使中国朝野震动。国民政府当局把军事失败的原因说成是兵员身体素质和业务素质太差。蒋介石也认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于是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参军复员后可以免费升学、大学生可以免费出国留学等条件的吸引下，青年军9个师很快组建起来，经过3个月的军政训练，参加了对日的缅北大反攻。

热血的知识青年参军的确是为了参加抗日，但蒋介石组织青年军决不是为了实现知识青年的抗日愿望这么简单，而是要为自己再造一支黄埔系，因此对青年军的干部亲自挑选，并由其儿子蒋经国担任政治部主任，使三民主义深入青年军的骨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则把青年军扩编并投放各个战场，使之为蒋家王朝充当炮灰。

青年军第五十七军军长徐汝诚，凭着自己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被胡宗南礼为上宾。胡宗南为保护好蒋氏父子亲手培养起来的这支

“天之骄子”，命令第三十师师长王敬鑫掩护第五十七军撤退。

从5月16日开始，第五十七军在前，第三十师在后，从乾县向凤翔撤退。

第五十七军原计划于5月20日天黑前进驻凤翔县城，凭借自己善于利用既设工事作战的强项，阻止解放军追击。但由于徐汝诚乘坐的吉普车携妻带女，第五十七军军官多半强征民夫车辆为其运送家眷、行李和辎重，部队行动缓慢，每天才走40——50华里。直到解放军第四军与王敬鑫的后卫部队交上了火，徐汝诚才命令部队加快前进的速度，但为时已晚！

第四军于5月20日在监军镇（今永寿县城）与麟游间的关头，歼灭敌第五十七军第二一五师1个营大部，从俘虏口中得知敌第五十七军和第三十师正向凤翔撤退。军长王世泰一面命令高锦纯率第十师继续追击，一面向野司发电，要求派其他部队堵击该敌。野司即命令第一军军长贺炳炎派已到达岐山的第二师继续西进，在凤翔东北之姚家沟附近地区，抢占要点，切断第五十七军的逃路。

麟凤公路经过的姚家沟镇东北地区，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沟，沟宽两公里左右，东西两面都是高山。只要把南面的姚家沟口封住，第五十七军逃往凤翔的道路即被切断。

第二师受领任务后，立即出发。经20公里急行军，第四团附山炮连于21日17时进占姚家沟口地区，并以第三营抢占老君岭要点。这时，第五十七军先头部队由北向南也来到了姚家沟口。第四团先敌开火，将其堵在沟内。

18时，第二师全部到达。师长王尚荣以第四团沿西山梁及沟内向北进攻，以第五团主力沿东山梁包围攻击，以第六团主力位于大原上作为第二梯队。部队展开后，战斗发展极为顺利，至21日黄昏前，第四、第五团共俘敌1000余人。

20时，贺炳炎率第一军指挥部到达横水镇，得知第二师正在激战，遂命令第一师迅速前往，协助第二师作战。

第一师经急行军于22日2时进至大原上，师长黄新廷与王尚荣商量后，即以第二团顺着沟向纵深进攻，以第三团于后山庄以东山地，与第五团并肩由南向北攻击。

在第一、第四军的南北夹击之下，第五十七军与第三十师就像一条待死的长蛇，瘫痪在麟凤公路两侧。徐汝诚的吉普车很快被打坏，妻子受伤，女儿滚到公路一旁。徐汝诚也顾不了这么多，从南面跑到北面的第三十师阵地，找到王敬鑫气喘吁吁地说：

“王师长，你看怎么办？”

“军长放心，让本师即行攻击，即使打到一兵一卒，誓与解放军周旋到底。”王敬鑫自负地说。

为了突出重围，21日黄昏前，在第五十七军火力的掩护下，王敬鑫以第三十师第八十八团由北向南进攻，以第九十团跟进，结果很快被打了回来。王敬鑫一怒之下，命令第三十师的6门美式山炮向解放军阵地轰击，但却暴露了自己的炮兵阵地位置。不久，解放军的炮弹向其炮兵阵地呼啸而来，把王敬鑫打得神色陡变，躲到公路西侧的一个窑洞里以酒壮胆。

由于第五十七军都是学生兵，配备的是美式卡宾枪、冲锋枪，缺少重武器，21日24时左右，徐汝诚又找到王敬鑫说：“本军训练时间短，战斗力差，全靠贵师英勇奋战，如能安全突出，我担保面请胡主任重赏你师官兵。”

于是，王敬鑫又来了一次半夜突围，但同样被打了回来。两次突围不成，官兵失去信心。这时，解放军开始冲进山沟抓俘虏了。一不做，二不休，徐汝诚于22日5时决定，由王敬鑫组织掩护，部队向西北方向突围。解放军遂发起总攻，穷追猛打。战至10时，第一、

第四军部队在铁王沟胜利会师。除徐汝诚率一部突围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解放军在整个姚家沟追歼战中共俘敌 8000 余人。王敬鑫被击中腹部，被俘后不久死亡。

王震率领的第二军一路过关斩将，第四师于 22 日 3 时占领虢镇，与国民党军第五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的宝鸡守军隔千河对峙；第六师于同日拂晓攻占眉县；第五师于同日 11 时攻占凤翔，俘敌千山守备司令李梦笔以下 1800 余人。

胡宗南见解放军攻势迅猛，为争取撤退时间，遂以第三十六军主力南渡渭河，控制斜峪关以南的秦岭褒斜古道，以该军第一六五师前出扼守斜峪关、棋盘山和五丈原，借以威胁第一野战军的侧后安全。

斜峪关是褒斜古道的北入口；五丈原南靠秦岭，北临渭河，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曹魏、与司马懿隔渭河对阵、死而后已的地方；五丈原南面的棋盘山，山顶岩石平坦，形似棋盘，传说是诸葛亮下棋的地方。这三个地方不是南塬，就是山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为求歼第一六五师，24 日王震以第四、第六师从阳平镇渡渭河南进，准备进攻五丈原。守军见解放军力量强大，不战而逃到了棋盘山。王震遂以 5 个团从左右两翼对棋盘山发动钳形攻击，并首先从右翼突破了守军阵地。第一六五师全线动摇，迅即沿褒斜古道向南逃跑。担任预备队的第六师第十七团，奉命从斜峪口一直追到 10 公里以外的莺歌咀（今太白县鹦鸽镇）方才收兵。

经过追击作战，除第三军外，各军均有斩获。根据 1949 年 5 月 30 日张宗逊《关于四个月工作情况向毛泽东主席的报告》，在这次追击作战中，第四、第六军的歼敌制胜士气特别高，第三军的部分指战员对担任战役预备队、没有捞到仗打有些想法，因而产生了“二军追，四军截，一军堵，六军进西安，三军吃干饭”的说法。

在战争年代，各军都唯恐自己的战绩落在其他军的后面，甚至每

个战士都有自己的歼敌计划，这是革命的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体现。但打仗是有分工的，有的打主攻，有的打牵制，有的当预备队。没捞到仗打的部队有些牢骚都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西安终于解放了

延安和西安，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成为两个标志性的城市。延安小，但它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西安大，它却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在西北的象征。从一定意义上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西北决战，就是延安与西安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博弈！

194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胡宗南向蒋介石谎报在延安地区“歼敌五万”，让范汉杰在西安大放鞭炮，庆祝“陕北大捷”。蒋介石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又是给胡宗南发嘉奖电，又是授予他二等大授云麾勋章，8月7日还乘坐美龄号飞机到达延安，召开作战会议，以彰显其进攻陕北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毛泽东断言，胡宗南占领延安“标志着国民党匪军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战争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从放弃延安开始，仅仅过了一年零一个月，到1948年4月21日，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又过了一年零一个月，到1949年5月20日，解放军的红旗飘扬在西安的上空。

延安与西安的博弈，真可谓天翻地覆、沧海桑田！

战败的胡宗南，就像掉了毛的凤凰，部署完紧急撤离，即于1949年5月18日乘飞机逃跑，在汉中开设了西安绥靖公署，把最后防守西安的任务交给了第十七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

杨德亮指挥工兵首先破坏了咸阳至临潼的陇海铁路桥梁，以阻止解放军进入西安，接着又派出由警察等1000多人组成的“火焰别动队”，准备收缴各厂工人自卫队的枪支，对西安工厂企业的动力系统

进行破坏，以便给共产党留下个烂摊子，使西安的工厂企业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生产。中共西安工委领导西安各界人民展开护厂、护局、护校斗争。

西安解放在即，接收西安的工作迅速提上了西北局和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在接收西安的各项工作中，首要的是建立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便在西安解放后能够迅速肃清反动残余势力，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建立新的革命秩序。为此，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西北局于5月7日向中央军委上报了西安军管会人员名单。

由于胡宗南放弃西安事发突然，彭德怀、贺龙当时又不在陕西，中央军委本着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于5月16日在西北局所提贺龙、贾拓夫、甘泗淇等9人为西安军管会人员的基础上，新增加了赵寿山等3人，并以贺龙为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为副主任，另以贾拓夫为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央军委要求，“西北局本身及其所准备的接管西安的三千余干部均应立即出发向一野靠近，以便不失时机进入西安”。18日10时，张宗逊也致电习仲勋：“请你及西安军管会主要干部一二日内赶来前方，主持进西安工作，其他接收干部亦须从速赶来。”

事实上，从1949年3月1日开始，在西北局之下就成立了以贾拓夫为主任的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简称“西准会”），进行调训干部、收集情况、研究政策、草拟条令办法等工作。5月9日，“西准会”根据西北局的决定，要求所有准备接收西安的干部，一律于15日前离开延安移驻铜川、耀县一带，以便随时跟部队入城。

5月10日，习仲勋在延安桃林广场举行的接收西安干部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把城市管理好和建设好。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第三野战军进入南京的部队误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住宅、闹出不少乱子的通报，习仲勋特别告诫接管西安的全体干部，必须加强纪律性，一切均需按照政策办事，不许违反政策，所有重要工作和重要事项，都要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发现新问题时，先请示上级，再去处理，不许自作主张，先斩后奏。

针对农村干部入城后可能产生的享乐思想以及不懂城市管理但又不愿学习等问题，习仲勋号召大家：

要坚定无产阶级立场，要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特别是努力学习，对于管理和建设城市的知识，必须从做小学生起，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我们不怕不懂，只怕不学，只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我们就可以成为大学生；反之，怕当小学生，则永远是个小学生。

习仲勋讲得非常精辟和透彻！中国共产党实现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就是要从学习管理和建设城市的知识做起。

1949年5月，是西北战场的收获季节！

南面的胡宗南逃跑需要接收西安，北面驻榆林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也派人到延安，寻求和平解决榆林问题。西北野战军曾两次攻榆林未下，现在有了和平解放的希望，自然是西北局的一件大事，需要习仲勋亲自处理。鉴于自己暂时不能前往西安，贺龙又在外地，习仲勋于5月18日在签发《西北局关于组成西安市军管会的通知》时，特别指出：“在贺龙同志未回来以前，由贾拓夫同志负责主持军管会及准备筹划所有接管西安市工作。”

西安解放后，西北局、西北军区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势必也要进驻西安，中共在西北的政治中心要由延安迁入西安，为巩固老区、发展新区起见，由习仲勋主持的西北局、西北军区于5月4日作出了成立陕北军区的决定，并以张达志为司令员、张合邦为政治委员，下辖延安、绥德、黄龙、三边、榆林5个军分区，负责解放榆林、巩固后方

治安、支前、剿匪与转入生产建设等工作。5月5日，陕北军区正式成立。

5月9日，习仲勋亲自起草了西北军区致中央军委并转贺龙的电报：“西北军区本身，司、政、后勤已组织军事处，在西安军管会直接领导下，担负接收西安绥署、保安、宪兵、防空司令部、第七补给区等敌军军事机构，于十一号出发，先到同、耀间集训待命，其领导机关随后续进，靠近野战军，待西安解放，秩序稍稳后再前进，剩下后方家属，则组织留守处，暂留延安。”

尽管彭德怀、贺龙不在陕西，但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和平解放榆林、巩固后方、接收西安以及支前等各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局的指示，贾拓夫率领接收西安的干部迅速南进，跟上了第六军的前进步伐。

5月19日18时，第六军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徐立清，率部队来到咸阳以北，发现咸阳到西安的渭河铁路桥已被炸毁，关中八景之一的咸阳古渡的船只，不是被破坏就是被拖到南岸，部队只能涉水攻击前进。

渭河到咸阳附近，呈西南东北走向，水深一米多，铁桥对岸守军有敌暂二旅第六团等部防守。罗元发决定，要在守军正在做梦、其哨兵正打瞌睡的时候实施渡河，遂作出如下部署：第十七师第五十团于20日拂晓歼灭渭河铁桥对岸之敌，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在铁桥上游、咸阳城以南偷渡，第十六师第四十七团在铁桥下游、林场附近偷渡，配合第五十团夺取南岸敌人阵地后掩护全军渡河。

入夜，担任夺桥任务的第五十团团长江光汉在渭河北岸踱来踱去，为找不到船只到对岸去侦察敌人的碉堡和火力点的配置而焦急。这时，一位30多岁、挽着裤腿的农民水手来到他面前激动地说：“解放军来救我们，我拼了命也要领队伍打过河去消灭敌人。”刘光汉随即让

第二营水性好的班长谢康生同水手一起过河。两人一下水，敌人就乱开枪，只见他们在水中时隐时现。水手游在前面，一边游一边插杆子作浅水标记，一直插到南岸。他们摸清了敌人的碉堡和火力点的方位后，又游回到北岸。刘光汉把这位不知姓名的农民称为“可敬的水手”。

5月下旬的关中平原，到处飘着浓浓的麦香；半夜过后的天空逐渐变得越来越暗。

趁着黎明前的黑暗，上游的第四十九团于20日3点30分、下游的第四十七团于4点开始偷渡，第五十团则于4点30分开始渡河。对渡河作战，罗元发回忆道：

我和军里其他几位领导在指挥所里等待着两个偷渡的先头团的消息。突然，敌人阵地上飞起几颗照明弹，把河水照得通明，紧接着敌人的炮火猛烈地向我渡河部队射来，飞起一股股水注。我的心情有些沉重，正要查问各部队情况，程悦长师长（第17师师长——引者注）打来电话向我报告说：四十九团刚刚进到河心，就被敌人发现了，处境十分危险。我当机立断，偷渡不成即改为强渡，命令各师集中一切火力，掩护渡河部队，一定保证强渡成功。

霎时，我炮兵开火了，一排排炮弹腾空而起，飞向对岸，隆隆的炮声在敌人的阵地上发出天崩地裂的响声，敌人阵地上冒起了滚滚浓烟。我感到心头一阵轻松，在电话中大声喊：“狠狠打，不要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在炮兵的掩护下，第四十九、第四十七、第五十团迅速冲向南岸，守军稍事抵抗即向南溃逃。

第六军主力渡河后，天开始放亮，各师按照预定计划，第十七师由西向东南穿插，第十八师由北向南挺进，目标直指西安！

第四十九团在枣园一带击溃西逃的敌第四十八师一个营后，乘胜

向西安进攻，10时左右来到西门城下，“用炸药炸开了第一道门后，潮水般冲进了西门，占领了西门城楼”。守军除在鼓楼稍事抵抗外纷纷投降。

第五十团到达三桥镇后，乘坐火车追击敌人。

在解放军历史上，乘坐火车追击敌人，这恐怕还是第一次。张宗逊、赵寿山于5月21日致电中央军委：“三桥镇有火车头四部，工人自动开车载运我进攻部队追击敌人。”西北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对此事也作了专门报导：

解放军“龙江”部队（指第五十团——引者注）的战士们，徒步渡过了渭河，当他们看到了匪军们炸坏后的咸阳铁桥都气愤的说：

“妈的！黄河长江也挡不住解放军，渭河就能挡住了吗？谁炸了桥将来捉住非当战争罪犯严办不可。”雄纠纠的健儿们沿着陇海路向西安挺进，沿途修路的工人们亲切地和解放军同志握着手。工人眷属们忙碌着抬水劈柴、烧水，一盆一盆的茶水端到解放军面前说：“同志们辛苦了喝一碗”，一勺一勺的又舀到解放军同志的缸子里。

解放军的尖兵到了三桥车站时，工人李平章马上开了摇车，和尖兵到前面侦察敌情。跑到三桥以西十几里路迎接解放军的10多个工友们，当见到解放军同志时都大声喊着：“同志们！快点走，火车在等着你们，去解放西安！”战士们听到这种亲切的招呼，忘记了疲劳，更加迈紧了脚步。

到了三桥车站，墙上贴着大标语：“欢迎我们工人自己的队伍”，“欢迎解放军要积极的增加生产”。开水、洗脸水摆满了铁路两旁，工人们亲切的拉着解放军同志喝水洗脸，战士们愉快的互相谈论着：“工人和咱们真是一家人”。车站上欢迎解放军的人也愈来愈多，工人、老百姓，大家目不转睛地在注视着每个解放军战士们的脸上，好象在发现着什么心爱的东西一样，“三桥车站从来还没有这样红火

过”，工人们愉快的谈论着。

工人把解放军同志一个一个招呼上了车后，汽笛响了，火车开动了，司机高兴地说：“今天才真正的送自己的队伍。”

火车开到离西安 10 华里的郭家口时和 100 多个敌军遭遇了，机枪就架在机车的顶上，步兵就马上下车，迅速地把敌人包围了，一阵激烈的战斗后，一群一群的俘虏押到了郭家口村。

这时，胡匪的飞机在天空低飞哀鸣着，机枪不时扫射，但工人们毫无惧色，把车倒回去，转运第二批解放军了。

第五十团到达西安火车站后，接着夺下西安北门，与第四十九团在鼓楼会合。

王正臣率第六军的侦察部队经大王镇直奔户县，伪县政府和自卫队向解放军投诚。

第十六师第四十七团渡河后向好汉庙一线攻击前进。6 时半，第十六师各团稍事休息，继续前进。第四十八团攻占了西安的西郊机场，之后与第四十六团直插西安以南。第四十六团从南门攻入西安。11 时，第四十六、第四十九、第五十团在钟楼、鼓楼一带汇合。所以，张宗逊、赵寿山于 5 月 21 日致电中央军委：“我六军于二十日拂晓由咸阳渡过渭河，歼保二旅一部，于十一时进入西安城。”

至 20 日 18 时，第六军全部到达西安。杨德亮率第十七军直属部队逃到了宁陕县北部的东江口，其第十二、第四十八师分别在子午口、洋峪口布防。

解放军入城后，迅速肃清残敌，保护工厂企业，受到西安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1949 年 5 月 27 日的《群众日报》，以《西安工人学生市民热情欢迎我军入城》为题，对欢迎盛况进行了报导：

解放军于 20 日进入西安城时，受到工人、学生及市民的热烈欢迎。当解放军刚冲进城内，用机枪向尚未缴械的公安局敌人发射时，

一群兴奋的群众即亲切地拥至我战士跟前表示慰问。21日解放军整队进入市内，火车站和各条大街上均出现“毛主席万岁”、“解放军是人民的救星”等大幅标语。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及西北农学院留在西安的学生，齐集街头，热烈高呼口号。到处响着欢迎解放军的鞭炮声，慰劳品一批一批地由各界代表送到解放军驻地。21日，解放军即派去代表向在饥饿中斗争的工人进行慰问，工人们已开始为迅速恢复城市的生产工作做最大的努力，公用汽车不断地载着电机工人到处去修理各种电气设备，城东北的发电厂的工人，也正紧张地工作着。

罗元发、徐立清于20日14时进城，把第六军军部设在了原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止园。一野政治部秘书长兼联络部长范明奉命前来帮助工作，他刚一坐下就风趣地说：“前天还住在破寒窑，今天就住上公馆啦，真是今非昔比呀！”

徐立清笑着说：“在这大城市里，为了联系方便，还非住在有名气的地方不可。”

在欢迎的人群当中，还有一批特殊的人群，这就是中共西安市工委和中共西安情报处的人员。他们长期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隐姓埋名，甘当无名英雄。由唐磊（韩夏存的化名）、杨荫东领导的中共西安工委，完成了组织赋予的各项任务并领导了西安各界人民的护厂、护局、护校斗争，把敌人撤退时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由王超北领导的中共西安情报处，向陕北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贺龙曾经说，在西安是“地上胡宗南，地下王超北”。

如今西安解放了，唐磊、王超北等终于从地下走到地上！他们到止园迎接罗元发同志。两条战线的战友相遇，兴奋异常，欢腾热烈的气氛充满了整个止园！

看到西安解放了，古都新生了，王超北心如黄河水，奔腾起伏，于是步王昌龄《出塞》诗原韵，作了《祝彭贺习解放西安》：

周秦明月汉唐关，长征英雄凯歌还；
龙城虎将喜健在，横刀立马终南山。

他把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比作龙城飞将，盛赞他们率领由红军发展起来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安，使西安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解放军进城后，严格执行城市政策。当时，国民党的纸币已经停用，市场流通的是现大洋，部队带的都是西北农民银行发行的“边币”，在币值未确定前，部队决不乱买东西，对稳定西安的市场起了重要作用。

1954年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六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以下简称《第六军战史》）记载：“城市的政策遵守的很好，十七师五十团二营过渭河后鞋子陷于河中，赤脚追击逃敌，追至西安车站，该处有很多鞋子，但没有一个随便乱拿的，仍然继续追击敌人，在票价未规定前没有购买东西的，大家吃点干粮喝点水充饥，菜都无随便去买。”由于第六军进城后秋毫无犯，西安市民称赞解放军是“仁义之师”。

解放西安的作战共歼敌2000余人，缴获飞机21架（10架修理后可用）、山炮21门、弹药仓库数座。敌人炸毁了发电厂、机器厂和面粉厂的锅炉。

从5月20日开始，东府军分区的部队南渡渭河，在第六军一部的帮助下，至24日先后解放了临潼、渭南、华阴、华山和蓝田，使西安周边各县均获解放。

5月23日，西安警备司令部成立，张经武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治委员，罗元发任副司令员。

5月24日，西安军管会进驻西安，正式对外办公。

6月1日，榆林和平解放。

6月3日，习仲勋率西北局进驻西安。

古都西安见证了 13 个王朝的兴衰更替，今天它又见证了解放军进入西安！人民成了西安的主人！

解放军经过半个月的追击作战，获得以下 3 个主要成果：

第一，解放了虢镇及千河以东的关中平原，为解决第十八、第十九兵团等部入陕作战所需的粮食问题创造了条件。

第二，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和第三十师，为此后与胡马决战创造了条件。

第三，解放了西安，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陕甘宁边区政府之进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工作的重心正式由农村转入城市。

特别是解放西安，其政治意义非常之大。它标志着“西北王”胡宗南在陕西 12 年的反动统治宣告结束，这对西北解放区军民的鼓舞及对胡马军队的打击和震撼都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才有了胡马联合反扑西安的历史闹剧。

“收复西安，杀出潼关”——胡马联合反扑

“我们的官是从血里捞出来的。”

马步芳的这句话，道出了马家军的发家史充满了阴险和毒辣、凶暴和残忍、杀戮和血腥。

其实，马鸿逵与之相比也难分伯仲。

马鸿逵，回族，甘肃省河州（今甘肃临夏市）韩家集阳洼山人，其父马福祥。1895 年，甘肃回民爆发“河湟起义”。马福祥率领自己编练的地主武装，帮助清政府镇压了这次起义。以后，马福祥在宦海沉浮的官场见风使舵，先后任清政府的巡防统领和北洋政府的宁夏镇守使、绥远都统等职。马鸿逵在父亲的庇护下，先后任骑兵营营长、第五混成旅旅长、新编第七师师长。1929 年，马鸿逵联合韩复榘、石友三脱离冯玉祥投靠蒋介石。1930 年，中原大战爆发，马鸿逵部被蒋介石扩编为讨逆军第十五路军。1932 年，马福祥病死，蒋介石

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从此，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长达 17 年，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形成了割据宁夏地区的回族军阀。

“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这是马鸿逵的一句名言。他任宁夏省主席期间，大肆抓兵扩军，搜刮民脂民膏。到 1946 年全面内战爆发前，其主力部队有 3 个整编师（包括马鸿宾的整编第八十一师），9 个旅，6 万多人。他 1949 年离宁夏时，用美国航空队陈纳德的飞机运走的黄金就达 7 吨半之多。因而宁夏百姓编出了这样的民谣“听要兵，哭号啕，乡长保长偷着笑。三征兵，四征粮，先拉骆驼后宰羊，马鸿逵不久长。”马鸿逵的凶残远近闻名，就连陕西岐山一带的孩子只要听父母说“别哭了，再哭马鸿逵就来了！”吓得立刻就不敢哭了。

与胡宗南一样，马鸿逵也有自己的用人标准。这就是“甘、马、回、河”，即他用的人一律要甘肃人，姓马，回族，特别是河州籍的人才吃得开。符合这一标准的稍有能力的人后来都提升为高级军官，中下级军官则由自己教导团培养出来的学生充任，对蒋介石派来的军校和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则予以排斥。马鸿逵以这样的用人标准，把军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如果说马鸿逵家族是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那么马步芳家族则是先参加农民起义后又投降清政府起家的。

马步芳，回族，甘肃省河州（今甘肃临夏市）韩家集阳洼山人，祖父马海晏，父亲马麒，兄长马步青。1871 年，甘肃回民反清，回民领袖马占鳌率领马海晏等大败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军队，但又随即降清，掉转矛头，对回民大肆屠杀。以后，马海晏病死，马麒先承袭马海晏旗官之职，后又任北洋政府的蒙番宣慰使和甘边宁海镇守使，国民党政府的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在父亲的庇护下，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新编第九师师长。1930 年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战败，马麒立

即倒冯拥蒋，马步芳则进军甘州(张掖)，将冯玉祥留下的雷振邦旅 200 多名官员，全部用大刀砍死。马麒死后，由于马步芳“尽忠报国”，蒋介石把新编第九师被扩编为新编第二军（后又改为第八十二军）。随着羽翼逐渐丰满，马步芳便把叔叔马麟排挤出青海，1938 年出任青海省主席。1943 年，马步芳又逼哥哥马步青交出骑兵第五军军长职务到察汗乌苏垦荒。至此，青海成了马步芳的一统天下。

为扩建军队，马步芳一面在省内盘剥百姓、收敛钱财，一面按五抽四、四抽三、三抽二、二抽一的办法，大肆抓丁，成立“国民兵团”，作为其嫡系部队的外围。其嫡系主力到 1946 年全面内战爆发时，有 2 个整编师，6 个旅，6 万余人。但强拉硬派的拔兵方法，成为民间数十年来的最大苛政，逼死人命和倾家荡产的比比皆是。民间听到拔兵和捉兵，连小孩也噤若寒蝉，不敢作声。因此，青海的民歌“花儿”唱道：“上山的老虎下山的狼，凶不过青海的马步芳。”

马步芳用人的唯一原则就是“惟亲是用”，凡有裙带关系的，皆能当官，从而使军队带上了浓重的家族色彩。马步芳的军政大权主要操于堂弟马步銮，表弟马全义，外甥马呈祥、马振武等人之手，自己则总其成。从地域上说，原来马步芳家族所使用的人主要来自河（州）湟（中）一带，后来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尽管出现了几个地域的派系，但始终是以二化（循化、化隆）系为中心。马步芳家族还利用宗教实行愚民政策。从马麒开始，就要求青海回民信奉新兴教，到马步芳时期，所使用的阿訇和军官都信奉了新兴教，从而使军官在思想意识和政治行动上完全一致，使马家军成为了一支同家族、同地域、同宗教、完全听命于马步芳一人的封建军阀军队。

1932 年，马步芳发动青藏战争，打击了西藏分裂势力，夺回了囊谦等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同时也获得了蒋介石的军火援助。

但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马步芳积极反 G，不仅使中国工农红军西

路军遭到失败，还大肆屠杀和虐待红军战俘。

1936年，红四方面军第五、第九、第三十军组成的西路军，在靖远西渡黄河。马步芳奉蒋介石之命，率“青马”倾巢而出，在“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的口号下，对西路军疯狂追堵，致使红军在高台和倪家营子等地血战，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牺牲，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遇害。马步芳把被俘的3000多名红军用来筑路和修建营房，战士稍有不慎，立遭枪决；用来给马家军抬担架的红军战士，如果体力不支，即被大刀砍死；被押到西宁进行甄别的，凡年老、患病及受伤者，遭分批杀害。其中，刽子手将一个七八岁的小孩，绑在一位女红军身上，然后一刀将女红军砍入坑内，小孩大叫一声“妈”也坠入坑中。惨烈之状，使人目不忍睹。据有关史料统计，红军被俘后惨遭杀害者6000多人，仅在张掖就有3267人被杀，在西宁南门外的万人坑就挖出西路军烈士头骨1800个。对被俘红军女战士及女医护人员，凡年轻面目清秀的，分别赏给部下作婢妾。“青马”凶暴残忍，罪恶滔天。难怪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后期要求对其坚决消灭。这自然是后话。

蒋介石既想利用西北诸马，又怕他们尾大不掉，所以一直控制着兰州及河西走廊，用以分割“青马”与“宁马”，保持连接新疆的通道。为了更好地控制西北诸马，抗战期间蒋介石又想出了一个成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主意，由挂名的回教徒白崇禧组织实施。白崇禧也想攫取对全国回民的领导权，他出任协会理事长后，就聘任马步芳、马鸿逵为名誉理事长。这样，马步芳和马鸿逵又与白崇禧扯上了关系。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军阀敢与蒋介石抗衡，都听命于蒋介石，参加了反G反人民的内战。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马鸿逵派兵进犯三边（靖边、安边、定边），马步芳派长子马继援率整编第八十二师进犯陇东，配合胡宗南的军事进攻。

然而，两年过后，江河日下，形势逆转！

“二马”却开始争夺甘肃和西北的领导权！

1949年3月，南京政府把西北军政公署长官张治中从兰州调回南京，准备到北平参加国共“和谈”，其职务由甘肃省主席郭寄峤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代理。郭自1947年主政甘肃后，贪污横行，为各方反对，已难立足，再加上南京密电马鸿逵，暗示他与马步芳会商，由他们二人中选一人充任长官。于是，马鸿逵与马步芳争夺西北军政公署长官和甘肃省主席职位的斗争由此开始！

4月下旬，马鸿逵以养病为名住到兰州，在揭露和指责郭寄峤准备发行硬币30万元甘肃建设公债的同时，每日宴请各方大员，请他们为自己制造舆论。他还邀请马步芳、马鸿宾来兰州，共商西北大局，俨然以“西北王”自居，但遭到马步芳、马鸿宾来电拒绝。

据有关回忆史料记载，就在马鸿逵在兰州大肆活动的时候，马步芳也没闲着，开始施展“黄金外交”。青海生产黄金，马步芳依靠手中的黄金，打通了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的门路。李、阎认为：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滑马”，在此“戡乱”的紧要关头，只能使用“野马”。

其实，由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是“小诸葛”白崇禧的主意。1949年4月渡江战役开始后，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部遭到解放军的围攻，不得不乞灵于西北诸马，叫他们进兵陕西，以牵制解放军。当然白也知道，要叫他们出兵，必须给以好处。他看到马鸿逵和马步芳垂涎甘肃地盘已非一日，现在要想利用马鸿逵和马步芳的回族力量，就非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和甘肃省主席两个职位作为条件不可。问题是谁当长官，谁当主席。白几经考虑，认为马步芳是匹“野马”，比较容易利用，若让他当长官，还可出来拼一阵，马鸿逵是匹“滑马”，有些靠不住，可先让他给马步芳当副手。但又

恐二马各不相下，最后还是由白授意马鸿逵，叫他保举马步芳当长官，过一个时期再由马步芳保举马鸿逵当甘肃省主席。李宗仁、阎锡山正是采纳了白崇禧的建议，才打算委任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的。

马鸿逵见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当不成了，只能退而求其次，争取当上甘肃省主席，扩大地盘。于是，他致电马步芳，约定于1949年5月5日在甘青边的享堂村会面。这天上午，两马在会谈中从西北大局谈到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的继任问题。

马鸿逵抢先说：“子香（马步芳号），咱们自家人，你当长官，等于我当长官一样。我主张你由西宁坐镇到兰州，也免得郭寄峽给我们难看。”

“我当长官恐怕不行，还是你好。”马步芳鉴于马鸿逵是自己的长辈，对马鸿逵客气道。

马鸿逵接着说：“我们说实话，你这样推诿，怕耽误大事。”

“你怎么办？”马步芳又问。

马鸿逵顺口回答说：“副长官兼甘肃主席，就近可以给你帮忙。现在郭寄峽从中作梗，真是我们的眼中钉。”

马步芳立即同意他的主张：“这样办也好，只要我们到一块，什么事都好商量。”

于是，两人进一步约定：各自返回驻地后立即致电“国民政府”互相保荐。

1949年5月18日，马步芳被任命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7月27日被任命为长官）。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马步芳走马上任之日，正是胡宗南率部逃离西安和关中平原之时。而胡部向陕南和宝鸡撤退，则把陇东和西兰公路的侧翼完全暴露，使

马家军处于一野的直接攻击之下。如何挽救西北危局？是马步芳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

据马步芳部下韩有禄、马尚武回忆：

马步芳父子正在暗中筹划撤退时，忽于5月18日，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表了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的命令。马步芳接到指令后立即放弃由陇东撤回兰州的念头，增大了由他统一西北的野心。但是由于胡宗南部退出西安，据守凤翔、宝鸡和秦岭，陇东和西兰公路完全被暴露，使马继援防地直接受到威胁。马步芳父子为了保障自己巢穴的安全和实现代替胡宗南统治西北的幻想，随即电蒋（介石）请缨出兵咸阳，与马鸿逵共同协助胡宗南收复西安。这时，蒋介石在南线正望风披靡，处于绝望之际，看到马步芳愿为他效劳，喜出望外，即电飭胡宗南出兵协同青海、宁夏两马兵团，反攻咸阳，收复西安。

对“电蒋请缨”一事，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宝鸡指挥所主任的裴昌会回忆说：

因胡宗南退据凤翔、宝鸡和陕南后，陇东和陕甘公路完全暴露，马家的地盘立即受到威胁。马家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和代替胡宗南统治大西北的幻想，跃跃欲试，由马鸿逵出面电蒋介石请缨，愿出兵协同胡宗南部恢复西安。

这样，对“电蒋请缨”就有了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是马步芳父子，一种认为是马鸿逵。但估计很可能是，在马步芳父子给蒋介石打电报的同时，马步芳也鼓励马鸿逵要对蒋表明态度，因而形成二马同时“电蒋请缨”。所以，台湾方面的战史这样写道：

西北方面宁、青将领鉴于甘肃东翼暴露，兰州感受威胁，决难自保，必须夺回西安，宁、甘、青诸省始能安全，遂建议与西安绥署协同反攻，并保证愿出全力。统帅部批准所请，并令西安绥署遵行。

马家军的“电蒋请缨”给胡宗南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

胡宗南之所以放弃关中，是因为他认为：“秦岭山区，自古即兵险要地，我据此有利地形，正可以残破之兵力，遏阻匪之南攻，进而争取充裕时间整训部队，强化战力，保有与匪一决胜负于来日之机会。”“我若贸然以不足之兵力，放弃地形之利，进入关中平原，过早与匪决战，万一有失，能否确保秦岭山隘，并再振兴当年雄风，殊有疑问。”

但蒋介石既然已经下令，胡宗南又不好违抗，于是便找了一个对上对下都能交代的理由：“秦岭山区，地瘠人稀，生产毫无，一切仰求后方。我军自退守山区后，部队集，粮食短缺，补给日感困难，影响所及，士气颇废，军纪不展，长此以往，尤堪忧虑，如能藉马部之通力合作，重新掌握泾渭粮仓，则此一顾虑，当可不扫而空。”“马家军向来拥兵自重，自立门户，除马继援部外，极少予绥署以任何赤诚支援，如今竟自愿全力出击，无论于公于私，均不便拒绝。”

都说胡宗南能言善辩，通过以上他对恢复关中平原利弊得失的分析，可见一斑！在胡宗南看来，退有退的理由，进有进的道理！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胡宗南派人到兰州几经磋商，与马步芳商定了反扑关中、规复西安的作战部署：

一、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方面

（一）马继援司令统一指挥陇东、宁夏兵团，于六月上旬集结平凉以东，准备沿西兰公路、泾水两侧，向东南席卷，夺取咸阳，断匪退路，包围匪军而歼灭之。

（二）第一一九军附一九一师，为陇南兵团，归裴昌会司令指挥，于六月上旬集结于陇县东北地区。

二、西安绥署方面

（一）第五兵团裴司令指挥第五十七、第三十八、第六十五、第九十军、第三十师及陇南兵团，准备沿渭水北岸向兴平攻击前进，协

助宁夏、陇东兵团，围歼渭北之匪于咸阳以西，并准备以一部南渡渭水，策应第十八兵团。

（二）第十八兵团李振司令指挥第三十六、第十七、第六十九、第三军，分路出斜谷关、子午镇、大峪口，歼灭渭南之匪，规复西安，并准备北渡渭水，协助第五兵团。

（三）第一军由凤县准备向虢镇以南渭水河畔挺进，扫除南岸之匪，掩护第五兵团南侧，并竭力与第三十六军联系。

（四）陕保旅及骑二旅，随作战之进展，任第五兵团与陇东兵团之警戒与联络。

攻击发起时间，预定为六月十日。

作战计划刚刚制定，胡宗南就听说解放军第十九军在陕南发动攻势，连克白河、平利。为避免夜长梦多，他一面调兵防堵第十九军，一面与马步芳经过再次协商，把进攻时间提前到6月9日。

由马继援任司令的陇东兵团，下辖第八十二、第一二九军共计5个步兵师、2个骑兵旅6万余人；由马鸿逵次子马敦静任司令、由卢忠良兼赴陕军指挥官的宁夏兵团，下辖第一二八、第十一军共计3个步兵师、2个保安纵队、2个骑兵团、2个炮兵营4万余人。

别看宁夏兵团有两个保安纵队，但其战斗力不逊于其他正规师。这是马鸿逵为防止蒋介石收编其军队，特意把精锐抽出来编成的。难怪白崇禧说马鸿逵是一匹“滑马”。

大战在即，带着对未来出任甘肃省主席的憧憬和把部队交给马继援指挥的担心，马鸿逵于5月28日赶到甘肃平凉，检阅了陇东兵团和宁夏兵团并发表讲话：“我们宁夏和青海是兄弟一家，不应该分彼此，互相帮助，团结一致，保卫西北，保卫家乡。”

马继援接着说：“我们是患难兄弟，要精诚团结，我们有这么多的人马，只要拧成一股绳，遇到任何力量，绝对不怕。”

最后，马鸿逵给陇东兵团师以上军官每人送手表 1 块、每团发硬币 100 元，马继援也给宁夏兵团团长以上军官每人送马 1 匹，表示互相关切。

享堂会议后，马鸿逵认为甘肃省主席唾手可得，不料马步芳开始对其态度冷淡。马步芳到兰州后，清洗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原有官员，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对副长官郭寄嶠采取拉拢态度，虚情假意地让他继续主政甘肃，以抵制马鸿逵的插足；恭维白崇禧的亲信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以便让他在兰州与“中央政府”之间架起桥梁；最关键的是，他开始得陇望蜀，想把甘肃省主席的位置留给自己的儿子马继援，根本不向上保荐马鸿逵。这时，马鸿逵还完全被蒙在鼓里，当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国共的西北大决战已经开始。

1946 年 6 月 10 日，胡马联军 21 万余人，在“反扑咸阳，收复西安，杀出潼关，横扫中原”的叫嚣声中开始反扑！马继援率陇东兵团和宁夏兵团沿西兰公路南下！

彭德怀的所思所想

在乾县县城西南 3 公里处有一个村庄，叫秦家庄。

这个村庄有 47 户人家，300 人左右。在村的西北角，住着宋世春一家。大约从 1949 年 5 月 23 日开始，宋世春家及附近住户的房子已经腾出变成了第一野战军的临时司令部。彭德怀于 5 月 25 日乘吉普车赶到秦家庄，就住在宋世春家里。

在秦家庄，彭德怀与张宗逊、赵寿山针对胡马准备联合反扑的动向，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这就是钳胡打马！

对胡马可能的反扑，彭张赵吸取了过去的教训，早有防备，所以当部队进至虢镇后即命令第二军停止前进，暂不向宝鸡进攻，准备迎战可能的胡马联合反扑！

5 月 26 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致电中央军委，并告十八、

十九兵团，七军首长：“（一）青、宁两马匪军不少于八万人，集结灵台、长武、泾川地区。甘肃之陇南兵团约两万人，集结陇县。胡匪十八兵团集宝鸡，三军、六十九军、十七军似仍驻秦岭山地，一军具体位置不明。如我军攻宝鸡时，宁青陕匪军有攻我侧背可能。（二）为使俘虏及北平拨来之补训师补入部队，拟暂休整待机歼敌。我三军集结乾县，四军乾县以西之仪井及以南，一军扶风、岐山，二军武功、绛帐、眉县，六军长安、蓝田、户县，华北各兵团未到关中前，除特别有利外，暂不向敌进，如敌向我反扑，拟于咸阳、兴平、礼泉、长安地区各个歼敌。”

毛泽东听说彭张赵在华北部队未到前就准备与胡马开战，即于5月26日致电彭张赵：“你们占凤翔等地，歼敌一部后，暂时停止前进的处置是对的。目前胡马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十八、十九两兵团，尚需三、四星期以后才能到达西府区域。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仅在一种情况下，即胡军向汉中退却，胡马两军又确实不能联合（即马部确实不威胁我侧翼），你们才可以不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即向汉中方向追击胡军。”

最初，彭张赵准备先胡后马，首先以第二军等部“歼击进至虢镇以东之三十八军、九十军，得手后即可停止胡匪配合马匪行动，以便专力于乾（县）、永（寿）地区对马作战”。

然而，胡军进展缓慢，马家军推进速度较快，彭张赵又把“先胡后马”调整为“钳胡打马”。

在胡马21万大军的联合进攻之下，彭张赵敢以9万余人，左右

出拳、钳胡打马，确实体现了彭德怀敢于“横刀立马”的作风！

彭张赵之所以要打马，首先在于第一野战军与“青马”在西府陇东战役中结下的“恩怨情仇”。

1948年4月16日，西北野战军主力于宜川战役后，乘敌人后方空虚，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发起了西府陇东战役。战役之初，仗打得非常顺利，26日第一、第二纵队攻占胡宗南的后方补给基地宝鸡，击毙敌整编第七十六师中将师长徐宝，缴获的作战物资堆积如山。之后，胡宗南紧急调集裴昌会的第五兵团和马步芳的第八十二军（即原整编第八十二师）等部共11个旅，对西野南北夹击。西野遂向北转移，但第六纵队教导旅被敌第八十二军的骑兵第三团包围在屯字镇。彭德怀急调第一、第四纵队救出教导旅，随即率部向东转移，5月12日到达马栏地区，才摆脱了胡马的追击。

西府陇东战役虽然歼敌2.1万人，收复了延安，但也付出了减员14973人（其中伤亡6566人，失踪和被俘8407人）的沉重代价，有的连队成建制地消失，就连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也险些被俘。“青马”凶暴残忍，5月7日在宁县一次就屠杀了解放军战俘400余人。

为了总结西府陇东战役的经验教训，1948年5月26日至6月1日，西野前委在洛川县土基镇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贺龙、习仲勋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也从延安赶来，帮助整理部队。

由于马步芳的第八十二军是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上的王牌，主力中的主力，给西野造成的危害也最大，彭德怀必欲去之而后快。所以，他在总结了西府陇东战役的经验教训后指出：

如果我们先消灭青马八十二师，将甘肃全局打开，就会使胡宗南更陷孤立。

消灭马军八十二师从革命的报复主义说是需要的，从建立麟千山脉根据地，歼灭胡军解放西北来说更需要。

我们提议消灭马军八十二师为下个战役的方针。如果大家同意，就把它作为我们此次整训的目标。我们应立即全体动员，以有进无退的精神，以必胜的信念进行一切战斗准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马军八十二师！

人都是有感情的！更何况敢于“横刀立马”的彭德怀！

其实，不光彭德怀，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解放军将帅，从来都是不畏强敌，敢于碰硬，敢于把歼灭最强的对手作为自己的作战目标！

廖耀湘的新六军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进入东北后显得不可一世。在1946年2月的沙岭战斗中，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第四纵队先后以6个团对其新二十二师的1个多团2000余人展开轮番攻击，但伤亡2100人也没有将其消灭。之后，新六军进占辽阳、本溪，遂又北上四平，攻占塔子山，迫使东北民主联军主力撤出四平。所以，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后来的第四十一军）立下誓言：“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第一纵队（后来的第三十八军）也把这句话写到自己的军歌里。

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更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主力，骄横跋扈，从淮阴、涟水一直打到鲁中山区。华东野战军将士早就憋着一口气要将其消灭。1947年5月，陈毅、粟裕采取“猛虎掏心”的战法，把整编第七十四师从国民党军密集队形中割裂出来，华野主力在“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口号的鼓舞下，一举将其歼灭，击毙了张灵甫，从而震撼了整个国民党军。

邱清泉的第五军和胡璉的第十八军都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由于第十八军“狡如狐，猛如虎”，第五军装备精良、机动迅速，使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的战局呈现了某种胶着状态。为打开中原战局，毛泽东要粟裕兵团以歼灭第五军为作战目标。豫东战役后，毛泽东又提出“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再次推迟了粟

裕兵团渡江南进的时间。

郭景云的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起家部队，在华北战场上骄狂异常。平津战役期间，杨成武兵团包围了张家口，傅作义派第三十五军前去增援。该军冲破了杨成武兵团的防御进入张家口不说，郭景云一下汽车就叫喊“解放军在哪？”就要寻找解放军作战。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攻占顺义后，傅作义要郭景云率第三十五军立即返回北平，该军第二次冲破杨成武兵团的防御迅速东进。第三十五军进出张家口如入无人之境，毛泽东下死令要杨（得志）罗（瑞卿）耿（飏）兵团抓住该军，不能使其逃回北平。杨罗耿兵团不辱使命，终于将其包围于新保安，从而使傅作义难以下决心从海上逃跑，有利于东北野战军主力对平津之敌进行分割包围。

军队打仗，打的就是士气！彭德怀把歼灭马步芳的第八十二军作为西北野战军的作战目标，要的也是这股士气！

当然，求歼敌军的主力部队，与先打分散薄弱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并不矛盾。强弱都是相对的，当敌之主力部队孤军冒进或被分割时，它就处于了劣势，解放军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而歼灭了敌人的主力部队，对双方士气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这是解放军提升部队士气和战斗力的有效手段。

虽然彭德怀提出了歼灭马步芳第八十二军的作战目标，但此后西北野战军主要还是在东面与胡宗南部作战。这次遇到了马家军，彭张赵自然想报当年的一箭之仇！

6月7日，彭德怀致电贺龙、习仲勋、张宗逊、赵寿山转第十八兵团参谋处长梁军（时任第十八兵团先遣队队长，在潼关负责军运工作）并第十八、第十九兵团首长，第七军首长：

谍息：裴匪五日致马继援电称，贵军进至麟游东南地区时，裴匪即举行反攻，马二四八师六日晚由泾川东进，并谓七日夜继续行军，

有乘我华北各部未到前向我反扑模样。我六十一军本日到达风陵渡时立即南渡，乘车开西安接替六军防务，对南山匪之三军、六十九军、十七军布置防御，六军应准备随时出动开赴乾、礼地区，协同三、四军消灭马匪之八十二军全部。

彭德怀“钳胡打马”的部署是：以第二军抗击胡宗南部由宝鸡东进；以第四、第三军除以一部控制关头、阳峪岭、铁佛寺吸引两马展开进攻外，第四军主力由临平、仪井地区，第三军由乾县地区，迎击两马之进攻，求得在运动中歼灭之；以第一军移至青化镇、法门寺地区，准备从第四军左翼向马匪攻击，以第六军集结礼泉、赵村地区，准备从第三军右翼向马匪攻击；以骑兵第二师在五峰山向彬县、永寿侦察。

由于张宗逊、赵寿山赴西安开财经会议，6月8日10时彭德怀在兴平县马嵬坡把自己对打马的进一步考虑电告毛泽东，并表示“待马匪疲劳，攻击受阻、粮食发生困难时，全力举行反攻，包围歼灭之”。

1957年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写道：“本纵（军）乃遵令横跨渭河南北两岸组织抗击，首以运动防御之方针，以三个团的兵力为第一线，分别沿西（安）凤（翔）公路、陇海铁路、渭河南岸，由岐山、蔡家坡、高店镇之线，至扶风、柳巷、青化镇之线节节抗击四天；预计其时野战军主力即可完成歼击马匪部署，我则全力于杏林镇、杨陵镇之线进行坚决抗击，以待配合野战军主力相机反击胡敌。”

看来彭德怀真的要拿青马第八十二军开刀，大干一场！

毛泽东对彭德怀以四个军打马的部署还是不放心，6月9日致电彭德怀：“齐电悉。（一）就现有兵力与马胡全力作战，似觉无全胜把握，不如诱敌深入，俟兵力集中再打较为适宜。（二）如你们认为

有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机会，我们亦同意先打一仗。（三）请将诱敌深入，待本月底或下月初兵力集中时再打有何困难及不利之点，分析电告。”

6月10日4时，彭德怀把自己的所有考虑电告毛泽东：

（一）放弃泾渭之间，撤至西安、户县、三原、泾阳，比较有以下之不利：

（1）将来仍须渡河作战，比较难以歼灭敌人。

（2）六七月时，暴雨河水时涨，徒涉有困难。

（3）咸阳一带工厂、桥梁、铁道重遭破坏，修复需时，将推迟行动。

（4）八月下旬即开始雨季，无论进攻平凉、天水、汉中，中途均人烟稀少，大军雨季行军作战不利，保持现在地区集结兵力，可提早半月。

（5）泾渭间麦熟正收，现占区可征粮二十余万石，被敌占烧毁，增加困难。

（二）在泾渭间作战，我现有兵力不占优势，但胡军士气很低，胡马互信差，麟游山天然分割胡马联系，上述情况有利我钳制胡匪，打击马匪。乾、礼以北，麟、永地多深（采取发展）。

（三）骑兵作战比较不利，敌死守宝鸡、平凉工事，我以一部抗击，付之代价，如能求得歼敌两三个军，减少将来攻坚代价。我六十一军十日晚可全部抵西安，六十军十四日可开始由潼关西运，三、八两师十二三日可归建，七军十四五日可到三原，过数日后，我即稍优势，如敌果然凶猛，形势不利于歼敌，我则撤守咸阳、户县、西安，待全力集中再出击，想不致有意外危险，妥否盼复。

其实，彭德怀坚持暂不放弃泾渭三角地带的理由，可概括为三点：第一，第十八兵团等部正陆续赶来，能保持尽量保持，实在不能保持

时再撤出；第二，麟游山天然分割胡马联系，乾县、礼泉以北地形起伏，多深沟，利于部队钳胡打马，如能在此地多消灭些马家军，可以减少将来城市攻坚时的部队伤亡；第三，部队到齐后，几十万人的吃饭是个大问题，保持泾渭三角区可以多征集粮食。

特别是粮食问题，是长期困扰西野的一个大问题。西北野战军有时打仗主要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如西府陇东战役，就是因为部队缺粮而不得不向敌人的战略后方出击；1949年的春季战役，第一野战军也是为了解决部队马上就要断粮的问题，而不得不向敌人进攻，以期能够从胡军手中夺得几个县，扩大部队的就粮区。这时既然占据了关中粮仓，对泾渭三角地带当然能保持要尽量保持。

事实上，野战军司令部也是以粮食问题要求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加快前进步伐的。

6月5日，彭张赵致电周士第、杨得志等：“西北八月即进入雨季，至十月底甚至十一月中雨季才得终止。西府（宝鸡、凤翔、千阳、陇县）麦收六月十号左右、陇东麦收六月中旬，如我军六月底、七月初不能开始战役行动，七月不能取得汉中，不能取得天水、平凉，我们不仅陷于雨季行军作战，增加不少困难，且陇东、陇南夏麦，将全部被马匪抢走，增加我军今后粮食的严重困难，请注意及此。”

所以，不要简单地认为彭张赵固执己见，甚至认为按毛泽东的指示打就算了，又何必多一个钳胡打马之举？其实彭张赵是在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军委的决议决定，他们对战场的感知更直接，有时更深刻、更具体。

正因为彭德怀向毛泽东全面谈出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毛泽东才于6月11日1时复电：“同意你的作战方针。作战时请注意先歼灭宁马一个军，然后再歼其一个军，各个击破，一次不要打多了。”

在毛泽东看来，在与马家军作战时，要先打马鸿逵的宁马，而不

打马步芳的青马，而且对宁马也要一个军一个军地歼灭，这是贯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作战原则。而彭德怀则恰恰相反，他要打的是青马的第八十二军！

但不管是打宁马，还是打青马，宁青两马必须是一个一个地来，或能够将两马分割开来。但事实上，这次两马不是一个一个地来，而是齐头并进，青马在东，宁马在西，沿西兰公路两侧南下。

6月10日，宁青两马开始试探性地进攻第四、第三军的关头、阳峪岭、铁佛寺、北注泔等阵地；王治岐的陇南兵团开始向凤翔等地进攻；胡宗南的第九十、第三十八军等部开始猛攻第二军的防御阵地。

彭德怀在野司作战室密切注视着战场情况的变化，发现敌人的整个反扑行动谨慎小心，稳扎稳打，特别是宁青二马齐头并进，难以分割，如果这样打下去，不仅无法实现钳胡打马的目的，反而可能陷入胡马的包围，难以脱身。为贯彻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彭德怀果断决定，放弃钳胡打马，放弃泾渭三角地带，进一步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等待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全部到达，再与胡马决战。

6月10日夜，是彭德怀难眠的一夜！也是作战部署发生重大调整的一夜！

6月11日1时，彭德怀与张宗逊、赵寿山等在西安建国公园发布命令：第四、第三、第六军由准备进攻的防御改为阻击，第二军继续阻击，各部于11日再阻击1天，当晚撤；第一、第二军分别撤至渭河以南的户县和周至地区，第三、第四、第六军撤至泾河以北地区。

可以想见，彭德怀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多么不情愿，他是忍痛放弃泾渭三角地带的！然而，事到临头，又必须当断则断！

次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胡马两匪军均甚谨慎，难以全部

各个歼敌，渡河决于真晚转移至渭河右岸、泾河左岸。一军集结户县，二军周至，三、四、六军泾阳、云阳、口头镇地区，泾河西岸北屯镇、阡东镇、北杜川各留小部，筑前据守桥头阵地，保证我随时渡泾河向敌出击。六十一军主力集结西安，一百八十一师据守咸阳城，巩固桥头阵地，咸阳正在抢修中，浮桥已架成。”

从6月11日开始，第四、第三、第六军开始对马家军进行顽强阻击！

乾县、礼泉县城以北的地形很有特点。这里地处北塬，西面是梁山（乾陵就在梁山之上），东面是五峰山，西兰公路从中间穿过，公路两侧地形起伏，形成一道道高地。第四、第三、第六军就是利用这些高地，居高临下地阻击马家军。

第四军位于整个防御阵地的西面。11日上午，宁马第一二八军第三五六师第三团开始进攻关头阵地，第四军顽强阻击了3个小时。但由于关头阵地失守，第四军中午奉命向泾河以北地区转移，并留下第十一师副师长刘懋功率该师第三十二团坚持到天黑，掩护全军转移。

第三军位于整个防御阵地的中部，并以第九师第二十七团防守西兰公路两侧。第二十七团遂以第三营坚守公路西侧的阳峪岭和公路东侧的新店村和冯市镇，主力位于阳峪岭以南的铁佛寺一带。

阳峪岭是座土山丘，高出地面近百米，瞰制由西向东再折向南的西兰公路。6月11日上午5时，宁马第十一军第一六八师分兵两路，一路从监军镇（今永寿县城）直接向南进攻阳峪岭，一路沿西兰公路东侧的深沟绕过新店和冯市镇，进攻第二十七团的主阵地铁佛寺。

阳峪岭西北方向有一个村庄叫秋家山，距阳峪岭直线距离约1.5公里。敌人以两个连的兵力沿秋家山向阳峪岭冲锋。马家军个个赤胸露臂，手拿马刀。他们刚刚接近第三营的铁丝网，就被第七连和机炮连的机关枪打得龟缩在一道斜坡下，不敢抬头。敌人随即又增加了两

个连的兵力，但同样被第二道铁丝网拦住。4个连的敌人在两道铁丝网中间，挥着马刀、喊着杀声。第七连六〇炮手杨忠信瞄准铁丝网中间，连续发射40多发炮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马克沁重机枪手周纳元看到冲锋的敌人纷纷倒在他的枪下，乐得大声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打得痛快过！”经半小时激战，数百敌人被击杀在铁丝网中间。

紧接着又是两个连的赤胸、背枪、拿大刀的敌人冲了上来。因前次吃了亏，这次敌人从北边绕过铁丝网，在离第三营阵地400米以外的地方，就举起马刀、向空中挥喊着发起冲锋。机炮连排长张于英看到敌人上来了，鼓舞全排同志：“沉着、瞄准，不要叫子弹从敌人的头皮上擦过去！”射击手卢虎山跳出工事，端起机枪，猛烈地向敌人扫射。第七连第二班副班长刘汉玉见敌人冲到距阵地只有40米地方，第一个投出手榴弹，接着全班同志的手榴弹像冰雹一样投入敌群。敌人仍然顽强抵抗，冒着炮火，从地上爬起来，开始第三次冲锋。这时，友邻阵地的火力开始支援阳峪岭阵地，残敌被打得纷纷溃逃。

在西兰公路东侧，绕过新店企图攻击新店以南冯市镇的另一路敌人，在新店遭到第八连抗击后，就爬入壕沟内，想趁着解放军不备时，由东向西进攻阳峪岭。结果，他们刚到第八连阵地前哨，前来增援的第三连副连长便发出了射击的命令。第三班副班长刘旺大步跑到沟沿，端起冲锋枪向下猛烈扫射，敌人被截为两段，被遗弃在第八连阵地的敌人，还没有来得及抵抗，就被疾速冲来的第七连同第八连第一排包围了，手榴弹接二连三地投向壕沟里，沟内的爆炸声混合着敌人的号哭惨叫，过了一会儿沟内就没有了一点动静。

从侧面攻占阳峪岭的企图失败后，敌人于11日下午4时开始向第九连阵地方向运动，企图在黄昏以前，攻下第三营唯一撤退道路的联结点——冯市镇。死守冯市镇的激战开始后，第五班首先出击，射

击手孙庆才的机枪压制了敌人的前进。第一排从右侧出击，协同第五班向前推进。敌人的一挺转盘机枪，突然从几棵柿子树下向第五班侧射。射击手田少卿敏捷地在枪口上装好发射筒，向敌人打了3发枪榴弹，柿子树顶上冒出一团团黑烟，那挺转盘机枪就哑然无声了。当敌人被第九连截断的时候，前来增援的第二连将被截断在第九连阵地后面的敌人全部俘虏。

阳峪岭阻击战胜利了！铁佛寺的阻击战也胜利了！第二十七团趁着夜色，开始向泾河以北转移。

如果说第二十七团在阳峪岭、铁佛寺的阻击战宁马打得比较顺利，那么第三军第二十五团和第六军第十七师在礼泉以北刀陈一线阻击青马则打得比较艰苦。

第十七师以第五十一团布防于刀陈、西店头一带，以第五十团第一营布防于王家堡以北，组成第一线阻击阵地，西面与第三军第二十五团的南北注泔阵地相连；以第四十九团第二营，第五十团第二、第三营布防于吴家岭、瓜赵、胡罗村一带，组成第二线阻击阵地；以第四十九团第一、第三营布防于铁罗村一带，组成第三线阻击阵地。

从11日上午9时开始，马继援以骑兵第八旅向北注泔和西店头一线连续发动两次进攻。

青马的骑兵，个个都是三件套长枪、短枪和马刀。但青马的骑兵最怕的就是解放军的炮兵，因为骑兵目标大，炮弹对其杀伤力强。随着解放军的炮弹在马群中开花，各种轻重武器一齐开火，骑八旅被打得人仰马翻，死伤惨重。

旅长马英向马继援求救，马继援遂派出第八十二军之韩有禄的第二四八师加强攻势。

第二四八师的官兵个个赤胸裸臂，手拿长枪，犹如一帮亡命之徒，听到阿訇喊了声“天门开了！”就像一窝蜂似地向解放军阵地扑来。

战至下午 1 时，第二十五团的北注泔等阵地被敌人夺去。第十七师师长程悦长立即命令第五十团向刀陈、王家堡靠拢，并抽出 1 个连接替第三军第二十五团的南注泔阵地。当这个连正在运动之际，敌人突破了南注泔阵地。由于这个连缺乏作战经验，不会沿两翼撤退，给二线部队留出射界，而是面对二线阵地的正面跑来，使二线阵地上的火力不能发挥。敌骑兵乘机突破二线阵地，向瓜赵、王家堡连续发动了 5 次进攻。程悦长紧急调集部队，调整火力，才把敌人打了下去。

《第六军战史》在总结这次作战的教训时指出：“礼泉以北刀城（陈）、王家堡地区阻击马匪撤退时混乱的主要原因：1、五十团一连接替二十五团阵地正在运动中团阵地失守，部队未占领阵地。2、第一线部队撤退时未从两翼撤，而是从正面撤，这样则使二线火力不能发扬并动摇其军心，给敌人尾追突破二线防御的有利机会。长武之张家坡，西府战役之中屯子镇外围敌人的反击，都是这样突破我之防御阵地的。”这些都是用鲜血换来的宝贵教训。

从 16 时 30 分开始，敌人又向解放军阵地发动猛攻，第五十一团连续打退了敌人的两次进攻。

在 11 日的作战中，青马第二四八师师长韩有禄被击伤，该师遭到重创，就地休整。当晚，第三、第六军也撤出阵地，向泾河以北转移。

第四、第三、第六军的乾县、礼泉以北阻击战，不仅为第六十一军在咸阳和西安布防争取了时间，还歼敌 2000 余人。

大量歼灭马家军的有生力量，这正是彭德怀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在马家军疯狂进攻乾县、礼泉以北地区的同时，胡宗南部和王治岐的陇南兵团也由西向东进攻。

第二军本来是担任钳胡任务的，随着钳胡打马任务的取消，除留第十一、第十五团位于罗局镇、益店镇之线（当日黄昏与主力会合）

监视敌人外，从6月11日9时30分开始，第四、第五师主力南渡渭河，准备与位于槐芽镇、青化镇的第六师会合，结果碰上了正在东进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军（欠第一二三师）。

第三十六军于6月10日由斜峪关向北推进，军长王超寰发现解放军在渭河南岸只有第六师，便于12日率部沿秦岭北麓、渭河南岸东犯，却没有发现解放军第二军主力已于11日南渡。12日10时30分，第三十六军进抵金渠镇地区。

王震鉴于胡军主力已停止于渭河以北蔡家坡、岐山一线，第三十六军孤军深入，遂决定待其进至清湫庙（清湫村）之线时，第六师即由法牛咀沿秦岭北麓插至童家村、烟霞村，迂回到第三十六军的后面（西面），断其退路；第四、第五师即由清湫村一线向其正面发起突然攻击。

马家山位于南塬之上，东西北三面峭壁或70度左右的陡坡，敌第四九五团在塬上，第一营在塬下处于仰攻位置，这就意味着攻占马家山是一场恶仗。

为完成任务，营长栗政通率第三连从北面勇猛地往上冲。经过二郎沟塬的反复争夺，第一营最终攻占了马家山，守军向西北方向逃跑。在追击逃敌的过程中，栗政通不幸头部和腹部中弹牺牲。

12日14时，第五师先头部队和第十六团到达进攻位置，王震遂发出了总攻的命令。于是，第四师由东向西攻击第三十六军的左翼；第六师第十八团的两个营由南向北进攻；第六师第十六团由小法牛咀自东向西、第五师第十四团由西北向东南攻击敌第四九五团；第六师插至敌后的部队向双庙、枣林一带攻击前进。激战至20时，歼敌第二十八师一部和一六五师大部，活捉第一六五师师长孙铁英。

在围歼敌第一六五师的战斗中，第四师第十一团政治委员赵存仁牺牲。

孙铁英的第一六五师上次在五丈原、棋盘山就成为漏网之鱼，这次终于被第二军大部歼灭！

在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下，王超寰率第三十六军军部和第二十八师大部逃入金渠镇的5个堡子，企图依托村落负隅顽抗。入夜，他叫士兵点燃村边的麦垛，用光亮照明，防止解放军夜间突袭。王震遂以第四师附军炮兵团在北面和东面、第六师主力在西面、第五师主力在南面，将金渠镇包围，准备13日拂晓发起进攻。

13日3时许，位于金渠镇北面的第二军炮兵团开始向守军轰击。然而，就在炮兵即将打开缺口，第四师准备从北面发起突击之时，情况突变。

由于没有对渭河以北派出侦察警戒和得力的打援部队，致使前来增援的敌第六十五军从眉县附近南渡渭河，冲到第二军的炮兵团阵地附近，金渠镇的守军也乘势反扑，第四师等部腹背受敌。鉴于金渠镇内外敌人已取得火力联系，歼敌良机已过，王震遂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转移到横曲（横渠）镇、哑柏镇及其以南地区。在掩护部队撤离的过程中，第四师第十二团第三营教导员黄毅志牺牲。

金渠镇围歼战共歼灭国民党军2200余人。

两封家书

在金渠镇围歼战中，第二军第六师第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栗政通和第四师第十一团政治委员赵存仁等营团主官先后牺牲，足见当时战斗之激烈！

栗政通、赵存仁等革命烈士，血洒疆场，马革裹尸，表现了他们崇高的家国情怀。

栗政通，河北省平山县人，1923年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亲栗再温从1934年开始任中共直西特委书记。大哥栗政清曾任中共平山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后被叛徒出卖，1936年牺牲在天津日本人的

监狱。在家庭的教育和熏陶下，栗政通幼小的心灵播下了革命的种子。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栗政通见哥哥栗政民穿上了八路军军装，扛起了“三八大盖儿”，哭着喊道：“爸爸，我也要参加革命，和哥哥一样要穿上八路军军装，打日本，保家乡！”在父亲的支持下，14岁的栗政通1937年参加了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因平山县1500人参军，号称“平山团”），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革命的熔炉里，栗政通迅速成长。他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侦察员、连指导员、副营长、营教导员、营长等职，参加过陈庄战斗和百团大战、南泥湾大生产、八路军南下支队南下湘粤边及北返、中原突围、渤海扩军和西北解放战争。

1947年6月，栗政通在山东渤海军区扩军期间写信给妹妹栗政华，抒发了他参加八路军南下支队南下及北返的经历。

政华妹：

你的来信于六月一日顺利收到了。数年的分别，悠久的远念，能在今天的信上互相告诉着别离后的一切，使我异常的兴奋。

在灾难的战争日月里，你们锻炼的这样坚强有为，这的确是你们的进步和成绩，望你们努力吧，前途是无限的光明。离开家庭的我茫茫十一个年头了。一九四四年的冬天，部队奉令南征，就在延安同你们远别了，战马似的我奔驰在祖国的战争烽火里。经过四十天的战斗生活，胜利的到达了湖南省，在长沙及湘江、洪湖一带展开了游击战争。从南征开始，我就转向军事工作了，特告。

到达江南之后，不久建立了湘鄂赣边区（湖南、湖北、江西），后来因敌伪顽合流扫荡，不能巩固，故此部队又奉令继续南进，经过三十天的行军作战，到达了广东省的南雄县。日本宣布投降，国内情况之变化，马上奉令北返。这时的情况非常紧张，蒋介石调了七个师，追剿、堵击，企图将我们消灭在湘鄂赣之八脉山间。由于战士们

的坚决，冲出了重围。经过了二十天的战斗行军，胜利与江北新四军五师在中原会合了，从此告别了江南。

江南的确不坏，长年春色宜人，到处是青山绿野，气候温和，长年吃大米，产量丰富。由于国民党黑暗的统治，人民亦是过着惨痛、凄凉、悲啼的日子。

我们到达中原后，不久宣布了停战令，我们就停止在中原，待令调遣。可是，无耻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又调动了七个军的兵力，将我们重重包围以及经济封锁，企图将我们这支部队困饿而死。因为共产党同广大人民群众有密切的关系，困不死、饿不死。最后蒋介石发动了攻击，妄想把我军消灭在中原地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军被迫突围，由湖北醴（礼）山、黄皮（陂）等地向西北前进了。蒋介石仍在各地调兵追剿、堵击。由于敌人兵力之大，造成我军战斗的紧张艰苦，一天打几次仗，有时还吃不到饭。因为人口稀少，我还记得在陕南，连着走了三天看不到村庄，所谓“无人区”。因为敌人到处布置了军队，我军为了避免损失，尽量走小路。战斗的生活经过了一年零十个月，最后胜利的回到延安。南征北返共计两万二千里。

回到延安不到一个月，因为战争的需要，我们又奉令奔驰了，经过一个月的行军到达了山东渤海军区工作了。我现在很好，请勿念。再见吧。

庆祝最后的胜利，望你们努力的前进吧！

愚兄 政通 写于六月十五日

这是一封充满激情的信！字里行间洋溢着栗政通对民族、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的深情和热爱，充满着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憎恨，展示着他为民族解放和推翻国民党黑暗统治，拯民于水火的钢铁般的决心和意志，表达了他对祖国解放事业的必胜信念，同时也真实地坦露着他对胜利后光明前途的追求和美好生活的渴望！

在扶眉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栗政通曾经用过的一支制作粗糙、通体乌黑、金属部分全都生锈了的钢笔。这支钢笔伴随着栗政通走过了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就是用这支钢笔，不知写过多少份政工总结、战斗动员，并用这支笔给家人写信，抒发自己的感怀。

1947年，他寄相片给几位妹妹并写了一封短信：

政华、政新、政芳、政书、政秀妹：

十年的离别使我们不能团圆，以我“战士的心”来与你们相会。当我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时候，这张被战争锻炼成的肖像随着你们漂泊吧！

1949年3月，离家12年的栗政通带着警卫员、骑着枣红马回家完婚。与家人的团聚，新婚的甜蜜，使他真有点不想再回部队了。然而，他的政治责任感最终战胜了对家庭的眷恋，毅然骑马返回部队。

1949年4月27日，他把自己的照片寄给妹妹栗政华，在照片的背面又写道：

他是一个热心的战士，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负于（赋予）祖国。当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就让这个寸身的灵魂愉快的漂泊吧！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两个多月，26岁的栗政通在人民解放军与胡马的西北大决战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牺牲前对政治干事花玉春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你告诉李教导员，我不行了，叫他好好领导，完成光荣的任务。我牺牲了不要紧，中国还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革命一定会成功的！”

栗政通留下了一个革命者寸心的表白，用鲜血塑造了一个伟大的灵魂，谱写了一曲壮美的人生之歌！

赵存仁，山西省崞县（今孟县）人，富农家族出身，山西大同师范学校毕业。七七事变后，他弃笔从戎，投奔延安，参加八路军第三

五九旅和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经过革命熔炉的锤炼，他从一个“公子少爷”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先后担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在金渠镇战斗中，他牺牲前曾两次负伤，仍带领战士们冲锋陷阵。

就在赵存仁牺牲前夕，师部捎来了妻子给他的来信。

孩子他爸：

贵体近安。你我夫妻一别 12 载，书信全无，我日夜在想念你。为了使你免遭毒手，逃出虎口，我瞒着你谎说，我和乡亲们安葬了咱们的父母。当时咱父亲被害，母亲气死之后，可恶的鬼子汉奸不准安埋，暴尸 3 日，还出下告示说：这就是不和皇军共建“东亚共荣圈”的下场。幸亏是深冬寒天，天降大雪，两天后乡亲们偷偷用芦席埋葬了双亲的遗骨。

我为了给赵家保全腹中唯一根苗，东躲西藏，埋名隐姓，在距家百里之遥的山里给财主家当佣人。鬼子汉奸进山扫荡，山里也不安宁，我带不满周岁的孩子多么想过黄河到陕北去寻找你呀！但是鬼子汉奸的封锁，想到延安比登天还难啊！为了生存，我又装聋作哑，带着孩子东讨西要，四处漂泊。1943 年 7 月，我随南逃的难民，翻沙梁来到延安。政府给我们难民安排了窑洞，发给口粮，还让我们自开荒地。我安顿好住处后，就四处打听你的归宿，可你却上前线打日本去了。

存仁夫君，我满肚子话要对你说，就是说上 3 天 3 夜也难诉完。你参加这样的好军队我就放心了，咱家的仇就能报了。望你在部队安心打仗。我能遇到这样的好政府，不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了。生活苦点没啥，只要能吃饱穿暖不受气就谢天谢地了。望你胜利归来，相会在延安，黎明已上识字班。孩子亲亲爸爸。

祝你啥都胜利！

妻：林霞

1949年4月18日

这封蘸着血泪写成的家书，赵存仁同志却没有看上一眼！年仅33岁的赵存仁同志在金渠镇战斗中光荣牺牲，在眉县留下自己的忠骨。第十一团团团长吴子烈曾经感慨地说：“赵存仁的牺牲，使我党失去了一名忠诚的党员，我军失去了一位勇敢的战士，人民失去了一名勤务员，林霞失去了一位好丈夫，黎明失去了一位好爸爸，我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战友。”

在扶眉战役中还有一位烈士名叫刘永成。他1917年出生在陕西合阳县城一个富裕家庭，1936年抛家弃学，参加红军。他1937年入党，历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扶眉战役时任第三军第二十一团副团长。战役发起前，离家13年的刘永成被批准回家探亲。大姐一见到他就关切地说：“永成呀！你现在也30多岁了，赶紧成个家吧！”刘永成笑着说：“不急，等革命胜利了我就成家，你们不要为我操心！”这是刘永成对父母许下的承诺，是一个让亲人留下沉重伤痛的承诺，也是一个革命胜利了却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他牺牲在扶眉战役之南武村战斗中。

其实，栗政通、赵存仁和刘永成，只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缩影！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大批革命烈士，舍小家为大家，他们用崇高的理想和对革命必定成功的坚定信念，用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他们及家人的英雄事迹，永远值得后人怀念和景仰，其革命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发扬光大！

乾县、礼泉以北阻击战后，马继援认为一野主力被击溃，反扑咸

阳的时机已到，遂通过马步芳命令宁夏兵团一同前往，但遭到马鸿逵的拒绝。马继援只好率其陇东兵团越过宁夏兵团的防线，直扑咸阳，并以骑兵第十四旅沿西兰公路以北、骑兵第八旅沿西兰公路以南前进，先后占领乾县、礼泉。

宁夏兵团之所以拒绝前往攻打咸阳，是因为在兰州的马鸿逵发现了马步芳与其争夺甘肃省主席一职的阴谋，愤怒异常，大骂马步芳背信弃义，并电话通知第十一军军长马光宗不要前进。马光宗遂以阳峪岭战斗伤亡甚大、需要休整为名，拒绝南下，气得马步芳把电话机摔掉。这样，反扑咸阳也就只能靠“青马”自己了。

于是，“皮旅”战“青马”的大戏开始上演！

“皮旅” 咸阳战 “青马”

山雨欲来风满楼。

胡马反扑咸阳的消息不翼而飞！西安市民的心顿时提了起来！

在此紧张形势下，大约6月10日傍晚，新华社第一野战军前线分社副社长田方突然接到通知：“彭总紧急召见。”

他匆匆地来到西安西大街建国公园内的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心里沉甸甸的，路上还不断地反问自己：在这种情势下，怎样挡住潮水般淹来的敌人？怎样保住西安？彭总见我要谈什么？有什么奇策呢？

他来到一幢老式而考究的平房里，一进门，就看到副司令员张宗逊、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和副参谋长王政柱等早在等候自己。

“哦！记者来啦！”

随着一声招呼，彭德怀从里屋出来，边走边笑，轻松自如。

他不谈正题，而是背着手踱来踱去，极有兴趣地讲起了《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讲到得意处，就放慢速度，那双浓眉下的大眼睛朝田方诙谐地笑笑，带有几分幽默、几分诡谲。

讲完了，彭德怀又用奚落的口吻说：“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是个花花公子。我们欢迎他进西安，西安有的是羊羔美酒，漂亮姑娘多得很！”

田方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可他又问自己：“空城计”在彼时彼地能成，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还有这种可能吗？

“大道如青天，欢迎他们进来么！”说罢，彭德怀便信步走了。

田方一时纳闷，彭德怀不是要对记者发表重要谈话吗？怎么没头没脑地讲了一阵就这么走了。

“首长，彭总要给我谈什么？”田方莫名其妙地问甘泗淇。

“就谈这个！”甘泗淇点了一下手指。

刚才田方光听彭德怀说说笑笑，竟没有记下一个字。经甘泗淇这么一点，才恍然大悟。定了定神，他把刚才彭德怀轻松的说笑如实写好。新闻的主题是：一野前线指挥员发表谈话，欢迎马继援进西安。

语调保持了彭德怀的风格，谈笑风生，如有百万雄兵在手一般。新闻经彭德怀过目，就送西安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

其实，彭德怀这样做是在与敌人玩心理战！西安并不是一座空城！他对如何应对敌人从中间突破——反扑咸阳，早已胸有成竹！

事实上，6月9日拂晓，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第一八二师到达西安，10时左右接管了西安的城防，守城的第六军移交防务后即开往礼泉以北迎战马家军；9——10日，第六十一军第一八一师、军直、第一八三师先后到达西安及三桥地区集结。

在西安市民惶恐不安之际，第六十一军来得恰逢其时！

为了打击西安敌特分子的造谣惑众，安定人心，野司决定由第一八一师代表华北部队举行入城仪式。10日上午，第一八一师官兵全副武装，迈着整齐的步伐，穿过西安市区。战士们高举的“登城先锋”“军政双全”“城头堡垒”“政策纪律模范”“尖刀连”等锦旗迎风招

展！

西安全城沸腾了！鞭炮连天，鼓声雷震。钟楼附近，人山人海，连树上都爬满了孩子！人们欣喜若狂，欢迎星夜赶到的华北兵团，看到荷枪实弹，雄赳赳、气昂昂开向咸阳的队伍，人心落定，喜上眉梢！

这次入城仪式，对震慑城内敌人，稳定西安地区的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入城仪式前，第六十一军军长韦杰、政治委员徐子荣率军部于9日到达西安机场后，就与野战军司令部沟通了电台联络。彭德怀叫他们两人到兴平县马嵬坡受领任务。韦杰和徐子荣立即骑马前往，但由于路途较远，当他们赶到马嵬坡时已经是半夜12点了。

马嵬坡镇就是东西一条街，野战军司令部设在路南的一所大院，门口挂着一盏用红布包裹的马灯，以便外来人员联络。吃完饭后，野战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李夫克把韦徐二人领到作战室去见彭德怀。

尽管这时彭德怀和野战军司令部还没有放弃钳胡打马的计划，但已开始从最坏的可能出发考虑如何保卫西安的问题，即能打马则打马，不能打马则保卫西安。而在将来放弃钳胡打马，第三、第四、第六军撤至泾河以北，第一、第二军撤至渭河以南，两翼张开的情况下，防止马家军从中间突破，袭击咸阳进而威胁西安，就成为重中之重。彭德怀叫韦徐来，就是部署如何加强“中间”的问题。

听了韦徐介绍第六十一军每个师的情况后，彭德怀拿着作战参谋递过来的高粱秆指着地图说：“西兰公路以北是两马的部队，以南是胡宗南的部队。”马继援“不会从我预筑工事正面来的，很可能采取迂回的方式突然插过来，这一着，务必请你们特别注意”。

这时，高粱秆已经指到了咸阳。

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以一个师，也就是一八一师，昼夜兼程赶到咸阳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坚决阻击敌人。一个师接替六军那两个师

的防务，驻守西安，另一个师和军部放在渭河南岸，担任第二道防线，不让敌人突破，时间很紧迫，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韦徐表示：“坚决按照你的部署执行，保证一八一师明日黄昏前全部到达咸阳。”

入城仪式结束后，第一八一师师长王诚汉率领部队来到城西的西安机场吃午饭。突然，军部通信员骑马飞奔而来，交给王诚汉一封信，并通知他到咸阳去受领任务。王诚汉遂带上十几个人骑马前往，部队由政治委员张春森带领随后跟进。

第一八一师的前身，是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旅长皮定均，所以又称“皮旅”，王诚汉时任该旅第三十五团团长。中原突围时，为掩护军区主力分两路向西突围，皮旅向东吸引国民党军，最后突围到达华中解放区。之后，该旅先后改称华中野战军第十三旅、华东野战军独立师，参加过苏中战役、两淮保卫战、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等战役战斗。1947年12月下旬奉命归建，以后改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第三十七旅，王诚汉任旅长。王率部参加了临汾、晋中和太原战役。太原战役期间，第三十七旅改称第六十一军第一八一师。所以，第一八一师有着光荣的历史，是一支能攻善守的钢铁劲旅！

王诚汉与师副政治委员黎光等来到咸阳，走进一所小院子，出来迎接他的是野司副参谋长李夫克。李说：“是彭总找你们，要给你们亲自布置任务，我现在就带你们去。”

见到彭德怀，王诚汉首先作自我介绍。接着彭德怀指着墙上的地图说：“马继援是少壮派，骄傲得很，他率第八十二军的3个师和骑兵第八旅已经到达彬县附近，离咸阳不到100公里，这股敌人在明天中午可以赶到咸阳附近。你们师的任务，就是要这里顶住它。打好这一仗，不仅是守住了咸阳，保卫了西安，更重要的是对马家军的迎头痛击，打掉它的凶焰，掩护华北入陕部队的顺利集结和展开，为解放

整个大西北创造条件。”

由于马家军受了“多杀汉人可以早升天堂”的欺骗宣传，作战蛮悍，华北部队又没有与马家军交过手，彭德怀进一步嘱咐道：“马步芳的部队受狭隘民族意识的挑拨和封建迷信思想的麻醉，官兵十分野蛮，还是很能打仗的。同时，敌众我寡，以你们1个师的兵力阻击敌人4个师的进攻，而你们又缺乏对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你们要发动干部战士多想办法。要特别留心，打骑兵必须沉着应战，基本诀窍和经验是射人先射马，把马打倒后，人就好打了。”

考虑到咸阳阻击战将是一场恶仗，彭德怀决定把第一八三师的第五四八团拨归王诚汉指挥。布置完任务，彭德怀乘坐的吉普车向西安方向驶去。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6月10——11日彭德怀的工作：10日凌晨在马嵬坡向第六十一军军长韦杰、政委徐子荣下达作战任务；10日下午在咸阳给第一八一师师长王诚汉亲自布置守城任务；10日傍晚在西安建国公园叫田方写“空城计”的新闻报导；11日1时在建国公园作出放弃钳胡打马的决定，并要前线部队于11日再阻击一天，以便为刚到达西安的第六十一军布防争取时间。

整个部署精细缜密、前后衔接、一环扣一环！

送走了野战军司令部首长，王诚汉与黎光等到咸阳以北勘察地形。

山南水北为阳。咸阳，位于八百里秦川腹地，渭水穿南，峻山亘北，山水俱阳，故称咸阳。其地形北高南低，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西北方向是著名的咸阳塬，咸阳城则坐落在“锅”底。所谓咸阳塬，是北塬的一部分，它西起武功漆水河畔，东至泾渭交汇处，包括武功、兴平、咸阳、泾阳、乾县、礼泉等黄土台塬高地，是古代帝王的理想墓地，有名的就有周陵、茂陵、乾陵、昭陵等。

经过勘察，王诚汉等发现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个是守咸阳

塬上的文王陵、昭陵、五冢一线，地形比较有利，但防御面过宽，3个团根本守不过来；一个是守咸阳塬下面、咸阳城北的小土丘，虽然地势低了些，但防御面小，又有敌人原来构筑的碉堡工事可以利用。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坚守咸阳城北2.5公里处的小土丘。这样，就形成了马家军居高临下，第一八一师背水作战的态势。

6月11日下午，第一八一师开始北渡渭河。为了加快过河速度，王诚汉命令部队迅速搭建了一座浮桥，至12日4时全师1.3万人和配属指挥的第五四八团（两个营）全部通过渭河，到达咸阳。

第一八一师的具体部署是：第五四三团位于城西，第五四一团位于城北，第五四二团位于城东北；师山炮营和配属指挥的两个山炮连、两个迫击炮连和1个战防炮连，配置在城墙上或城墙附近；配属指挥的第五四八团两个连分别担任渭河铁桥和西关等外围据点的防守，其他部队防守城垣和市区；师指挥所设在城墙上，以便于观察情况和指挥作战。

在部署部队抢修工事的同时，王诚汉还派作战参谋王青山率领一个13人组成的侦察班，配备1辆自行车，前出西北方向侦察。

至12日下午4时，部队经过土工作业，依托敌人原有的碉堡工事，由城东北的中五台、李家堡、张家堡、药王洞，到城西北的吴家堡，再到城西的申家村、底江点，构成了以咸阳为圆心、正面宽约6.5公里的半圆形防御阵地，各处均可得到纵深炮火的支援。

与此同时，韦杰和徐子荣率第六十一军军部和第一八三师（欠两个营）到咸阳西南的渭河南岸布防，借以掩护咸阳左翼，防止马家军从咸阳西面南渡渭河。

野战军司令部还抽调了担任卫戍西安的第一八二师第五四五团的1个营开到西安以北的草滩镇，控制渭河渡口。

这样，第六十一军的两个师防守咸阳及渭河南岸，第一、第二军

防守渭河以南的户县、周至，第三、第四、第六军防守泾河北岸。

这就是彭张赵保卫西安的部署！

这就是彭德怀为马继援进西安准备的“空城计！”

然而，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马继援的第八十二军下辖第一〇〇、第二四八、第一九〇三个步兵师和骑兵第十四旅，直属特务、工兵、通信、山炮、辎重 5 个独立营和 1 个卫士大队；其第一二九军下辖第三五七师、新编第一师和骑兵第八旅，直属特务、工兵、通信、山炮、辎重 5 个独立营。

12 日，青马骑兵第八旅派出 1 个先头营继续东进，在咸阳西北 15 公里的龙泉村（今龙泉坊）附近遇到王青山率领的侦察班。

为给部队修筑工事争取时间，王青山命令尚洪申骑自行车返回报告情况，带领剩下的战士利用村外的坟地展开阻击。经 3 个小时激战，毙伤青马 200 余人，王青山等 8 人壮烈牺牲，其余 4 人受重伤被当地群众救走。王青山的侦察班为第一八一师争取了宝贵的 3 小时！

12 日下午 6 时半，骑兵第八旅 3 个团来到咸阳以北。旅长马英骑马站在咸阳塬上，指着下面的咸阳说：“我们要咸阳不下马，西安吃晚饭！给我冲！”

顿时，战马嘶鸣，尘土飞扬，骑兵第八旅从塬上飞奔而下！

一股敌人冲到第五四三团阵前 400 米的地方，突然纷纷下马，有的赤裸一只臂膀，有的把上身全部脱光，低头、举刀、念咒，然后上马挥舞着马刀，拼命叫喊：“天门开，天门开，多杀汉人，南天门开了好上天！”像一群疯狂的野兽，以集团战斗队形向第五四三团阵地扑来。

第五四三团的指战员，打了一辈子仗，也没有见过这种阵势。然而，当敌人进入 200 米射程时，第五四三团的各种武器一起开火，敌人一群一群地倒下，没有死的也乱作一团，纷纷后撤。

青马 1 个多营的骑兵向咸阳以北冲来，第五四一团第一营第二连第三排阵地被攻占。骑兵出身的营长陈钊命令第三连第二排一律放下枪，拿起在太原缴获的日本战刀，左手提起手榴弹，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日本战刀比马家军的长而且锋利。在陈钊的带领下，第二排一阵手榴弹，一阵刀光闪闪、血溅七寸，硬是把丢失的阵地夺了回来！

在咸阳东侧的中五台阵地，第五四二团的重机枪排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无工事依托的情况下，把敌人的骑兵一片一片地扫倒。敌人一开始还想往前冲，见解放军的重机枪确实厉害，遂纷纷后撤。第五四二团的指战员们跃出战壕，追击逃敌。

激战至黄昏，敌人的进攻被粉碎。骑兵第八旅后撤至北原、上召村、石村一带，与第一八一师保持对峙。

经过这次前哨战，第一八一师官兵虽已打破对骑兵的神秘心理，认为骑兵并非不可战胜，但对青马的蛮悍和怪声号叫的精神战法仍存有戒心，判断明天将有一场更加残酷的战斗。当夜，王诚汉、张春森向下传达了师党委死守咸阳的决心，要求每个指战员都要有进无退，奋勇杀敌。

野战军司令部参谋长李夫克前来指导防务，他一再强调：“只要沉着坚定，即可战胜马匪！”

当夜，第一八一师全体官兵加紧抢修工事，准备迎接明天的战斗。

13 日晨，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王新亭、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漫远来到咸阳视察部队，指导防务。第一八一师官兵见兵团首长亲临前线，备受鼓舞，士气大增。

天刚蒙蒙亮，青马的山炮就开始轰击第一八一师阵地，预示着更大规模的进攻即将开始。

马继援到达乾县后，接到第一九〇师师长马振武从咸阳附近发来

的电报：“咸阳城内 G 军很少，西安空虚，现在我们夺取咸阳，直入西安，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目下攻取咸阳很有把握，如果我们青海兵团不先下手，首功定被别人（指胡宗南部和宁夏兵团）抢走，那时悔之晚矣。”马继援接电后对马振武大为赏识，任命他为咸阳步骑总指挥。

13 日下午 3 时左右，马振武与韩有禄、马英等在咸阳城西的一个村庄研究攻城部署。最后，马振武强调：“今天我们要竭力保卫团体，以报答长官（指马步芳——引者注）对我们的多年栽培。”“夺取咸阳，直取西安是长官和军长坚定不移的主张，我们要在胡宗南和宁夏部队面前，争一口气。今天下午开始总攻，要不惜一切牺牲，必须在明天早晨将第八十二军军旗插在咸阳城楼上，那时候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直入西安了。而我们的声威便可以轰动全国。”受了马振武的蛊惑，韩有禄等个个摩拳擦掌。

下午 5 时，第八十二军的 3 个步兵师全部到达上召、五冢一线。其炮兵对咸阳城内外进行轰击之后，6 时 30 分左右，第二四八师从东北方向、第一〇〇师从正北方向、第一九〇师从西北方向对第一八一师发起进攻，骑兵第八旅则作为预备队。

为了减少伤亡，马家军独出心裁，想出了现代版“火牛阵”的战法。这就是把老百姓的耕牛牵来，成群驱赶向前，部队在后跟进。然而，解放军的机枪朝天一阵射击，耕牛被吓得四处乱窜，把马家军的队形也冲得七零八落。整理好队伍后，马家军开始了猛烈进攻，尤其是第二四八师、第一九〇师两路，以整营以上的兵力作连续性的集团冲锋。第一八一师则以纵深炮火和前沿火力予以杀伤，并不断以反冲锋歼灭敌人。

在第五四二团坚守的中五台阵地，敌第二四八师先以 1 个营冲上来。这个营冲到阵前 300 米的地方突然卧倒，后面约两个团的敌人跟

上来后，这个营的敌人又迅速站起，喊着口号往前冲，这叫作近距离接力突击战术。王诚汉立即命令城墙上的山炮、迫击炮向敌群轰击。顿时，炮声隆隆，震彻四野，硝烟滚滚，敌尸成堆。坚守中五台阵地的是第八连一部共 50 人，连长阎官朝沉着指挥，带领部队先后打退第二四八师的 9 次集团冲锋，稳住了阵地，最后以反冲锋打垮敌人的攻势，毙伤敌 200 余人，保证了全师右翼的安全，粉碎了敌人沿三（原）咸（阳）公路侧击咸阳，陷第一八一师全线瓦解的企图。

第五四三团第一连第一排，在连指导员郑国俊的带领下，始终坚持西兰公路一号阵地，虽然被割断了与后方阵地的联系，9 次陷入敌人的四面环攻，但临危不惧，顽强抗击敌人。在弹药快要打光的情况下，以仅有的 9 枚手榴弹阻止了敌人的进攻。敌人遗尸 89 具，狼狈退去。

据王诚汉回忆，第五四一团第二连第二排扼守吴家堡的前沿阵地，副排长魏海东左臂被炸断，左胸和右腿也被炸伤，敌人的第三次进攻之后，阵地上就剩下他一个人。魏海东以誓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气概，独臂挥刀砍死砍伤 6 个敌人，最后敌人用 3 把马刀将他砍倒。令人惊奇的是，他并没有牺牲，而是凭着惊人的毅力，不久又爬了回来。

以上就是咸阳保卫战的缩影！

第一八一师同时抗击青马王牌——第八十二军的 3 个师，其英勇无畏足可以惊天地、泣鬼神！

在反复冲杀中，第一八一师各团的一线阵地大部被攻占。但主阵地因有碉堡、外壕及城墙作依托，激战至黄昏后依旧巍然屹立。至晚上 10 时左右，马家军基本上停止了进攻。

这时，第一八一师的弹药特别是轻重机枪子弹剩得不多了。王诚汉命令军械员王仁义骑自行车回西安报告情况。不久，一野后勤部用火车运来一批弹药到咸阳城东大铁桥，分发部队。

得到弹药补充后，王诚汉命令各团分工包干，用偷袭和强攻相结合的战法，夺回各自失去的阵地。12时过后，反攻作战开始，至14日拂晓各团收复了全部丢失的阵地。

对此，韩有禄、马尚武回忆道：“当晚12时过后，解放军主力部队从西安抵达咸阳，立即向马家军发动了猛烈的反攻，城内的解放军从西门、北门两路杀出，向西、北两面攻城部队猛力冲击，马家军阵营动摇，欲攻不成，欲退不能，致演成激烈的白刃战，人叫马嘶，震彻四郊。第一九〇师的马登霄团和第二四八师的韩小侠团首当其冲，死伤累累，副团长马荷天和营长2人、连长4人就地毙命，士兵伤亡达六百多人。马振武看到溃败惨状，不敢再作抵抗，立即下令乘夜撤退，使马步芳父子夺取咸阳直扑西安的幻梦，立刻变成泡影。”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解放军主力部队从西安到达咸阳，对马家军反攻的部队就是第一八一师！

太阳升起来了，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咸阳市城！

咸阳阻击战从6月13日17时开始到14日6时结束，历时13个小时，歼灭青马2000余人。由于敌人不善于组织火力，冲锋时没有火力掩护，第一八一师仅伤亡200余人，其中不少是被敌人冲锋时用马刀砍伤。

咸阳阻击战是第十八兵团进入陕西的第一仗，第一八一师经过长途行军，刚放下行装即投入战斗，并且是背水作战，进出困难（仅有一座浮桥）。青马第八十二军素称蛮悍，气焰十分狂妄，扬言两小时攻下咸阳，渡过渭河（该军每个班都携带了一个羊皮筒，确有渡河准备），其攻势至为锋锐。第一八一师在强敌猛攻之下，沉着应战，予敌以迎头痛击，确保了咸阳和西安的安全，粉碎了马步芳父子“反扑咸阳，收复西安”的迷梦，消除了部队对青马某种程度上的神秘心理，给全军以精神上的巨大鼓舞！

战后，第六十一军军长韦杰派人向彭德怀汇报了情况，彭德怀在电话里对韦杰说：“你们打得好！顶住了！咸阳占住了！要加强防御，构筑好工事，防止敌人的再次进攻。胡宗南的部队现在还没有动静，还没有攻上来，他还是要来的哟。要好好总结经验，补充弹药，确保咸阳不能丢，保证西安的安全！”

听说第一八一师在咸阳打了胜仗，西安市副市长方仲如率代表团到咸阳慰问。西安各界人民赠给第一八一师“百战百胜”的锦旗一面。这是第一八一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荣誉！

西安守不守？“击南”还是“击北”？

咸阳守住了，但西安依然处于胡马反扑的阴影之中！

从彬县、永寿一带进入西安，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沿西兰公路经咸阳到达西安；另一条是沿泾河北岸经淳化、泾阳到达西安。

马继援非常清楚，泾河以北的解放军第三、第四、第六军，不仅封锁了其进攻西安的一条道路，而且严重威胁着其左翼的安全，他最怕的是当其进攻咸阳时，泾河以北的解放军西进抄袭其后路。对马继援来说，击破泾河以北解放军的防御，就不仅控制了进入西安的两条道路，还解除了解放军对其左翼安全的威胁。

所以，马继援于6月13日派第八十二军进攻咸阳的同时，还命令马振武以第二四八师骑兵团，乘解放军第四军防守不严，从修石渡、临泾渡北渡泾河，偷袭泾阳。

敌第二四八师骑兵团除一部进入泾阳县城抢劫外，主力向距县城西北约1.5公里的南强村之解放军第四军运输队攻击。运输队向北强村的运输营营部撤退。营长一面向上报告情况，一面组织部队抗击。在运输营机枪的猛烈射击下，第二四八师骑兵团的多次冲锋均被打退。之后，第四军的火炮开始轰击青马骑兵团，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第十二师之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团等部队从泾惠渠以北的坡西、木刘塬

等地向第二四八师骑兵团全面出击。青马骑兵团无力招架，伤亡近300人，被迫撤回泾河以南。

之后，第四军第十二师奉命驻守泾阳一带，并在泾河以南的修石渡和临泾渡建立了桥头阵地，使解放军从此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

对这次作战，《第六军战史》写道：“十三日进至咸阳以北之马匪猛扑咸阳，经我一八一师炽热炮火杀伤，死伤二千余人，与此同时敌以一个骑兵团奔袭泾阳被我四军击退。”

进攻咸阳失败后，马继援命令部队从咸阳后撤五公里，构筑工事，防止解放军突袭，同时派马成贤的骑兵第十四旅等部向泾河以北进攻。

事实上，担任警戒任务的青马骑兵第十四旅从6月11日开始就与解放军第六军的警戒部队保持接触。12日7时，第六军第十六师进至王桥、第十七师进至石桥地区，在泾河北岸布防。

从14日开始，马成贤派出马海荣的骑兵第一团和马海彦的旅直属重兵器营北渡泾河，“向王桥镇进行扫荡”。当马海荣部进入泾河以北后，发现所有道路都被解放军截断，麦田里也被解放军灌满了水，骑兵寸步难行。15日，解放军第十六师师长吴宗先率部对马海荣部实施反击，并以山炮轰击青马骑兵。马海荣部逃回泾河以南，经唐王陵（昭陵）撤到赵镇地区。据原国民党军将领回忆，解放军在这次作战中共歼敌51人。实际歼敌情况可能比这还要多。

马成贤自己率部进犯泾河以北的同时，又派出骑兵第二团袭扰通润、淳化地区，并进占了辛店村。辛店村位于淳化县城西北，坐落在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胡同内，其西面是一条干沟，东面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土岭，易守难攻。骑兵第二团团团长马福魁把部队分散住在村民的地窖里，并有一个骑兵排在土岭上巡逻。

6月18日，解放军第三军第九师奉命歼灭该团。据中国人民解

放军西北军区、第一野战军司令部 1953 年编写的《西北解放战争史料汇编》称：第九师采用了逐次增兵的添油战术，先以 1 个营进攻，见敌人不打枪，即直向淳化城前进，结果遭到敌人袭击，被迫撤出战斗。第二次增加兵力攻击也未能奏效，最后第九师撤退，敌人也逃跑。当发现敌人逃跑后，第九师即发起追击，但为时已晚。

《群众日报》以“淳化西歼马匪三百余人”进行报导：

【陕中前线讯】马步芳匪军在咸阳、泾阳地区窜犯失败后，十八日又转向淳化地区窜犯，再一次遭受解放军的惨重杀伤。十八日晨，当马匪骑兵十四旅第二团窜到淳化以西新店地区时，即遭到解放军迎头痛击，毙伤共三百余人，和战马百余匹。残匪在当天下午两点多钟遗尸一百多具向淳化张洪镇方向狼狈逃窜。同一天，马匪骑兵约两个团从泾河南岸向新店增援，在十九日拂晓窜到淳化城附近，现正和解放军某部对峙中。

据原国民党军将领回忆，在辛店战斗中，解放军第九师共毙伤青马官兵 350 余人、战马 200 多匹。

此后，解放军第四军驻泾阳地区，第三军驻云阳地区，第六军驻石桥、北屯地区，严阵以待，并保持泾河南岸桥头堡阵地，准备随时奉命出击。

6 月 13 日，第三军第八师归建，第七军到达三原地区，泾河防线进一步得到加强。

在马继援部窜犯泾河以北的同时，胡宗南部也上来了！

胡宗南主力沿渭河东进；杨得亮率第十七军军部北出秦岭到达子午口，其第十二师由子午口向大雁塔以南的韦曲前进，其第四十八师由泮峪口向斗门镇前进，另以归其指挥的第六十九军第一四四师由汤峪向灞桥前进，分东、南、西三面进攻西安，配合马家军的作战。同时，敌第六十九军也派出第八十四师向灞桥挺进。

6月14日，敌第八十四师一个先头营到达灞桥时，恰与解放军第六〇军第一八〇师乘坐的列车相遇。第一八〇师因在列车上未与其展开战斗，迅速通过灞桥。第二天，第六十军军长张祖谅派第一七九师前往浐河西岸地区围剿，敌第八十四师像泥鳅一样逃入秦岭。

不久，杨德亮的部队到蓝田县引驾迥镇一带抢粮，第一八〇师奉命几次围剿，敌人都逃入秦岭。

此后，第六十军即防守西安城南及东南地区。

在马继援部距咸阳5公里，胡宗南主力日渐东进，第十七、第六十九军等部进攻西安的形势下，西安陷入敌人的三面包围。

在此形势下，中央军委于6月15日致电彭德怀、张宗逊和赵寿山：

你们放弃三角地带，引敌深入准备反攻的部署是适当的，但请充分注意马匪有利用我军分置泾渭两路，中间薄弱，采取中间突破进取西安，使我两路不能联系之可能。如敌采此战法，你们是否有固守西安的可能和决心，或者放弃西安引敌入西安然后歼击，何者为宜。又如马匪占领西安，我一、二两军是否能集中歼灭胡匪，首先打开一面的可能。均请电告。

彭张赵向中央军委表达了坚守西安的决心。他们在16日24时给中央军委的复电中说：

我兵分两路处泾北渭南，中间薄弱，马匪乘弱中央突破，在十四日前，此顾虑甚大，现十八兵团已有五个师到西安，余在续运中。七军已集结草滩镇以北。马匪攻破[击]咸阳受挫后，北撤十里，骑兵两个团窜扰淳化、口头镇、小邱、方里，威胁耀县、三原。十四日酉时胡匪之八十四师袭击灞桥未逞，被我六十军一部击溃，正追击中。十七军由东西涝浴口窜袭余[户]县，歼灭约一个营。至十九日后，我可集结三至四个军寻机歼灭胡匪一两个军，故不准备再放弃西安矣。

在彭张赵看来，泾渭三角地带可以让，但咸阳、西安决不能让！即使再困难也要坚持最后 5 分钟！一定要坚持到第十八、第十九兵团的全部到达！

的确，西府地区的大部分县城，解放军在西府陇东和陕中战役中两进两出，如果再放弃西安，西安也要第二次解放，中共在西北的工作重点还要第二次由农村转入城市。防御本身是有些被动，就是再被动，也要确保西安、咸阳，这是彭张赵的底线！

据此，彭张赵指挥第一、第二军和刚刚到达西安的第十八兵团一部，对胡宗南部展开坚决阻击！

从 6 月 13 日开始，胡宗南以第三十八军尾第六十五军渡渭河南进，以加强渭河南岸进攻的兵力。

野战军司令部命令第二军先以运动防御节节抗击敌人，然后与第一军沿白马河实施坚决的阵地防御，阻敌于白马河以西地区，保卫西安。

白马河是位于周至与户县之间的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流（1958 年成为周至与户县的界河），因唐僧乘坐的白龙马在此脱胎还俗，开始吃人间草料的传说而得名，其西面是田峪河、东面是涝峪河。

14 日，第二军主力继续向东转移，留下第六师在青花镇附近迟滞敌人。7 时左右，敌第六十五军出动步兵和骑兵，先攻陷青花镇以西的第六师第十六团第二营阵地，接着三面包围青花镇的第十六团第三营阵地，迫使第十六团放弃青化镇附近的阵地东撤。16 时，敌第六十五军分路东犯，向第六师第十七团坚守的岭上、西杨花、庄头一线阵地猛攻，但均被击退。22 时，第六师完成阻击任务后向东转移。之后，敌人开始向周至以东地区进攻。

为了实现坚决阻敌于白马河以西的计划，第二军主力于 15 日在南起虎头山、北至上村镇一线，构筑了坚固的土木防御工事，编成正

面宽 13 公里、纵深约 5 公里、足以持久的防御阵地，并以第六师在阵地以西的田峪河两岸迟滞敌人。

15 日晨，敌第六十五军向田峪河以西的阿岔村、大庄寨、焦家镇一线阵地猛攻。第六师顽强抵抗，与敌反复争夺，激战竟日，予敌以重大杀伤，22 时奉命撤离田峪河防线。

16 日，敌第十八兵团司令兼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率第六十五、第三十八军进至集贤镇一线，发现第一、第二军已有充分准备，除以炮火和小部队进行骚扰外，令第六十五军主力在田峪河以西之司竹府地区、第三十八军在焦家镇地区按兵不动，请求裴昌会派兵支援。

18 日，敌第九十军南渡渭河。李振见援军已到，遂于当日指挥第六十五、第三十八军各一部及骑兵第四团共约四个师的兵力，向南起第四师坚守的小耿峪口阵地、北到第一军坚守的林川寺阵地进攻。时任第二军第五师师长的徐国贤回忆道：

敌人向我新筑的阵地开始进攻，我们立即赶到指挥所，观察敌人的动静，发现敌人东一炮、西一炮的乱放，并没有目标。打炮过后，又发现数股敌人边喊边打，打打停停。我立即意识到敌人在耍花招，目的是想吸引我火力位置过早暴露在他的面前，探清我防御主要地段和纵深。我立即告诉身边的参谋“把敌人的企图告诉各团，要沉着，不能过早地暴露火力位置，没有命令，一枪不发。”愚蠢的敌人攻了一阵不见动静，胆子更大了，开始匍匐前进，后来直起腰端着枪往前冲。敌人离我阵地约 100 米时，我下命令打，一阵猛烈的火力，打得敌人鬼哭狼嚎，调头就逃，在我阵地前沿，扔下了一批尸体。

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失败了，接着，象发了狂的疯狗，又以前面两个军轮番向我攻击，分为数路整连整营地发起冲锋，炮弹象雨点般地向我阵地倾注，战斗越打越激烈。我用电话问了问各阵地的情况，得到的是战士们铿锵有力的回答：“请首长放心，人在阵地在！”无论

敌人多么疯狂，我们的指战员就象铁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敌人的多次冲锋，都不能前进一步。

白马河阻击战给胡宗南部以重大杀伤！

为加强纵深防御，王震以第六师主力在户县祖庵镇以东地区构筑阵地，同时向涝峪口警戒，确保左侧后安全；另以工兵团占领大寨场、840高地，防止敌人从秦岭北麓向东迂回。

第一野战军第一军第三师到达户县地区后，在户县以南地区构筑工事。14日，敌第十七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从东西涝峪口出发，进攻太乙宫附近的第三师阵地。驻贾里村的第三师第七团以第三营依托阵地抗击，以第一、第二营从两翼出击，迫敌向东涝峪口和土门方向逃窜。

为解除南山之敌的威胁，第三师第九团奉命遂于14日9时实施反击，先后攻占白云山、栗峪口、东涝峪口、土门村等地，歼敌300余人，迫使敌第十七军逃入秦岭。

从16日开始，第一军主力奉命在上村镇以北至两河口，沿渭河南岸至前后寨之线，左接第二军，右接第六十一军，构筑纵深防御阵地，坚决阻敌东进与南犯。

在李振率3个军沿渭河南岸进攻的同时，陇南兵团王治岐部沿渭河北岸东进，6月18日接替第九十军进至武功以东长宁镇地区，19日以一部再占兴平。

兴平距西安只有40多公里！

李振前线部队驻守的终南镇距西安也就60多公里！

都是一天的路程！

胡宗南部的东进及第十七军等部北出秦岭骚扰，使西安的形势更加严峻！

在此形势下，只有60万人口的西安到底是守还是撤？有的认为，

对胡马的进攻总是用修筑工事进行抵抗也不是办法，要么集中兵力打击北面的马家军，要么打击南面的胡宗南部，只要解决一面，形势即可好转。那么到底是“击南”还是“击北”呢？类似的一系列问题，在下级指战员中均有不同的意见或看法。

为统一大家的思想，6月19日晚，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野战军前委在西安建国公园召开紧急会议，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张宗逊、赵寿山、阎揆要、王维舟、甘泗淇、张德生、马明方、张经武、周士第、王新亭、陈漫远、杨得志、李志民等出席。

针对胡马联合反扑的严峻形势，会议集中讨论了西安要不要守和“击南击北”（即打胡打马）问题。最后会议取得一致意见：（一）第一线敌我兵力大体相等。敌3个兵团、11个军、32个师共21.3万人。解放军3个兵团、9个军、27个师共24.8万人，且士气占优势。（二）守住西安，并利用西安、咸阳消耗敌人，集中机动兵力寻机歼灭胡宗南或马家军的几个军是完全可能的。（三）敌人寻机决战是我求之不得的，关键要等十九兵团到齐，才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歼敌于西安附近。

最后，彭德怀谈了结论性的意见：现在不是放弃西安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敌人进攻的机会吸引住敌人，歼敌于西安附近。放弃西安，无论从政治和军事方面，还是从军民的士气方面，影响都是很大的，对我很不利。应当利用西安、咸阳诱敌深入，要向军民作战斗动员和解释工作。关于击南击北问题，看来打马是理想的，能在西安附近多歼灭些马家军，会减少将来城市攻坚的代价，但在第十九兵团尚未到达、胡马迫我过早决战的情况下，可能要先打胡，特别当胡宗南部威胁到我不能守西安时，就必须集中兵力歼灭其一两个单位，迟滞其进攻也是需要的（即部分决战）。所以，要不怕任何困难，不为零碎动摇整体。

一句话：西安必须坚守！打胡还是打马要视情况而定！

应当说，这次会议是国共西北大决战中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它承前启后，贯彻了此前彭张赵确定的坚守西安的底线，避免了中共在西北的工作重点出现反复，稳定了军心民心，为集结兵力与胡马决战铺平了道路。

彭德怀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和第一野战军前委书记，对会议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次显示了他在严峻时刻敢于“横刀立马”的作风！

为了做好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工作，5月26日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发出《关于聚歼胡马两军的政治动员令》，专门解释了为什么要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西安解放胡军南逃，我军当时是没有立即穷追的，为什么？固然当时西北部队需要短期休息，并待华北兵团的全部到来，但最主要的，是我们统帅机关深知胡马匪帮，为了垂死挣扎，必将互相利用作狂妄的反扑，果如此，则敌人远离巢穴，我则以逸待劳，将造成西北空前聚歼敌人的良机，今天一切正如我们所意想的摆布，敌人诱来了，而且短短的期间内，马匪在乾县、咸阳、泾阳、淳化诸战斗中，已消耗了七八千人马，胡匪之三十六军也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其一六五师师长也俘来了，敌人残存的气焰逐渐被消磨了，而我们则人强马壮，准备周全，人民拥护，士气高昂，只待命令一发，即将以排山倒海之势聚歼敌人。同志们！这就是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的道理。

全军指战员、工作员同志们！西北空前的大规模的歼灭战就要开始了，全西北的解放，快将实现了，全军动员起来，奋勇前进，聚歼胡马匪军，我们一定要胜利。

事实上，随着第十八兵团到达西安，第十九兵团向西安靠近，胡马的反扑也走到了尽头！

在第一、第二军的严密防范下，李振所率的3个军除以炮火和小部队骚扰外，始终不敢冒进。

6月23日，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五军先头部队到达三原，主力正在跟进。

马家军见势不妙，纷纷后撤。从25日开始，两马开始向乾县以北、南坊镇、常宁镇、通润镇及彬县地区撤退；胡宗南部见马家军后撤，遂以第六十五、第三十八军北渡渭河向扶风集结，第九十军撤至周至以西；王治岐部也开始由兴平西撤武功。

胡马后撤，西安之围自解！

这再次证明了坚持最后5分钟的重要性！证明了6月19日彭德怀等在建国公园所作出的战略决策的正确！

其实，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就看谁能坚持最后5分钟！坚持到最后的就是胜利者！

随着胡马部队后撤，陕中战役也降下了帷幕。

陕中战役是国共西北大决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陕中战役，特别是陕中的第二阶段——胡马反扑、诱敌深入，利用西安、咸阳吸引胡马主力，也就没有后来的扶眉战役。

但对陕中战役的解读，众说纷纭。有的不愿提胡马反扑，好像这与战略追击阶段的“秋风扫落叶”格格不入，因而羞于启齿或一笔带过；有的干脆把抗击胡马反扑放到了陕中战役之外；有的虽然把抗击胡马反扑放进了陕中战役，但因受上报战报截止时间的影响，也没有把陕中战役的起止时间搞准。

行文至此，笔者也有兴对这一战役的起止时间、歼敌人数作一探讨。

对陕中战役的发起时间，争议不大，多数认为是1949年5月11日，少数认为从5月16日野战军主力行动开始。但事实上，野战军

的侦察队从5月11日就开始行动了。因此，笔者同意陕中战役的发起时间为1949年5月11日。

对陕中战役的结束时间，则有各种说法：一种认为是5月20日西安解放；一种认为是5月下旬，追击作战结束；一种认为是6月17日。

笔者认为，陕中战役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对撤退的胡军实施追击，解放了除宝鸡以外的关中平原，当然也包括解放西安在内。解放西安固然意义重大，但这是追击作战的成果之一，因追击行动还在进行，所以不能把解放西安作为追击作战的结束，作为整个陕中战役的结束就更不合适了；第二个阶段，诱敌深入，粉碎胡马联合反扑。这两个阶段互相联系，缺一不可。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以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分册，在撰写陕中战役时，把这两个阶段联系起来写是客观的，也是有充分理由和根据的。我们可以把陕中战役与西府陇东战役和西北1949年春季战役加以对比，西府陇东战役和西北1949年春季战役都包含了进攻和防御两个阶段，陕中战役同样也可以包括进攻和防御两个阶段。

但这两部书的美中不足是，因受战绩统计截止时间的影响，把陕中战役的结束时间定在了6月17日。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次战役结束时间的探讨。6月17日胡马联合反扑还没有停止，可以说6月18日才进入高潮。正因为如此，才有了6月19日西北局和一野前委的紧急会议，讨论西安守不守和“击南击北”问题。所以，陕中战役结束的时间，不是6月17日，而应是6月25日。

把陕中战役的结束时间确定为6月25日，除了这一天胡马联军开始后撤，标志着胡马反扑失败的基本史实外，还有以下证据：

一是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在1949年6月25日致刘金轩、汪

锋并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总观敌匪由进攻关中而转入防御矣。”也就是说，彭张赵认为胡马反扑失败的时间是6月25日。

二是1949年6月28日《群众日报》（西安版）在《粉碎胡马反扑企图先后歼犯匪一万三》的新闻报导中指出：“自六月初至六月二十五日，胡、马匪军曾数度妄想联合反扑西安，我军为诱敌深入，聚歼胡马匪起见，在秦川地区节节诱击中予胡马匪军以重大杀伤。”“第一野战军司令部顷特公布自六月初至二十五日痛歼胡、马匪军之综合战绩如下”。这说明一野司令部的战绩公报也是把6月25日确定为胡马反扑失败的时间。

由此，也就决定了陕中战役的结束时间应为1949年6月25日。

那么，陕中战役的歼敌数字是多少呢？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后面的《重要战役一览表》，陕中战役共歼敌正规军1个军部、4个师、3个团、4个营（第五十七军军部，第三十、第二一四、第二一五、第一六五师，第二十二军1个团，第五十三师2个团，2个营，起义2个营），非正规军1个警备司令部、8个团、2个营（千山警备司令部，5个自卫团，起义2个自卫团、2个营，投诚1个自卫团），计俘虏25150人，毙伤12020人，起义1680人，投诚2070人，合计40920人。这里，把在榆林地区歼灭的左协中第二十二军的1个团，也算在了陕中战役之内了。

其实，陕中战役的战绩，就是追击作战和抗击胡马反扑作战的歼敌数字之和。关于追击作战的歼敌人数，据1949年6月13日《群众日报》（西安版）称：“[新华社陕中前线11日电]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发布5月11日以来至6月5日秦川追歼胡匪之战绩”为27346人，与6月28日一野司令部公布的在粉碎胡马反扑中歼敌13549人加在一起，为40895人，但这里不包括第二十二军的1个团。

所以，陕中战役于1949年5月11日开始至6月25日结束，共

歼敌 40895 人，约 4.1 万人。

关于歼敌数字问题，笔者想再多说两句。各野战军司令部给中央军委上报的每个战役战斗的歼敌数字、战绩公报乃至军委一局的每年战绩公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战役一览表》，都是在每个战役战斗刚刚结束不久，逐级汇报统计出来的，由此军委才得出了解放军在 4 年解放战争中共歼灭国民党军 807 万人的结论。

在此后研究中，论者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总想在每个具体战役战斗的歼敌数字上突破原有结论，其实大可不必。歼敌数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歼敌越多越好。只有充分尊重各野战军司令部的最初统计，才能维护好 807 万的大局，才能使研究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陕中战役以胡马的联合反扑失败而告终！

这一战役，歼灭了胡马有生力量一部，解放了西安、咸阳以东的关中平原，吸引了胡马主力回援，完成了兵力集结，为扶眉决战奠定了基础。

“敌人的招数用完了，该轮到我们的了！”

为了牵制胡马联军不使撤逃，第三、第四、第六军于 6 月 28 日奉命渡泾河南进，进至礼泉及其东北地区；第十八兵团主力进至兴平、咸阳线；第六十五军进至王桥、石桥地区。

这就预示着忍耐已久的彭德怀准备对胡马重拳出击！

辅助战场上十九军牛刀初试

以上是陕中战役期间关中主战场的情况。我们再看看同时发生在陕南辅助战场上的情况。

1949 年 5 月 20 日，在湖北省郟阳中学的广场上，锣鼓喧天，人山人海，第十九军西进誓师大会在这里举行。

张邦英代表中共陕南区党委、陕南行署和陕南人民向部队赠送了

一面绣有“打到汉中去，解放全陕南”的大字锦缎红旗。第五十五师师长符先辉代表部队接受了锦旗，并带领全体指战员作了庄严宣誓。接着，工、农、商、学、妇等各界代表登台发言，给部队以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21日，军长刘金轩、政治委员汪锋率领第十九军，在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送下，带着陕南人民的希望踏上了西进的征程。

当时，从湖北两郟（郟县、郟西）地区到陕南安康地区，沿汉水西进路程最近，但汉水两岸皆为悬崖峭壁，无路可走，第十九军只能先打下白河县城进入陕南，再南下进入湖北，经竹溪再进入陕南。

彭德怀把第十九军作为与胡马决战的“南方一翼”，胡宗南也把防止解放军沿汉水西进作为稳固后方的重中之重，因而在白河、竹溪和安康以东地区设置了三道防线。

胡宗南部第二十七军第四十七师在白河一带设置了南北宽约75公里的第一道防线。其具体部署是：以第一三九团位于白河城西北；以第一四〇团和地方武装“郟（阳）均（县）戡乱大队”4000余人，守备城东的纱帽山、城东南的泡桐树梁和城西的天池岭。

针对守军的部署，23日晚刘金轩召开作战会议，决定由第五十五师担任主攻，并以第一六五团攻占纱帽山，第一六四团攻占泡桐树梁，尔后两团向西发展；第五十七师以第一六九、第一七一团从第五十五师的南侧迂回至汉水边的麻虎沟口、方家台子，阻敌西逃。

24日下午3时，战斗打响。第五十五师仅用了1小时就攻占了泡桐树梁和纱帽山一线阵地，迫使守军向天池岭撤退。至25日拂晓，第五十五、第五十七师将敌第一四〇团和“郟均戡乱大队”包围在方家台子与麻虎沟口之间的木沟子地区。战至8时，共俘敌1267人，毙伤敌团长以下328人，突破了胡宗南的第一道防线。

拿下白河后，刘金轩于25日召集第五十五、第五十七师领导开

会，研究如何突破敌人的第二道防线。

当时，敌第九十八军以第一一七师守备竹溪到得胜铺一线，以第一五八师守备平利到竹溪之间的关垭子、十八盘等地，并以竹溪为重点，组成南北宽 90 公里的第二道防线。如果第十九军全部从白河走大路去平利，不仅要经湖北的竹山、竹溪等县，行程在 150 公里以上，还要从正面攻击凭坚据守的敌人，必然会增加部队的伤亡。经过讨论，刘金轩果断决定，以第五十七师由白河出发，从左翼沿大道前进，伪装主力，吸引正面敌人，以第五十五师从右翼穿越陕南的深山老林，迂回敌人侧后，直插平利县城。

5 月 27 日，第五十五师由黄家湾沿茅坪镇、板桥、双河镇向杨柳坝前进。一路上部队穿越崇山峻岭和深山老林，忽而骄阳似火、闷似蒸笼，忽而风雨交加、云雾缭绕。第五十五师克服缺粮断水的困难，在杨柳坝打垮敌第一五八师第四七三团等部的防守，于 31 日中午解放了平利县城。

第五十七师于 27 日由卡子街出发，30 日解放竹溪。守军得知后路被抄袭，无心恋战，纷纷撤退。第一六九团在关垭子歼敌一个连，31 日在柴家沟截歼敌第一五八师第四七三团一部，6 月 1 日与第五十五师在平利会师。

解放军进入平利县城，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一个老奶奶端着大肉、鸡蛋和米饭，硬叫同志们吃。她说：“不吃，就是看不起我！”其他很多群众也纷纷拿出肉饭要同志们吃，经同志们再三婉言谢绝，群众再三不依，只好吃了，最后付给大米 60 斤、稻子包谷几斗，并按人给了菜金。群众都感叹说：“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队伍！”

6 月 3 日，彭张赵致电刘金轩、汪锋：“我十八及十九兵团须六月十五日、二十日才能先后集结西安附近，故大举进攻汉中歼敌胡匪

须于六月底才能开始。你们得平利、竹溪后，克服粮食困难，休整二十天（至六月二十五日止），注意新区各种政策及部队纪律教育为盼。”

彭张赵指示第十九军于攻克平利后转入休整，敌人的疯狂反扑也使第十九军无法前进。

胡宗南看到第十九军逼近了其第三道防线——安康以东的女媧山一线阵地，遂于6月4日急调第六十九军、第三军从镇安、柞水、石泉地区赶来增援。敌人还出动飞机对第十九军进行狂轰滥炸，第一六四团整队集合时被敌机炸死炸伤50余人。在敌人的猛烈反扑下，为诱敌深入，第十九军于6日放弃平利县城东撤，20日在关垭子等地给进攻之敌以杀伤，之后在湖北竹溪以东的秦家坪、宽坪、锣鼓洞地区进行休整补充。

陕南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从5月24日开始到6月20日结束，历时28天。第十九军毙伤敌1487人，俘敌3775人，共歼敌5262人，迫敌抽兵增援。这样，第十九军先后牵制了敌第二十七、第九十八、第六十九、第三军等部共4个军3.5万余人。

刘金轩、汪锋向一野司令部汇报了作战情况和休整计划后，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于6月25日致电刘汪：

十八兵团于二十二日已全部集结西安附近，十九兵团二十三日先头到三原，但七月四日才能全部集结。野战军拟七月八日开始向敌进攻，如敌退逃，则需提早若干天。

你军休整，请按上述情况斟酌延十至十五天。

据此，第十九军延长休整时间，准备于7月8日发起陕南战役第二阶段作战。

第十九军牛刀初试，一上来就歼敌5000余人，牵制了胡宗南部4个军，迫使胡宗南把第三、第六十九军从秦岭北麓地区调回陕南，有

力地配合了第一野战军正在进行的陕中战役！

第三章

整齐队伍，准备重拳出击

千里征程催人急

如果说在华东战场上是“陈司令的电报嗒嗒嗒，小兵脚板扑扑扑！”那么在西北战场上则是“彭总的电报嗒嗒嗒，小兵脚板啪啪啪！”

从山西归建和划归第一野战军建制的部队，就是在彭张赵电报的催促下紧急开赴西北战场的！

太原战役后，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和第七军以及第一军第三师、第三军第八师，按照彭德怀制定的计划，集结于太原以南地区休整，进行补充兵员、调整装备、开展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等工作。

第六十五军就补充了渤海军区黄骅县的翻身农民 1600 余人、傅作义部第九十四师 3000 余人和大批的太原解放战士，军组建了炮兵团，各师成立了炮兵营，第一九三师各团还增编了九二式步兵炮连。

其他部队经过补充调整，也都变得兵强马壮、武器装备更加精良！
武器装备好了，但思想问题出现了！

第十八、第十九兵团的官兵大都来自河北、山西两省。随着华北的解放，部分指战员开始表现出不愿离开华北，甚至开始羡慕“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为打掉“故土难离”这只进军大西北的拦路虎，各部队普遍进行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把“军队向前进，解放全中国”“革命到底、光荣到底”作为进军大西北的行动口号。

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和动员，广大官兵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纷纷表示：“我们是野战军，肩负着解放全中国老百姓的光荣任

务！”“哪里有敌人就打到哪里去！哪里没有解放就进军到哪里！”有的还在自己的决心书上写道：“千里流水归大海，革命成功再回来！”“大丈夫四海为家，好男儿志在四方！”

战士们把经过政治教育迸发出的革命激情融入到打骑兵等各项军事训练中去！

经过1个月左右的休整，进军大西北的行动开始了！

彭德怀在太原期间给各兵团规定的进军路线是：第十八兵团沿同蒲铁路南下，在风陵渡一线南渡黄河，之后沿陇海铁路西进；第七军和第三、第八师以及第十九兵团，先沿同蒲铁路南下，再从禹门口西渡黄河进入陕西。

我们先看胡马反扑前的一组电报：

5月22日，彭德怀致电周士第、王新亭、陈漫远：

我于二十日黄昏抵三原，请速用火车运一两个师至灵石下车，从潼关渡河，接替西安六军卫戍，以便该军向宝鸡集中。

同日，张宗逊、赵寿山致电第七军军长彭绍辉、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等：

请各兵团务须遵守彭总指示出动的行动。七军及三、八师务于下月十二日到达咸阳地区，十九兵团应于下月十五日后到达三原地区，十八兵团应于下月十七日后到渭、华、潼关线。

5月25日，周王陈复电彭张赵：

我们决定六十一军先乘车西进。先头部队二十七日到灵石，九日可到风陵渡。请西安准备火车到潼关，以便迅开西安接六军防务。

从这组电报看，除彭德怀要求第十八兵团尽速派一两个师车运西安接替第六军防务外，基本上还属于按计划行军。但随着胡马反扑的开始，彭张赵则要求各兵团加快前进的速度！

5月29日，彭张赵致电周士第、杨得志、彭绍辉等：

宁青两马及陕军正在集结兵力准备反击……故十八兵团先头部队应迅速赶至潼关，再由西安派火车至华阴接运（潼关至华阴段被敌彻底破坏）西安、户县集结。七军及三、八两师应迅速向礼泉前进，每日行程不应少于七十里为要。

6月3日，杨得志等致电彭德怀：

十八兵团车运之后尾部队于七日在灵石下车，因而我兵团先头部队须推迟至八九两日出发，以二十四天行军（含休及渡河五天）于七月一日到达指定位置，而后尾部队须至二十三日始能出发（因通过灵石、霍县山地及渡河不便，军与军间需隔两天出发），故全兵团集结完毕则至七月十五日前后。

6月5日，彭张赵致电周士第、杨得志等：

十九兵团应有一部走汾河西岸，主力走汾河东岸，取平行道运输，笨重行李走在全军后尾（十八兵团笨重行李亦应在十九兵团后），每日行程应不少于七十里，走四至五天休息一天，争取六月三十日以前，两兵团主力集结预定地点，不要再推迟。

准备“钳胡打马”开始后，6月9日彭张赵致电周士第、杨得志、彭绍辉等：

青、宁两马五个军，甘肃一个军，胡匪六个军沿泾渭间向我反扑。我以一部节节抗击，主力集结乾、礼、武功，争取时间，准备反攻。望尽速运动，尤其七军及十八兵团，以便不失时机参战。

青马反扑咸阳开始后，彭张赵于6月13日致电杨得志、罗瑞卿

我为诱敌深入，争取时间集结四个野战兵团，于十一日晚放弃泾渭间三角地区。三、四、六等军，集结泾阳、云阳、口头镇地区，于北屯镇控制泾河桥头阵地。一、二两军集结周至、户县地区。三[二]军十二日晚在眉县东南之宁堡、金渠镇歼击三十六军，其军部、六十五师于十三日二时解决。周至、子午镇以南尚有敌十七军、三军，今

午以前开始蠢动，正准备进击中。六十一军已集西安，一个师守咸阳、渭河桥头堡垒。六十军两个师十三日申时可由潼关开始西运，一个师配合中原区向灵宝以南扫清反动地武中。我七军十三日到三原休息一天，开户县以西归还一兵团建制，三、八两师十三日均可归建。你们现到何地盼告。

这一封封电报犹如“金牌调来银牌宣”，催促着各兵团的脚步必须加快、加快、再加快！

第一军第三师和第三军第八师于5月23日由山西清源等地出发，由于重装备较少，归建心切，经过近750公里的夏季行军，于6月13日分别到户县和云阳归建。

第七军（欠第二十一师）于5月24日由山西晋源、清源地区出发，并利用中央军委拨给一野的150匹驮骡驮装备，于6月13日到达三原、泾阳地区，奉命配合第三、第四、第六军准备向马家军出击。

第十八兵团的进军速度变数最大，因为是两头乘火车、中间走路，部队行进的快慢，取决于兵团对部队开进如何组织。

在每个战士负重18公斤的情况下，为加快前进速度，第十八兵团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

第一，改变原定的行军计划。第十八兵团原计划前卫第六十一军于5月28日由榆次出发，车运至灵石（灵石以南的铁路不能通行）后，沿同蒲铁路两侧徒步前进，限6月15日前到达黄河北岸地区，然后渡河西进。后因西北战场情况变化，第十八兵团又命令第六十一军提前于5月26日开始行动，限6月8日前到达风陵渡，然后渡河车运西安。其他各军的行军计划也随之改变。

正由于行军计划的改变，才确保了先头第六十一军及时赶到西安，才有了“皮旅”咸阳战“青马”，否则陕中战役将是另外一种结局！

第二，提前派出了以参谋处长梁军为队长、民运部长米建书为政

治委员的第十八兵团先遣工作队，到达河南陕州地区，负责了解敌情、地形、道路、粮食和群众等情况，进而协调地方建立供应线，组织群众帮助部队渡河及在潼关组织铁路运输。

在胡马准备大规模反扑、野司准备集中主力钳胡打马的形势下，6月7日10时彭德怀致电贺龙、习仲勋、张宗逊、赵寿山转梁军并第十八、第十九兵团首长，第七军首长：

我六十一军本日到达风陵渡时立即南渡，乘车开西安接替六军防务，对南山匪之三军、六十九军、十七军布置防御，六军应准备随时出动开赴乾礼地区，协同三、四军消灭马匪之八十二军全部。如何迅速运输六十一军至西安，由梁军处长负责并随时电告。

由于梁军率领的先遣工作队前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保证了第六十一军尽快车运西安，对防止青马“中央突破”起了重要作用。

正由于第十八兵团采取以上得力措施，才使各军提前到达指定位置：第一八二师于6月9日到达西安，第六十一军主力于9——10日到达西安；第六十军主力于6月14——15日到达西安，其第一七八师为保证兵团主力的侧翼安全，从茅津渡、太阳渡南渡黄河，于6月11——16日合击虢略镇至灵宝地区之国民党地方武装“国防部第三纵队”之李子奎部，经4次战斗，共毙敌100余人，俘虏795人，随后赶上主力。由于该师是第一野战军唯一进入河南省作战的部队，后来中南军区还特意给第一七八师指战员每人颁发一枚“中南解放纪念章”；第六十二军于6月18日全部到达西安；兵团笨重装备于6月26日才到达西安。

第十八兵团在1949年6月27日给第一野战军前委的《行军综合报告》指出：

我兵团于五月二十六日开始从太原出动，四号出动完毕。先头师

于九日到达西安，昨日全部到齐。从潼关到西安全部乘车，从太原到灵石除两个师是走路外，为全部乘车。从灵石到风陵渡行程共七百五十里，因情况需要部队到临汾后三个军均以强行军赶进，每日行程均在八十里以上，先头师连续十一天强行军没有休息，最后两天行程均是一百余里。因我兵团从未作过如此长途的强行军，脚打泡的各军都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加以到后即有任务，物价较高，生活较低，部队仍相当疲劳，但情绪仍然很高。

第十九兵团的变数最小。由于该兵团排在入陕大军的最后，先头第六十五军于6月5日才由山西平遥、介休地区出发，所以整个兵团到达指定位置也最晚。即使如此，部队开始行动后，因前方军情紧急，自然是“不用扬鞭自奋蹄”。对此，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李志民回忆道：

一九四九年六月，我们十九兵团和十八兵团一起，近二十万大军从太原地区出发，冒着酷暑，向大西北进发。原来考虑因天气炎热，规定了一个日行五十里，每周行军五天的从容不迫的行军日程。不料部队刚要出发，就收到彭总来电，指出西北地区即将开始麦收，而八月又将进入雨季，如六月底七月初不能开始战役行动，不仅陷于雨季，对行军作战十分不利，而且陇东陇南夏麦将被敌人抢走，增加我粮食供应的困难，要求我们每日行程不少于七十里。部队渡过黄河不久，彭总早已对西北战场的决战作出了部署，要求我兵团于六月底在指定位置集结完毕，准备迅速投入战斗。于是，这次千里大进军越走速度越快，到后期竟变成日夜兼程的强行军了。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按时到达了指定地点。

第六十五军于6月26日进至三原及其以北地区；第六十四军于6月底到达三原地区；第六十三军于7月3日到达富平地区。

随着第十九兵团到达指定位置，第一野战军集结兵力的任务全部

完成！

也正由于第十九兵团的到来，才使国共双方在关中地区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倾斜！并且第十九兵团的兵锋直指马家军，才引起了宁青两马的后撤，波及胡宗南部也随之后撤，西安之危得以化解！

接下来，就看解放军的重拳到底砸在胡马谁的头上?!

整齐队伍

西北最后决战之前，第一野战军面临两个敌人：一个是胡宗南的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一个是以马步芳为代长官的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胡宗南与马步芳为了“唇亡齿寒”的共同利益走到一起，但他们之间又互不隶属，各有各的考虑，关于作战事宜只能通过协商来解决，这就免不了要讨价还价，决策速度慢且颇费周折。不仅如此，宁青二马之间，为了争夺甘肃省主席的位置也矛盾重重。

所以，解放军在西北所面临的敌人，是一个既有共同利益又矛盾重重的作战集团。

在此形势下，解放军方面整齐划一，步调一致，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随着1949年各野战军任务的确定，中共中央西北局所管辖的地区，不再是原来的陕北和晋绥，而是陕甘宁青新5省！

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加入西北作战，使第一野战军不再是原来的一野，也拥有了4个兵团12个军！

为了更好地完成解放并经营西北的任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的组织进行了调整。

中共中央西北局是中共中央派驻西北地区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中共中央管理西北地区党政军的一切事务。1949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23人为中共中央西北

局委员，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芳、王维舟、李井泉、马文瑞、刘景范、贾拓夫 9 人为常委，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习仲勋为第三书记。

根据 1948 年 11 月 1 日中央军委颁发的《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野战军下辖兵团，兵团下辖军，军以下按三三制编组。但 1949 年 2 月 1 日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时，第八军远在绥远，第七军、第一军第三师和第三军第八师在太原前线，所剩 5 个军 9 万余人，没有立即编组兵团的必要。随着第七军和第三、第八师的归建，编组兵团的条件开始成熟。

1949 年 5 月 29 日，第一野战军前委报告中央军委，拟将西北现有之 6 个军编为第一、第二兵团，以第一、第二、第七军编为第一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张子意任政治委员；以第三、第四、第六军编为第二兵团，许光达任司令员，王世泰任政治委员。6 月 4 日，中央军委批准同意。由于张子意未到职，第一兵团政治委员一职由王震兼任。

1949 年 6 月 17 日，彭德怀等发布《第一野战军关于编成第一、第二兵团及干部任职的命令》，因第三军军长许光达升任第二兵团司令员，任命第一军第一师师长黄新廷为第三军军长；因第四军军长王世泰升任第二兵团政治委员，任命陕北军区司令员张达志为第四军军长（未到职）；因第七军政治委员孙志远调任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任命罗贵波为第七军政治委员（未到职）。

由于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一野前委的人员组成也需要调整。

为此，1949 年 6 月 28 日，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发出通知，宣布一野前委以彭德怀、张宗逊、甘泗淇、张德生、赵寿山、阎揆要、王震、王世泰、周士第、杨得志、许光达、李志民，耿飏、徐立清、潘自力、陈漫远、王新亭、胡耀邦、孙志远、廖汉生等 20 人为委员，

彭德怀、张宗逊、甘泗淇、张德生、赵寿山、王震、周士第、杨得志、许光达为常委，彭德怀为书记。

从前委的人员组成看，前委常委则以野战军领率机关人员为主，吸收4个兵团司令员参加。

彭德怀既是西北局第一书记，又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书记，从而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经过以上调整，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的队伍更加整齐。这既是解放并经营西北的需要，也为取得西北大决战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钳胡打马”还是“钳马打胡”？

从胡马反扑开始，就一直存在“击南击北”问题。

最初，彭德怀想钳胡打马、先马后胡，但由于当时两马难以分割，力量不足，才被迫放弃了泾渭三角地带，退守渭南泾北，进行了咸阳阻击战。胡宗南部上来后，彭德怀还是认为打马最理想，但如果胡宗南部威胁到西安不保，则首先歼其一两个军，迫其后撤。随着第十八、第十九兵团的陆续到达，到底是钳胡打马还是钳马打胡？则开始变得越来越具实际意义。

从1949年6月20日开始，毛泽东与彭张赵继续讨论“击南击北”问题。

这时，王震的第一兵团第一、第二军仍位于渭河以南的户县地区，许光达的第二兵团和第七军仍位于泾河以北地区，周士第的第十八兵团防守西安、咸阳，杨得志的第十九兵团正向三原地区赶进。

20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张赵：“（一）根据马继援拟向泾阳、三原进攻的情报判断，马匪不知我十九兵团将到三原，故有先击破我许兵团，灭除侧翼威胁的计划。当马继援向泾阳攻击时，胡匪如何动作请你们注意侦察，我们判断，胡匪不外两途：一是以全力担任钳制

我渭南各军，保证马匪右侧之安全；二是马、胡同时向我泾北、渭南举行攻势。不论胡匪采取何种计划，均给我军以首先歼灭胡匪的机会。希望你们针对先打胡匪的方针，迅速集中王周两兵团主力，于马匪向泾阳攻击之际，突然发起对胡军的攻击，以歼灭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为目标。（二）当你们举行对胡匪三个军作战时，马继援全部及马敦静一部因受我许兵团威胁是不能增援的，但你们应以一部由咸阳向马敦静佯动，使马敦静完全不能增援。（三）在你们歼灭胡匪三个军的作战获得胜利后，只要我军损伤不大，尚有追击的能力，就应以王周两兵团主力迅速向凤、宝、千、陇方向前进，以期继歼胡匪余部及甘肃王治岐军并占领凤、宝、千、陇，以利尔后配合许杨向两马作战。（四）两马兵力在胡匪主力（三个军）在户县以西地区被歼后，必不敢恋战，必将缩回长武、彬县、平凉地区固守待战，因为我杨兵团要本月底才能在三原集中，至快要下月上旬才能协同许兵团作战，故于王周两部本月底攻击胡匪主力于户西地区时，单独使用许兵团绕出彬县、永寿地区，切断两马退路，包围两马以利下一步作战似乎有困难，甚至不可能。故我们主张王周主力于歼灭胡匪三个军后，应一直向西歼其余部，占领凤、宝、千、陇，完成对平凉作战的战略开展，对两马则让其退回平凉，然后我以王、周、许、杨十二个军全力向平凉两马攻击，似较有利。（五）以上意见是否适宜，请你们考虑电复。”

毛泽东的意见的主旨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

这时，彭张赵倒显得越来越有耐心。

22日，他们致电中央军委：

（一）马匪确有渡泾河攻我泾、原企图。胡匪刻正以一军、三十六军、六十五军、三十八军、九十军沿渭河南岸，陇东[南]兵团沿咸宝公路，十七军及八十四师、二五四师依南山沿子午镇东西有乘马匪

在泾、原与我激战时，向西安、咸阳攻击之极大可能。

（二）依以上情况，我拟以一至三个军（视十九兵团集结程度）位置于三原附近组织顽强防御，给顽敌青马以重大打击与消耗，以利今后作战。集结三个兵团（若敌很快进攻时，二兵团须留一部于三原地区）于西安附近，歼灭胡匪进攻的七个军。

（三）户县以西地区，南靠秦岭，北依渭水，正面仅四十至三十里，且多稻田藕塘，利防御不利出击。因此拟诱敌至西安附近，我集一兵团全部，二兵团大部，以至全部（视敌进攻时间与十九兵团集结程度决定）于西安东南，十八兵团以一个军守咸阳、西安城防与维护工事外，可抽两个军集结于西安、三桥间，敌进到西安西南地区时，我以七至八个军，由东向西出击歼灭之。妥否请示。

毛泽东同意彭张赵的意见，22日他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彭张赵：“假如胡马各敌照你们来电所述，分向渭南、泾北进攻，则你们的作战计划是正确的，但请注意：（一）以许兵团由泾北转至渭南，难于保持秘密，似不如令杨兵团改开西安集中，留许兵团就地钳制马匪，或退至三原诱马深入较为适宜。又一个军不足钳制马匪，至少要有两个军。（二）须估计到胡马各匪可能不战而退的情况，假如这样，则部署须准备及时改变。以上请酌情处理。”

毛泽东主张立即出击、一直向西，彭张赵则主张诱敌于西安附近歼敌，最后毛泽东同意了彭张赵的意见。这是胡马反扑形势下双方的意见。

然而，25日胡马开始后撤。

26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张赵：

你们应当集中王周两兵团全力及许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兵团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

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毛泽东仍然主张钳马打胡，先胡后马！

同日，彭德怀也致电毛泽东：

十九兵团七月四日可在三原附近集结完毕，拟于七月八日开始向敌进攻。就现在敌人部署，青宁两军集结于乾、永、彬、常宁镇、南坊镇、通润镇地区。胡王部目前无变化。以十八兵团钳制王匪军，十九团及一、二两兵团首先围歼马匪主力，被歼后则以一个兵团相机向平凉追击，三个兵团向胡王匪进攻。如马匪继续西撤平凉、长武线防守时，拟于十九兵团位置乾、礼、永寿监视马匪，集中一、二兵团、十八兵团围歼胡匪及王治岐部，夺取宝鸡、陇南，作解放汉中准备，如胡匪主力被歼，则乘胜追击至汉中、广元。

彭德怀提出了两种情况下的两种打法，即如果两马在目前位置不变（小撤退），即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如果两马继续后撤（大撤退），则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并乘胜追击到汉中和川北的广元。

彭德怀的这个打法看起来更痛快！

27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

二十六日电悉。（一）如青宁两敌只作小撤退，位于乾、永、彬、常宁、南坊、通润地区，而不是向彬、长、泾、凉作大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王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王为费力，必须充分准备，从精神动员到作战技术都要力求准备充分，并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的牺牲，以期全歼两马或歼其主力，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因此七月八日开始作战，对于刚到数天的十九兵团说来是否早了一点，值得考虑，似不如推迟若干天，使十九兵团充分恢复行军疲劳，并使各部准备更好些，请酌定。（二）如两马向彬、长、泾、凉作大的撤

退，距离胡王较远，十九兵团只须负担钳制两马任务（仍要小心），则七月八日（或七月十日）开始作战是可以的。（三）广州伪府正在作迁移重庆的准备，大批工作人员已去重庆。我林罗七个军（其余六个军位于豫鄂湘赣四省任守备）可于八九两月到达湘粤桂边区，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广州、桂林等地。广州伪府迁渝时间，当在九、十月间。我刘邓九个军，可于九月由现地出动，十二月前后到达并占领重庆、贵阳等处，以期歼灭伪府，开辟长江上游。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住台湾（现有一派主张迁台，但不占优势），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四）你们在执行当前战役，占领宝、凤、泾、凉后，看青宁胡王四敌主要是青宁两敌被歼程度如何，再决新的部署，如两马主力被歼，进一步解决兰州、青海、宁夏及甘肃西部已无重大困难，则可以按照二中全会时商定的计划，早日分兵为两支。第一支西进，担负解决甘宁青新四省（我们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州，取得油源。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取得更大油源，这是极端重要的任务），这一支兵力的数量以能担负解决上述任务为原则。第二支南进，以占领成都解决川北为目的，出动时间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不可太早，宁可稍为缓一点，以期聚歼胡匪，不使逃入云南。现白崇禧正在部署以桂系兵力退据云南，若再加胡宗南部，则我们解决云南势必要使用大量兵力，而使用大量兵力到云南去，例如五六个军，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现在预计以林罗一部由广西，刘邓一部由贵州合击昆明，总数希望不超过三个军。（五）如果青宁胡王四敌的主力特别是青宁主力不能在泾、凉、宝、凤及其以东地区被我歼灭，则你们暂时不能作大的分兵。那时，为了免除西进路上的侧翼威胁，可以考虑以主力先给胡匪以打击，然后西打两马，待两马主力歼灭后再分兵。（六）请根据上述意图部署一切。此电请

给贺龙同志一阅，并征求他的意见。

毛泽东在这封长电中提示彭德怀注意以下 4 点：

第一，打两马比较打胡宗南、王治岐为费力，必须充分准备，并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的牺牲，以期全歼两马或歼其主力，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

第二，是否可以推迟若干天，使杨得志兵团恢复疲劳。

第三，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不宜去占领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较为有利。

第四，如果两马主力被歼，则可分兵两路，一支进军西北，一支进军西南。但如果两马主力没有被歼，则不能作大的分兵。即使将来分兵，南进部队以占领成都解决川北为目的，出动时间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不可太早，以期聚歼胡匪，不使逃往云南。

在毛泽东的 4 点提示中，第三、第四点是问题的关键！

毛泽东之所以一直主张要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就是因为第一野战军分兵南下入川，要与第二野战军的进军西南相配合，否则就要引起胡宗南部的狂逃，难以将其聚歼于四川境内。

也就是说，第一野战军分兵南下入川，或者第一野战军主力南下陕南、进入川北，牵动着向全国进军的战略全局。这一问题在毛泽东的心中从没有（他开始也曾主张第一野战军主力打到汉中）到有，从隐约、模糊到越来越清楚，当他把这一清楚的考虑告诉彭德怀时，暂时不得越过秦岭就变成了一条红线！

事实上，1949 年 11 月 1 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发起进军西南作战，贺龙率第十八兵团若近若离地跟踪胡宗南部南下，当第二野战军迂回到川南时，第十八兵团也进入川北。最后第二野战军主力与第十八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将胡宗南等部聚歼于成都地区。

正因为毛泽东过去心中一直隐约有这条红线，所以要求第一野战军要先胡后马、由南向北（由关中平原向北打）。彭德怀过去是没有这条红线的！尽管5月23日中央军委曾提出过年底或年初一野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但具体怎样协作，毛泽东也没有讲清楚（这时也不可能讲清楚，只能根据战局的发展逐渐清晰起来），而打胡又需要彻底追击，所以彭德怀一直主张先马后胡、由北向南（先歼灭两马主力再经关中平原向陕南和川北追击）！

这就是彭德怀与毛泽东的认识差别所在！

这种认识差别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同（战争全局和局部）所致！

这是对他们二人在作战方针上总有“分歧”之最合理的解释！

既然毛泽东划出了红线，留给彭张赵可以选择的，就只剩下由南向北——“钳马打胡、先胡后马”了！

6月27日，彭张赵向各兵团开始下达“钳马打胡”的预备命令。至此，将帅的认识得到统一！

彭德怀、张宗逊解读马家军

所谓“知己知彼”，就是既要了解自己，也要了解作战对手，对作战对手的实力和作战特点要了如指掌。只有这样，才能“百战不殆”。

中央军委在1949年6月26日给彭张赵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毛泽东连续使用了“严格告诉”“千万不可轻视”“必致吃亏”的严厉措词，说明他对马家军是何等的重视！

联系他在电报中所强调的打两马“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的牺牲”，以及后来的“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都说明即使到了“秋风

扫落叶”的战略追击阶段，毛泽东从来没有轻视过作战对手，特别是马家军和白崇禧的桂系部队。因为“兔子急了还咬人”，越到最后阶段，敌人越要垂死挣扎！

这样，在胡马决战之前，搞清马家军特别是青马的作战特点及其对策，也就显得十分重要。

其实，彭德怀从1947年五六月进行陇东战役开始，就注意研究马家军了，到1948年5月西府陇东战役结束，对马家军特别是青马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总结了青马的两个主要特点：

其一，青马每个连队中有阿訇一人，宗教色彩很浓厚。干部以马家亲族为骨干，士兵中有汉人，但占多少比例尚不了解。该部野蛮强悍。在长期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下，民族成见较深，盛传有杀死汉人四五名即可升天之说。士兵在战斗中负伤后有自杀不当俘虏者。

其二，青马军的编制是步骑各半，在西北高原作战颇适宜。我退，骑兵即追，我停止，步兵即掩护。增援快，机动性大，骑兵战术较熟练，学日本人的骑兵战术原则，但无新的发挥，冲锋时持密集队形，勇敢但又落后。由于过去未曾遭过我之致命打击，现在很骄傲。又因部队干部之亲族关系，故一部被围，另部必救，且敢于分散来援。射击技术熟练，善打冷枪，但其他兵器之知识及攻坚爆炸等技术均差，不如胡军。

由此，彭德怀认为：“马军是脱离群众的封建的野蛮迷信的军队，他们奸淫掠夺，激起群众反对；他们缺乏科学头脑，仅凭蛮横强悍作战，我们一定能够把他们消灭。”

张宗逊先后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47年10月升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作为彭德怀的第一副手，他对青马的作战特点也非常了解。

1949年6月26日，应周士第的邀请，张宗逊在第十八兵团团以

上干部会议上，专门讲解了青马的作战特点及部队应注意的问题：

（一）一般特点：

落后、顽强，部队中有阿訇编制，政治动员是“保卫宗教，保卫民族”，冲锋时，喊“天门开了”，认为死是光荣的，死后可成神。官兵间多用亲戚叔伯爷之称，形成封建团结，现在的口号是“民族生存”、“战败了回族即会灭种”，因此作战较顽强。它不看全国政治形势，没有远见，好像是自己力量可解决一切。

战术知识落后，不善运用队形、组织火力。完全依靠人冲，对外壕及围墙无法克服，但士气旺盛，善于野战攻击，当其未遭受歼灭性的打击前，一般不易缴枪。

步骑配合灵活，进攻时骑兵先接近，步兵随后，有时步兵在前面，骑兵在侧后，如正面地形狭小，即步兵在前，骑兵在后，以备扩张战果。退却时步兵先退，骑兵在侧后掩护。

（二）作战特点：

1. 骑兵主要是奔袭我薄弱之处。骑兵每日可行一百二、三十里，可乘马用刀冲锋，其马可在一般山地活动，其弱点是火力不强，受地形限制。

我们对骑兵应时刻注意，丝毫不应疏忽，养成任何时候都能战胜骑兵之心理与措置。随时作好工事，组织好火力就地开火。而尤其是沉着应战，切忌混乱。如去年四军一个团在不利的条件下执行掩护任务，敌骑兵紧随，我停敌停，我动敌来，由于该部沉着，采取周围式抗击与转移的方法，结果将敌击退，完成任务。

2. 敌进攻特点：无攻坚经验，靠凭袭击。进攻准备仓促，一旦发现我军就攻，故野战时要特别注意。

敌不会组织火力，对防御障碍不会克服。但冲锋顽强，特别是开始几次进攻队形密集，一连一营不断地冲。

我防御时注意加强侧后侦察警戒，防敌骑兵袭来，但不派出太远，派出侦察要有运动工具，如脚踏车、骑兵。步兵要注意利用围墙壕沟，加强火力组织，注意纵深配备沉着应战。

3. 敌防御特点：经常组织反冲锋，增援亦较迅速。如合水战斗，敌一千余人防守，我两个师进攻，敌最后只剩一百八十二人，仍组织向我反扑。

4. 我在进攻时应注意：

甲、组织火力，集中于一点，行毁灭性的射击，消灭其有生力量。

乙、进攻队形应成纵深配备，防敌反扑与突围，加强侧后警戒，防敌增援与迂回。

5. 追击时应注意：如敌步骑联合作战，则以追步兵为主，打骑兵先打马群。青马如系有计划的撤退，我们追击应谨慎，不要混乱，防敌反扑，如确实敌被我打垮，应大胆迅速追击。

6 部队一般注意：

甲、青马射击准确，故我应注意利用地形地物。

乙、冲锋善用刀，故在白刃战中应注意利用抵近射击及冲锋枪。

丙、防止敌假投降，当我未给以严重的打击前，敌喊缴枪不要相信，否则要吃亏。

丁、敌战术陈旧落后，最怕我用手榴弹及炸药，故我应多注意使用。

张宗逊所言，可谓经验之谈！其中的经验教训都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弥足珍贵！

然而，任何一支军队的强悍，都是相对的。当把作战对手的作战特点及其对策搞清楚、弄明白了，它也就变得不那么厉害了！

杨得志兵团在即将开始的西北大决战中，担负着钳制马家军、保障野战军主力侧后安全的任务，了解马家军的作战特点及其对策对该

兵团固然十分重要。然而，第十九兵团经过平津和太原战役，在野战军的4个兵团中装备最精良，火炮也最多，只要占据有利地形，对付马家军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杨得志、李志民到咸阳参加一野前委会议时，彭德怀只告诉他们一点，这就是防止马家军从背后偷袭。对此，杨得志回忆道：

彭总见到我们就说：“你们对付二马，切不可有轻敌情绪。他们惯用的手法是绕到背后突然袭击。只要能防备这一手，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毛主席要我告诉你们的。”

张宗逊该讲的都讲了，彭德怀该嘱咐的也交代了！

接下来就看马家军敢不敢来！

第四章

打响扶眉战役， 把西北大决战推向高潮

“钳马打胡，先胡后马”方针的确立

面对解放军大军云集，胡宗南的部队不但不撤，反而把陇海铁路上的千河铁桥修通，使火车能够从宝鸡一直开到武功，好像在与解放军叫板——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于是，西北大决战难以避免！

决战之前，我们先盘点一下双方参战的一线兵力和部署。

胡宗南的西安绥靖公署在关中地区的参战兵力有：第十八兵团部，第六十五、第三十八、第三十六、第九十军，刚刚补充起来的第五十七军第二一四师，以及防守子午口的第十七军第十二师，共计1个兵团4个军12个步兵师10万余人；在陕南地区的参战兵力有：第一、第三、第十七、第六十九、第九十八、第二十七军，共计6个军15个步兵师10万余人。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在关中地区的参战兵力有：王治岐的陇南兵团第一一九军及第一九一师；马敦静的宁夏兵团第一二八、第十一军；马继援的陇东兵团第八十二、第一二九军，共计3个兵团5个军11个步兵师、3个保安纵队、2个骑兵旅11万余人。

第一野战军在关中地区的参战兵力有：第一、第二、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和骑兵第二师，共计4个兵团12个军34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33万余人；在陕南的参战兵力为第十九军2个步兵师和安康军分区部队，共计2万人左右。

这样，在关中的主战场上，解放军为 33 万余人，胡马联军为 21 万余人，解放军拥有各种重炮（山炮、野炮、榴弹炮、重迫击炮）616 门，胡马拥有各种重炮（包括陕南地区的）171 门，解放军占相对优势；在陕南的辅助战场上，解放军为 2 万人左右，胡军为 10 万余人，敌占绝对优势。

当时，胡马两军在关中地区的部署是：

李振的第十八兵团部（第六十五军军部）率第一六〇师驻眉县以东、渭河以北的祁家村、窑上（尧上）、白家村一带，其第一八七师驻武功车站小营地区；

李振西的第三十八军军部率第五十五师驻扶风县豆村、午井镇一带，其第一七七师驻杨陵镇、小寨一带，其骑兵第四团驻武功县张寨

王治岐的第一一九军军部驻青化镇，其第二四四师驻武功华家堡一带，其第二四七师驻武功西北菊花镇，其骑兵团驻大小王上村，第一九一师驻十里铺；

第九十军军部率第五十三师驻金渠镇、宁渠一带，其第二十四师驻哑柏镇，其第六十一师驻槐芽镇一带；

第三十六军驻眉县，其第一二三师驻辛口子一带；

马敦静的第一二八军主力驻崔木镇、邵寨地区，其第十一军驻旧永寿；

马继援的第八十二军军部驻彬县，其一〇〇师驻常宁镇一带，骑兵第八旅驻南坊镇一带，其第一九〇、第二四八师驻泾河以北之张洪镇地区，骑兵第十四旅附第一〇〇师骑兵团住土桥、通润镇地区，第一二九军驻彬县。

从胡马部队驻地的分布来看，宁青二马驻地分散，宁马在北，青马在南，青马保持随时沿泾河两岸南下的态势；胡宗南部在渭河以北的第六十五、第三十八、第一一九军比较集中，渭河以南的第九十、

第三十六军则一东一西。

第一野战军的部署是：第一兵团第一、第二军仍然位于渭河以南的户县及其以西地区；第二兵团位于礼泉地区；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位于渭河以北的兴平及咸阳、西安地区；第十九兵团位于三原、泾阳地区。

这就是西北大决战前夕双方的态势！

令人不解的是，在解放军大军压境之时，胡马为什么不撤？难道真的要螳螂挡车，与解放军进行毫无胜利希望的决战吗？

台湾方面的战史是这样讲的：

当裴昌会部进至兴平，并与解放军在户县激战时，青马已经北撤，“胡主任获悉全部状况后，与马代长官协商，宁夏兵团与陇东兵团调整部署，须延后三天再兴攻势。不意在此三天期间，匪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到达。优劣易势。”

胡宗南部也开始后撤后，“七月上旬，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为顾及本身安全，复又商请西安绥署，即以现接触线为永久阵地，不再向南转移；马部主力愿再占领淳化、乾县之线，使之互成犄角，阻匪西进及南犯。”

然而，不管是“延后三天再兴攻势”，还是“阻匪西犯与南犯”，只要不撤，就是在寻求与解放军决战！

在彭张赵看来，“胡匪暂无放弃宝鸡企图，且有诱我主力出击，马匪乘机反扑，击我侧背象征。”

针对胡马的作战企图，彭张赵动员全军准备决战！

7月1日，彭德怀签署了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关于消灭胡马军的战役指示》，指出：

胡马匪军集全力反扑，受了咸阳、眉县、乾县、礼泉、泾阳、新店等战斗的打击，及华北兵团的陆续到达，被迫放弃攻取西安的计划，

但敌人的野心未死，还企图在后撤中间，布置战场，待我出击，有机可乘的时候全力反扑，打败我们，或节节顽抗削弱我军。

华北兵团与西野兵团会合之后，兵力增加，互相鼓励，交流经验，士气倍加旺盛。西安巩固，铁路迅速恢复通车，地方党、政府、群众的热烈支援；弹药、粮食补给、伤员的运送等，都比过去顺利得多，这些都是有利于我军的条件。同时我军也还有困难的方面，这就是兵力对比，不占绝对优势，只占相对优势；西北地区辽阔，经济落后，物资支援仍严重缺乏。

敌人虽在兵力数量上、质量上（装备、技术、战术、士气）、后方补给上、群众条件上、战役指导上，以及全国形势，均不如我军，但敌人采取孤注一掷企图作垂死的挣扎，胡马之间都深感唇亡齿寒的威胁。因此，就可能产生一定的顽抗性，就可能暂时缓和其内部矛盾（胡与马间，马与胡之间），以上这些就是敌我力量对比的特点。

我们的战役目的，是要全歼胡马匪军主力的全部或大部，敌我力量对比我只占相对优势，不能采取一举聚歼，只能采取分割歼灭，钳制抗击一个方面，集中主力歼灭另一个方面，一块一块地分割歼灭敌人。

我们盼望已久的与胡马匪军的决战就要开始了，这个决战的胜利，就决定了整个西北的迅速解放，我们有充分的条件使我们在决战中取得胜利。

全体指战员，共产党员，战斗英雄们，后勤工作人员都要紧张的行动起来，发扬我们胜利的光荣传统，在各个不同工作岗位上，团结起来，发挥智力劳力，进行充分的战斗准备，勇敢而顽强的战斗，为彻底歼灭胡马匪军而共同奋斗。

这个指示，堪称西北大决战的政治动员令！从而吹响了与胡马决战的号角！

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习仲勋对各类人员提出不同要求：政工人员要“人人开口，个个鼓动，提高士气，瓦解敌军”；炮兵战士要“弹无虚发，百发百中”；侦察人员要“胆大机智，准确及时报告情况”；通讯人员要“迅速准确完成通讯联络任务”；医护人员要“发扬英勇精神，救护负伤同志”；炊事员要“做好饭菜，烧好开水，及时送到前线”；后勤人员要“保证弹药粮草供应”；担架人员要“英勇抢救伤员，保证不丢一个”；全体共产党员要“冲锋在前，处处做表率，保证完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全体指战员认真执行民族政策、俘敌政策。

1949年7月，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对西北回民及国民党军的宣传口号》。其中，对敌一般标语口号有：“欢迎胡马兄弟们携械来归，参加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不分回汉。”等等。对西北回民及马匪军的口号有：“实行民族平等，回汉平等，信教自由。”“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回民要翻身，帮助解放军！回民要自治，消灭胡马匪！”“西北回、汉、蒙、藏各民族联合起来，打倒共同敌人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等。

据此，全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备战热潮！

7月4日9时，彭张赵等致电各兵团领导人：各兵团务于7月8日完成一切作战准备；野战军准备以第十九兵团钳制两马，集结第一、第二兵团全部及第十八兵团主力，首先歼灭胡匪三、四个军，再集全力歼击马匪。

由此可见，在第一野战军第七次前委扩大会议召开以前，就基本确立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当然，这一方针的最终确立，还有待于前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

7月的关中平原，天气异常炎热。

咸阳第十八兵团司令部会议室的窗户敞开着，吹进的阵阵微风，

也是一股股热浪！

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和各兵团领导于7月6日都赶到这里，参加一野前委第七次扩大会议。

彭德怀一见到杨得志、李志民就说：“你们长途行军，很辛苦。最好给你们一个月时间休整，而现在马上要打仗，连准备的时间也很少了。虽然充分准备是胜利的关键，但失掉战机，纵有充分准备也不能歼灭敌人。好在主攻部队已经准备好了。”

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开始！

经过讨论，会议一致认为“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方针是切实可行的。最后，由彭德怀作结论性发言。

他背对着画满蓝色标志和红色箭头的地图，直截了当地说：“现在胡宗南和马家军集中全力布置了一个‘口袋阵’，企图阻止我军前进，这是白日做梦。马继援、马敦静现在退缩在乾县、永寿以北的麟游山区设防，东起土桥镇，西至崔木镇，战线拉得很长，胡宗南的五个军集结在武功、扶风、眉县之间的渭河两岸，背靠秦岭，进可攻，退可守。”

人多天热，会议室的温度逐渐升高！

彭德怀脱下军帽摔在桌上，顺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接着说：“二马兵力分散，正面太宽，难以包围聚歼，而胡宗南主力集中于扶眉地区，在宝鸡只有一个刚补充起来的二一四师，纵深力量薄弱，在秦岭只有一个十二师，胡军主力与二马虽可南北策应，但空隙太大，利于我军向其侧后迂回包围。这，就是我军聚歼胡军主力的良好战机！”

彭德怀又擦了擦脸上的汗说道：“我们要以一部分兵力阻止马家军南下，然后以迅速、猛烈、果敢的手段向扶眉一线的胡宗南主力发起猛攻，把尖刀刺向胡宗南，打破他的‘口袋阵’，歼灭他的主力军，

然后再收拾青宁两马，解放兰州，端他的老窝！”

顿时，会场下面议论纷纷。

彭德怀伸出双手示意，会场又恢复了平静。

最后，他以坚定的语气说：“同志们！我们决定钳马打胡，先胡后马！”

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就这样最终确定下来！

参谋长阎揆要宣读了战役部署后，彭德怀特意提醒许光达和王世泰：“最关键的是你们二兵团，你们要隐蔽开进，路上遇小股敌人不要纠缠，突然插入敌后，抢占罗局镇，直逼渭河，切断陇海路，阻击敌人向宝鸡撤退。”

7月7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阎揆要正式下达了《关于歼灭胡宗南、王治岐军的作战命令》：

（一）敌情如夏字第十八号通报。

（二）我军拟首先钳制马匪，歼灭漆水河与千阳河间及眉县东西地区之胡王匪军，得手后继续歼灭马匪之目的，第一步战斗部署如下：

甲、第十九兵团（附骑兵第二旅）于本（七）月十日进到唐王陵、两马山、铁佛寺、仪井、杨家山之线（置重点于乾、礼间）构筑据点工事，积极钳制青宁两马匪军于乾、永地区，确保我沿咸凤公路作战兵团右侧后之安全。第一八八师控制口头镇，骑二旅位置于淳化以北向通润、土桥方向侦察警戒。

乙、第二兵团于本（七）月十一日隐蔽集结于临平镇以东乾县西南地区，于十二日向法门寺（即崇正镇）、益店镇及其南北多取平行道猛烈攻击前进，迅速截断罗局镇以西[东]胡匪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一一九军之退路，协同第十八兵团将敌包围压迫于渭河北岸午井镇、罗局镇地区全部歼灭之。

丙、第十八兵团（欠六十一军两个师附第七军）于十二日沿咸凤公路及其以北之大王村、牛市沟、吴家堡、王家堡、杏林镇、浪店、刘家堡之线（均含）向武功及刘家堡以南、以西之敌攻击前进，协同第二兵团将敌包围压迫于渭河北岸午井镇、罗局镇地区而全部歼灭之。

第六十一军（欠一个师）仍卫戍西安及各个歼灭西安以南子午镇地区之匪军。

丁、第一兵团（欠七军）于本（七）月十二日开始各个歼击渭河南岸周、眉地区敌之九十军、三十六军，得手后向宝鸡以南挺进，截断胡匪退路，并相机策应渭河北岸作战。第七军归第十八兵团首长指挥。

戊、军区骑兵第二旅归第十九兵团首长指挥。

（三）十八兵团、二兵团、一兵团尽可能十二日拂晓突然发起攻击。

（四）各兵团注意修复西兰、西凤、西眉之长途电话线与车路，保持交通联络，掌握电话局并注意无线电台之联络。

战斗中之联络讯号：七月份中旬口令，使用民字第二号，下旬用民字第三号；七月份中下旬讯号仍用民字第三号。

（五）战斗开始后，野勤在礼泉设医院，接收十九兵团伤员；在兴平设医院，接收第二兵团及七军之伤员；在丰镐村（战斗进展后向户、周推进）设医院，接收第一兵团伤员。骑二旅及一八八师之伤员直送三原医院；十八兵团之伤员自行布置医院接收。

弹药之补给：一、二两兵团由野勤负责，渭北由咸阳补，渭南由西安补给。十八、十九两兵团由各该兵团自己负责布置。

（六）野司指挥所于本（七）月十一日第一步到咸阳。

应当说，这个作战计划以歼灭渭河以北胡王 3 个军为重点，部署得天衣无缝！

首先，以第十九兵团和骑兵第二师位于西兰公路和泾河北岸，就彻底堵塞了宁青二马南下咸阳、西安的两条道路，既确保了第二、第十八兵团的右翼安全，又可保咸阳、西安无虞！

其次，以第二兵团向敌后迂回，以第十八兵团沿咸宝公路跟进，使渭河北岸的敌3个军不可能向北、东、西三面逃跑，而南面又是渭河，正值雨季，敌人又没有渡河工具，如果渡河南逃就要看其命运如何了！

再次，充分利用了西府地区的地形特点。北塬地形开阔，则以第二兵团实施战役迂回，渭河以南地区狭窄（南北宽仅有15——20公里），且多河流和稻田藕塘，无法实施战役迂回，则以第一兵团两个军一路向西，攻击前进，并配合渭河以北作战，歼截南渡渭河之逃敌！

最后，以第六十一军1个多师的兵力于10日发起进攻秦岭子午口作战，同时以第十九兵团对两马实施防御，使胡马一时弄不清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到底指向哪里，从而有利于第一、第二、第十八兵团求歼胡王主力，充分显示了彭张赵等运用声东击西的战法之妙！

从1949年6月29日开始，尽管彭张赵发给各兵团的电报有时也同时上报中央军委，但这时再也见不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复电和指示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毛泽东的指挥是战略指挥，他只对作战方针和战前应注意的问题发表意见，一旦在作战方针上意见统一，具体战役指挥则是战区指挥员的事，他就只等作战结果了。

这才叫将帅协谋！

“皮旅”和十九兵团分向南北

“皮旅”第一八一师刚打完漂亮的咸阳阻击战，又受领了新的任务，换防到西安南郊地区！

根据野司和第十八兵团的部署，第六十一军除留第一八二师1个

团另两个营继续担负卫戍西安的任务外，军部率第一八一师附第一八二师第五四五团及第五四四团 1 个营，攻歼盘踞在西安南山小五台地区的敌十七军第十二师两个团。

南山之敌曾窜抵灞桥和大雁塔附近，严重威胁到西安的安全。6 月下旬，第二、第十八兵团主力西移后，该敌更是不断出扰，一度窜至户县附近，占领子午镇。

只有歼灭该敌，才能确保西安的安全！

小五台，是当时西安市南郊的旅游胜地。五座山峰耸立于子午峪口的左侧，上有亭台庙宇 10 余座，松柏参天，荆棘满山。登山之巅，可俯瞰西安和关中平原，地形十分险要。山腰、山包、隘口均有抗日时期胡宗南部构筑的国防工事。

敌第十二师师部和第三十五团分别驻子午峪口右侧的土地岭、白娘庙及西南的玄登台、青华山等一带高地，其第三十四团盘踞于子午峪口左侧的小五台。守军自以为有险可恃，曾吹嘘“进可以直取西安，退可以据守秦岭，是一条打不垮、攻不下的钢铁屏障”。

6 月 30 日，第六十一军军部率第一八一师等部，集结于小雁塔、韦曲一带进行作战准备。由于小五台地区地形复杂，为制定好作战方案，从 6 月 30 日至 7 月 9 日各团都组织了短小精悍的侦察分队，渗入敌人纵深进行侦察，10 天内共捕捉到 12 名守军进行审问，对敌情、地形、道路等，提供了较为确切的资料。

担任穿插迂回任务的两个团，还由主要干部带队，深入敌后进行侦察。第五四五团参谋长伍奉潮，带领侦察员潜至小五台东侧的配古洞、黄河岔一带侦察达三昼夜，将老原岭附近的地形、道路和守军防御情况，了解得较为清楚，并带回了一名熟悉当地地形、道路的小学教师作向导。第五四一团参谋长张国志，也带侦察员深入到子午峪口西南方向的 1100 高地和玄登台附近侦察两昼夜，对该地情况也有

了相当了解。

7月9日，部队进至湘子河、藻河以北地区隐蔽集结。根据敌情，第六十一军军长韦杰、政治委员徐子荣与第一八一师师长王诚汉等决定：由第五四一团从敌之左翼插入敌阵地纵深，占领土地岭、玄登台、1100高地，由第五四五团从敌之右翼插入老原岭，断敌退路；以第五四三团、第五四二团分别从子午峪口左右正面攻击，待迂回部队攻占上述要点后，即压缩包围，歼灭守军。

7月10日24时，战斗打响。

担任迂回任务的第五四一、第五四五团，攀登悬崖峭壁，插入深川丛林。当时，云夜昏黑，草深没膝，要走的羊肠小道，根本无法辨认。部队在向导的带领下，时而爬山而上，时而“坐电梯”滑下。

正面部队也分别向子午镇、金土庵、白娘庙攻击前进。

11日5时，第五四五团准时袭占了老原岭，将正在酣睡的敌第三十四团第二营第四连全部歼灭，并相继占领了小五台以东的高地。

第五四一团于11日晨占领了1100高地后，至11时又攻占了土地岭。敌第十二师师部及第三十五团各一部提前逃跑。

正面部队先后攻克了金土庵、白娘庙、子午镇，控制了峪东之皇庙梁，并由山脚连续攀登5个台阶地，仰攻到比高800米的小五台山顶。至12时将敌第三十四团压缩于正经殿、白云庵、五佛殿等几座高庙内。

当时，正值暑季，热浪滚滚，烈日灼肤，中暑晕倒的很多。战士们翻越近70度的陡坡，汗流浹背，口渴难耐，山顶一点水也找不到，只能以尿解渴。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的战士们负荷最重，每人一件，无人替换，弹药手每人扛8——12枚炮弹，肩膀被压肿甚至出血。然而，他们毫无怨言，照样完成作战任务！

第五四一团第四连第二排为截击敌人走到绝地，于是全部从悬崖

上跳下，虽跌伤 17 人，仍坚决完成了任务。

第五四二团第九连第二班勇猛坚决，连续攻下小五台的 6 座庙宇。

处于四面受攻的敌第三十四团，最初还想凭险顽抗，以逸待劳，当发现必须突围时，则妄图以集团冲锋夺路逃跑。

第五四五团第三连第二排，与夺路欲逃的敌人 4 次白刃格斗，把敌人打了回去。最后，敌第三十四团孤注一掷，纠集班以上士官作集团冲锋。第二排排长张正春带头出击，战士吕达高呼：“我们一个排，打他一个团！”连续刺死 6 个敌人，新战士池连河连刺 3 敌，机枪手连子贵端起机枪横扫，使敌遗尸 40 余具，粉碎了其企图夺路的妄想。

16 时 30 分，部队对固守小五台庙宇的残敌发起总攻，仅用了 15 分钟，即解决战斗！

小五台战斗，共歼敌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全部、第三十五团及师直各一部 2100 余人，第一八一师等部共牺牲 48 人，负伤 277 人。

小五台战斗，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

它从此解除了秦岭之敌对西安的威胁！

并宣告了对胡马最后决战的开始！

在第一八一师等部准备发起小五台战斗的同时，第十九兵团及骑兵第二师按照野司的部署，从西到东依次排开：

第六十五军于 7 月 9 日从三原地区出发，以两日行程于 11 日进抵乾县以北地区：第一九四师展开于仪井镇、高庙山、杨家山一线；第一九三师展开于铁佛寺、刘家凹、伍家凹、罗胡村一线；第一九五师占领唐高宗（乾陵）、寺里坊、韩家窑一线。

第六十四军于 7 月 8 日在乾县、礼泉之间的泔河下游南岸地区展开，与第六十五军接防。

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进至礼泉以西北海河袁（北泔河沿，即泔河北岸）、郑家世都（郑家村）地区，第一八七师进至乾县以北唐王

山、两马山（凉马山）地区。

第六十三军第一八八师及骑兵第二师进至淳化、通润（今润镇）口头镇（今口镇）地区。

第十九兵团指挥部进驻礼泉县城。

各部队依托高地构筑防御工事，严阵以待！

扶眉战役期间，第十九兵团及骑兵第二师虽未打一枪一炮，但其作用不可小觑！

正由于第十九兵团及骑兵第二师近 10 万人布防于西兰公路两侧和泾河两岸，才使两马不敢轻举妄动，从而保证了第二、第十八兵团的右翼安全和扶眉战役的顺利进行。

彭张赵的另一个考虑是，由于第十九兵团刚刚到达，部队疲劳，由其担任钳制两马的任务，还可能得到一定的休息，以便指战员恢复体力，更好地参加下一个战役。

彭张赵可谓用心良苦！

二兵团迂回敌后

7 月的关中平原，烈日炎炎，暑气蒸人。

担任战役迂回任务的第二兵团指战员，精神抖擞，整装待发！

7 月 8 日，第二兵团司令部在礼泉县言村（沿村或晏村）召开第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部署穿插迂回任务。

执行尖刀的任务交给哪个军？是问题的关键！

许光达经过反复斟酌，决定由第四军担任。

第四军是陕北红军的老底子，在创建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斗争中立下过汗马功劳，但在 1948 年的西府陇东战役中因执行命令和阻敌不力，在土基会议上旅、团干部遭撤职，被批得有些抬不起头来。从那时起，全军上下就憋着一股劲要打翻身仗。

第三军军长黄新廷、第六军军长罗元发都支持第四军打头阵，并

表示愿做他们的坚强后盾。

兵团领导的期望和兄弟部队的厚爱，使第四军领导深受感动。该军政委张仲良表示：“请首长们放心，我们一定连续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敌人，保证战役任务的圆满完成。”

7月10日上午，第二兵团司令部在礼泉城东的一孔窑洞里，第二次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研究穿插迂回问题。

许光达站着严肃地说：“彭总特别提醒我和世泰同志，‘最关键的是你们二兵团，你们要隐蔽开进，路上遇小股敌人不要纠缠，突然插入敌后，抢占罗局镇，直逼渭河。’我们二兵团全体同志决不能辜负彭总的希望和兄弟部队的信任，一定要坚决切断敌军退路，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四军哪个师担任尖刀任务？”许光达问道。

张仲良回答说：“十师！”

“好！看看大家对完成穿插迂回任务还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许光达坐下说。

第十师师长刘懋功想提意见，并事先与张仲良和第四军副军长高锦纯沟通，他们都说不能提。

但刘懋功还是按捺不住，于是走到许光达前面指着地图说：“由礼泉驻地到罗局镇140华里，到眉县车站150华里，天热路远，按时到达有困难。”

“你有什么想法？”许光达问。

刘懋功谈了两点意见：第一，下午提前出发；第二，部队轻装。全师编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3个团不带背包；第二梯队由师炮兵营、各团迫击炮连和各营重机枪连组成；第三梯队是师后勤部带领各团后勤处，包括各连的炊事班，带上战士的背包。

“提前出发走漏消息，敌人提前跑了怎么办？”许光达问。

“不会的。要派出得力干部带师、团侦察分队，把下午行军要经过的地方所有通向敌人那边的道路全部封锁，进来的暂扣，一个不准出去。”

许光达说：“好！同意你的意见！”

“坚决完成任务，按时夺取罗局！”刘懋功斩钉截铁地说。

会后，各军按兵团部署向西开进！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就是第四军第十师到底是7月11日还是12日拂晓迁回到罗局镇的？

据《第六军战史》记载：

我二兵团为达隐蔽集结之目的，决定各军于七月十日十九时出发，向平凉[临平]地区集结。

(1) 四军经王乐镇、药王庄、大北沟线及以南取平行道路进至临平镇及其以西北新店、韩寨（寒寨）、回子等以北隐蔽集结，严密封锁警戒漆水河及武功来路。

(2) 六军经王乐镇以北杨善村、杨寒村（杨汉村）、新水堡线及其以北之平行道路进至临平东北地区之王村（王家村）、郭村、三星村、少元村（含）、龙背（不含）及其以北地区集结，四、六军分界线以北、临平至仪井大道（不含）以西属四军。

(3) 三军尾四军跟进，进至临平、东镇东南之沟背后（沟北）、新庄、董城、朱村、东城府、庄里窑王、上曲等地集结，向武功、杏林方向警戒，严密封锁消息。

兵团为争取十二日拂晓向敌突然袭击，决于十一日二十时继续前进，四军以迅速勇猛之动作向益店镇进攻前进，得手后留一个师控制益店镇、警戒岐山，以主力向洛阳（雒阳）、新集、罗局镇及以西眉县车站之敌进攻，截敌退路，得手后向祁家村、白家庄（白家村）地区之六十五军进攻。

六军经尹家堡、南凹里渡漆水河后，尾四军进至青化镇、益店镇，并以一个营位于宋村以北之马次庄、京家岭，向麟游大路警戒，主力准备向小营里、新庄、何家咀、宁家、午井镇及以西之高王寺（高望寺）、豆村之敌进击，得手后即配合四军向祁家村、窑七白（尧上村、白家村）之六十五军进攻。

三军沿临平镇、法门寺大道集结青化镇及其附近地区，准备夺取扶风，尔后向其以西午井镇之敌进攻。

由上可以看出，第二兵团的确是7月10日从礼泉地区出发的，但第一步先到漆水河以东的临平地区集结也是没有问题的，11日又从临平地区出发，12日拂晓迁回到罗局镇的。

既然彭德怀等7月7日下达的作战命令要求第二兵团于12日拂晓迁回到罗局镇，野司在作战期间给军委的电报以及战后上报中央军委的作战总结也是这样写的，依据档案资料写成的《第六军战史》也是这样说的，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也是这样记述的，那么第四军第十师于12日拂晓迁回到罗局镇就是确凿无误的。然而，最早说第四军是7月11日迁回到罗局镇的，是西北军区、第一野战军司令部1953年编写的《西北解放战争史料汇编》。然而，任何史书都是人写的。人非圣贤，孰能无错？当资料与资料发生矛盾与冲突时，我们只能本着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态度，在各种资料的比较与鉴别中找出正确的答案。

从《第六军战史》我们还可以看出，许光达、王世泰为了使部队能够顺利完成穿插迂回任务，采取了夜行晓宿的办法，并且把140——150华里的路程分成两段走，这样既节省了指战员的体力（迂回到位后马上就要投入作战），又把走漏消息的可能降到最低，是完成穿插迂回任务最稳妥的办法。足见许光达、王世泰心思之缜密！

7月10日下午5时，第四军各师先后到临平地区集结。11日下

午 4 时，第四军第十二师夺取临平，掩护主力开进。

刘懋功与政委左爱率第十师前卫第三十团从临平以北的黑山村、殷家村一线出发时，太阳刚刚落山，经天度镇绕经法门寺时，天已经黑了。法门寺驻有敌军 1 个连，为了不打草惊蛇，刘懋功派 1 个班监视警戒，命令部队从寺南绕过。在夜暗和青纱帐的掩护下，部队一路向西，12 日 3 时到达青化镇，4 时到达益店镇。

“站住！口令！”益店镇的敌哨兵喊道。

“野！”

“马！”

“这么急干吗？有情况吗？”

“你娘的拿多少钱，管老子的事！”

第三十团副团长李友益与敌哨兵对答。

骗过敌人之后，刘懋功率第三十团由益店镇向南急进，渡过齐胸深的漳河，来到北营村。这里住着敌第三十八军 1 个营。

为迅速南下，刘懋功决定奇袭北营村！

“哪部分的？”敌哨兵厉声问道。

“自己人，一一九军的！”第八连连长李国斌按照刘懋功事先嘱咐的回答。

战士们一边嘻嘻哈哈，一边把手榴弹的拉环套在手指头上。

接近到 20 米左右时，敌哨兵一看不对，就慌忙开枪。战士们一齐把手榴弹甩出去，向敌发起突袭。

敌人向东南方向逃跑。第三十团绕过罗局镇，继续追击逃敌。

第四军第十一师击溃王治岐的第一九一师第七五二团第三营，也来到益店镇，诈称敌军番号，骗开益店镇城门，俘保安团 30 余人及王治岐部 90 余人。随后，该师也向南开进。

第四军第十二师于 12 日 6 时到达益店镇以西构筑工事，向岐山

方向警戒。

到12日7时，第十师第二十八团第一营攻占罗局镇，第三营攻占了眉县车站。

与此同时，第六、第三军也向西疾进！

根据兵团命令，第六军的任务是，穿插到扶风至益店镇以北地区后，即由北向南，第一步肃清午井镇至新集地区之敌，第二步向高王寺（高望寺）、小寨、豆村之敌进攻，最后配合第四军向祁家村、窑上（尧上村）、白家（白家村）之敌进攻，将敌消灭在渭河以北。

第六军由礼泉县赵村、堡里地区出发，11日6时进至临平镇东北三星村、杨家寨一带，11日18时继续西进，12日7时先头第十六师来到岐山县强家庄以北的小强村一带。

这时，第六军军长罗元发获悉扶风至益店镇以北地区已无敌，遂命令除第四十八团留1个营警戒麟游方向外，第十六师主力、第十七师向南进攻。

黄新廷率第三军解决了法门寺守军后，于12日凌晨攻占了青化镇，接着指挥部队向南攻击。

第四军成功迂回到罗局镇和眉县火车站，切断了渭河以北敌人3个军的后路，奠定了扶眉战役胜利的基础。

彭张赵于13日向中央军委汇报12日战况时说：“二兵团以迅速行动，于四时攻占益店镇，七时攻占罗局及眉县车站，断敌退路”。

第二兵团之所以能够穿插迂回成功，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充分利用了西府地区的地形特点。北塬地区辽阔，胡宗南、王治岐的3个军又集中于渭河北岸，麟游山把胡马天然分割，这就有利于第二兵团夜行晓宿，从胡马接合部的缝隙楔入。

二是战前各军都派出侦察队深入敌后侦察。除第三、第六军对麟游以北进行侦察外，第十师由第三十团副团长李友益和师二科副科长

鲁增率侦察队于10日深入青化镇附近地区，俘敌多名，查明了法门寺、益店镇、青化镇一带的情况，对引导部队迅速开进起了很大作用。

正如第二兵团党委在1949年7月20日的《战役检讨》中所指出的：“各军侦察部队都完成了侦察任务，战前都钻到敌占区，查明了敌情，使部队顺利前进，没有乱碰，却在战时俘虏很多敌人。”

三是敌人的麻痹状态为第二兵团完成穿插迂回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

据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回忆：

驻小寨归军部直接指挥的第一七七师第五三口团团团长王立志忽然用电话报告：“扶风益店镇东北狗咬得很凶，还发现有手电闪光，恐怕那里有部队活动，第一营二连连长强居信是本地人，他已带该连去搜索。”不久，王又来电话说：“听见益店镇方向有机步枪声，是不是第一一九军的部队和强连发生了误会。”我即问王治岐，他说那里没有他们的部队，大约是同抢粮的地方部队发生了误会。

到了11日（应为12日——引者注）晨4点多钟，王立志又报告说，益店镇附近的确有不少的共军，我们的搜索部队，被迫退回到后河北岸停止监视。到了这时，我转问王治岐，他还不相信这是事实，总认为是地方部队同我们的搜索部队发生了误会。我同时给十八兵团司令李振报告，而李的看法，同王治岐出入不大。拂晓前，第五三〇团第一营全部投入战斗，接着全团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因为发现迫击炮声，我才肯定不是同地方部队发生误会，也不是少数共军或武工队的袭扰。

奇怪的是不但第三十八军北边的第一一九军，南边的第六十五军不相信，就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共军究竟由哪里来？来了多少？为什么各方面都没有情况，偏偏在第三十八军的后方发生了这么大的战斗！我和李振几次研究的结果，都认为是第一次扶风解放时，共军留

下的武工队，潜伏在国民党军的后方，黑夜袭扰，企图扰乱我们的阵势，吓跑我们。他并叫我沉住气，一下就过去了。

这时，裴昌会的电话虽然接通了，可是他不相信有整师整团的共军，神不知鬼不觉的跑到第三十八军军部的后边，专打第三十八军军部。他叫我把归军部指挥的第五十五师第一六五团开上去，夺回罗局镇，捉几个俘虏问明情况后，再处理决定，不要为少数的扰乱而影响全盘计划。

以上说明，从国民党军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第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到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再到宝鸡指挥所主任裴昌会，在第四军已经切断其退路的情况下，这些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是何等的麻木！

他们总以为有 5 个军夹渭河作集团配置，解放军无论如何也是吃不掉的！这种自欺欺人的麻痹心理，为解放军第四军顺利切断其退路，在客观上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他们明白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渭河以北的 3 个军已经陷入解放军的重重包围！

正如张宗逊所说：“胡宗南万万没有想到，他给解放军设置的‘口袋阵’反而成了装自己几个军的口袋。”

接下来，就看这些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如何作困兽犹斗！

一兵团狭路猛进

曾几何时，解放军第一、第二军被胡宗南的第九十、第六十五、第三十六军堵在户县的家门口打，现在决战的时刻终于到了，指战员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鉴于渭河以南正面狭窄，南北宽才 20 公里，且多稻莲藕塘，陡峭塬壁，无法实施大的迂回行动，王震在第一兵团作战室反复考虑如何狭路猛进！

胡宗南部在渭河以南摆成一字长蛇阵，第九十军军部率第五十三师位于金渠镇，其第六十一师位于槐芽镇、第二十四师位于青化镇；第三十六军主力位于眉县，但其第一二三师前出周至西南、靠近秦岭的辛口子（辛口村）。

敌人的长蛇阵及渭河以南的地形，决定了第一兵团不可能将敌第九十、第三十六军一举歼灭。但无论如何，必须首先驱逐辛口子的敌第一二三师，以解除西进的侧后威胁。

为此，王震命令第二军于7月10日16时开始，由白马河两岸向周至以南的沙河推进，同时以第六师进攻辛口子之敌。

11日4时，第六师开始向黑山寺、辛口子、金盆之敌发起进攻，敌第一二三师稍触即溃，向秦岭逃跑。

第二军主力在西进过程中，俘虏了敌第九十军的数名侦察员，从他们口中获悉敌第六十一师已由槐芽镇东进至青化镇以南，与敌第二十四师并肩防守青化镇一线。

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王震正发愁歼灭青化镇的第二十四师，弄不好会引起西面敌人逃跑，现在第六十一师自己送上门来，正好将其一举歼灭，无论如何不能再让其逃跑！

根据出现的新情况，王震决定：第二军在左，第一军在右，由东向西，于12日拂晓分别对敌第六十一、第二十四师展开围歼；如敌西逃，第一军沿公路及其以北，第二军沿公路以南向金渠镇、五丈原、高店镇追击前进。

根据兵团的命令，第一、第二军开始研究如何抓住并歼灭敌人。

敌军在青化镇一带的阵地，北临渭河，南靠秦岭，南北宽约10余公里。在第六十一师防守的南西沟村和北西沟村的东面，有一条深沟横贯南北，过沟的道路全被破坏，易守难攻。

第二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等研究决定：第四师附军山炮团于 11 日 24 时前进至猪头寨、朱峪地区，首先从敌第六十一师之第一八一团和第一八二团的接合部突破，攻取南西沟村，继向北西沟村及纵深发展；第五师取道南刘村、中军岭楔入敌人纵深，与第一军第二师衔接，切断当面敌人的退路；第六师绕经万家山、上下闹庄进至槐芽镇以南并以一部控制法流咀阵地，阻击可能来援之敌，并截击西逃之敌。

第一军军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等同时决定：第二师沿长益公路以北、渭河南岸迂回至沙河东岸，控制横曲镇（横渠镇）以东的公路，截断青化镇与横渠镇之敌的联系，并与公路以南的第二军第五师取得联系，完成对青化镇守军的合围；第一师沿长益公路西进，首先歼灭哑柏镇之敌，得手后继续向青化镇之敌进击；第三师为预备队，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12 日零时过后，担任战斗迂回任务的第二军第五师前进至西沟塬，师长徐国贤发现敌人隔沟据守，遂以第十三团两个连和 1 个工兵排为突击队，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以爆破手段炸毁西陡坡，开辟前进的道路。经过 1 个小时的紧张作业和战斗，第五师终于登上沟顶，守军逃窜。

在周围均有敌人的情况下，徐国贤指挥第五师不顾一切地向预定目标前进。12 日 2 时许，前卫第十三团进至夹沟桥、辘轳坝附近，歼敌 1 个重炮连和 1 个山炮连，继又攻歼金家寨守军，与公路以北的第一军第二师取得了联系，完成了对青化镇之敌的包围。

12 日 3 时许，第四师师长兼政委杨秀山指挥部队攻占了沟内大庙，开辟了攀登道路，完成了一切进攻准备。当得知第五师切断守军道路，杨秀山遂于 4 时许命令部队对南西沟村守军发起攻击，第十二团进攻村南、第十团进攻村东大庙。守军逃跑，被第十二团和第十团

一部追歼于谭家寨及其附近。

南西沟得手后，杨秀山遂命令炮兵支援第十团主力向北西沟攻击。这时，北西沟、苍峪敌人弃防逃跑，青化镇也被第一军攻克，敌整个防御体系土崩瓦解。杨秀山率第四师遂由进攻转为追击，协同第一军主力追歼溃敌，第五师与第一军第二师就地截击，敌人除少数漏网外，全部被歼。

在追歼敌人的过程中，第五师第十四团第三营营长何辉章光荣牺牲。

第六师因在柴家岭受敌阻击，未能迅速进至槐芽镇以南侧击敌人，仅在柴家岭歼敌一部。

12日14时许，第二军开始向西追击。

在第二军激战的同时，第一军也由东向西猛攻。

王尚荣虽已提升为第一军副军长，仍然率第二师执行战斗迂回任务。当侦知常家堡及曹村（曹家村）、贾道（夹道）有敌第二十四师第一九八团驻守，王尚荣遂命令部队在下阳寨地区展开，并以第六团迂回敌后。

第六团通过15公里的稻田和沼泽地，于12日1时以特务连包围清河梁之敌1个连，主力由清河梁、油房堡之间，绕过贾道、曹村，从西北方向协同第五团自东南围歼上述各点之敌。

当第六团自渭河南岸迂回到马厂（马场）时，得知李家庄无敌，遂同时展开3个营，在三面临敌、一面背水的情况下，抢占马石村、包府沟及梁家堡、余家堡一线。3时，第三营进占沙河东岸，并与第五师第十三团在金家寨会合，切断了守军的退路；第一营第二连不待命令，勇猛攻击，利用拂晓前天色朦胧，敌彷徨无主、观察不便，攻入包府沟，乘敌兵力火力未及展开，采取白刃格斗，直插敌群，以少胜多，击溃敌两个营，俘敌300余人。余敌逃向公路，被第三营俘获。

第五团先攻陈家堡，继攻常家堡。7时，第五团第一营以炮火摧毁常家堡东门后突入寨内，全歼守军第一九八团1个营。9时，第五团又攻占了油房堡。

12日10时许，位于沙河东岸的第六团第三营第九连，发现横渠镇之敌1个营前来增援。该连除以一部在正面防御外，以1个排从侧翼将敌拦腰截断，迫敌60余人缴械，其余敌人向西溃逃。

第一师在开进途中侦知，驻东杨花及哑柏镇的敌第一九六团于黄昏前西撤青化镇，师长傅传作遂急令第二团直扑青化镇，以第一团攻占余家坡，抓住敌人，不使西逃。

12日3时许，第一团进占二郎庙，接着从北、东、西三面包围余家坡（任家城一带）。余家坡处于南塬之上，比高近百米，守军企图以据高临下的有利地形负隅顽抗。经炮火猛烈轰击后，第一团于7时30分攻占余家坡，全歼守军1个营。

第一师第二团进至青化镇外围后，除以第一营自东向西、第三营自南向北向青化镇攻击外，因陈家堡守军向该团第三营侧射，遂以第二营协同右翼第五团同时向陈家堡守军进攻。在解放军多路分割围攻下，下青化守军迅速动摇，向西南逃跑。第二团猛烈突击，当即占领上青化，并在解家沟追歼敌人400余人。

傅传作遂令第三团加入战斗，向横渠镇守军进攻，并令第一、第二团跟进。

到11时左右，敌全线溃乱，第三十六军和第九十军残部纷纷向秦岭和宝鸡撤退。第一、第二军向西追歼逃敌。这时，第四团第二营已攻占横渠镇。

贺炳炎遂命令第一师第三团指挥第二师第四团及第六团第三营，向眉县追击前进，并以第三师直插眉县以西，断敌退路。

到这时，第二师就剩下位于曹村和贾道的敌第二十四师第一九八

团的残部还没有消灭。王尚荣遂命令第五团和第六团主力攻歼该敌。

12日14时，第五团第三营和第六团第一营攻占曹村，歼敌100余人。17时30分，第二师用山炮、化学炮进行了半小时的火力准备，16时第五、第六团突入贾道，俘敌正副团长以下400余人。

从18时开始，第五、第六团也转入向西追击。

渭河以南虽然不能进行战役迂回，但第一、第二军分别以第二、第五师实施战斗迂回，同样歼灭了敌第九十军主力6000余人！

这就是贺炳炎和郭鹏等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十八兵团三路向西

第十八兵团担负着由东向西进攻，配合第二兵团歼灭渭河以北胡宗南和王治岐3个军的任务。

根据野司指示，周士第按照歼灭武功、扶风地区的敌人第一线兵力4个师来部署作战：以第七军为南路，沿陇海铁路南侧西进，然后插至俞家店，切断敌第六十五军第一八七师的退路，并以一部监视杨陵镇的敌第一一九军第一七七师；以第六十二军附炮兵团为中路，沿咸宝公路西进，首先包围驻武功的敌第一一九军第二四四师，得手后协同第七军歼灭敌第一七七师和第一八七师；以第六十军并指挥第六十一军第一八三师，从咸宝公路以北插入敌之左翼，以两个师歼灭武功西北菊花村、新村一带的敌第一一九军第二四七师，以另两个师直插杏林镇、绛帐镇，切断敌第二四四、第一八七、第一七七师退路；得手后，再集中全力西进，配合第二兵团歼灭罗局镇至午井镇之间的敌第三十八、第六十五军军部及另两个师。

从第十八兵团的部署来看，试图以两翼穿插迂回、中间攻击的战法，用9个师歼敌4个师，可谓决心很大，胃口也不小！

从7月11日晚开始，敌东线的4个师以哨兵继续在原地警戒作掩护开始西撤。

11日黄昏，担任断敌退路任务的第六十军及第一八三师从梁家镇一带出发，分两路纵队（第一七九、第一八三师为右纵队，第一八〇、第一七八师为左纵队）穿越两岸陡峭的漆水河，但因部队未能严格遵守时间及原定路线，又临时变更了渡河点，致使部队互相拥挤，延误了时间。

12日5时，右纵队先头部队第一七九师进至杏林镇以西二十里铺时，俘敌数名，获悉敌已由漳河以南西逃。师长黄定基当即命令第五三五团抢占青龙寨（青龙村），发现敌第一一九军第一七七师正经贾村（夹道村）向西南撤退。黄定基遂一面向军部报告情况，一面命令第五三五团在青龙寨一带展开攻击，后续部队赶到也立即投入战斗，最终歼灭了敌第一七七师师直和第五三一团全部。敌第一七七师师长刘孟廉率1个警卫连向东南逃窜，解放军第五三五团随即向南追击，又歼其一部，其余敌人南渡渭河，被第一军俘获。

7时，第五三六团在杨家沟、曹家之间，歼敌步骑兵各1个营，进至牛仓里又歼敌一部。同时，第五三七团前卫在大马村遇敌约3个团，因主力未到，只歼敌一部。第一八三师在杏林镇以西三家堡、杨家堡一带歼敌400余人。

左纵队第一八〇师第五三八团一部，于12日拂晓进至杏林镇，发现敌向西逃跑，遂展开追击，截歼敌400余人。第一七八师因菊花村敌已逃，奉命向第一七九师靠拢。

12日8时，第一七九师进至绛帐车站。

担任正面攻击的第六十二军，于11日20时从长宁镇一带出发，分三路向驻武功的敌第二四四师进攻，由于敌人先期西撤，仅歼其后尾3个连。12日5时，全军集合于武功城西地区，继续西进。8时，第一八五师到达杏林镇，与第一八〇师会合。

南路第七军于11日晚由桑家镇向西开进。第十九师首先驱逐了

史家堡敌骑兵前哨，接着为消灭武功县赵村一带的敌人骑兵，展开了逐村搜索，至12日拂晓才抵达漆水河岸张兔村，遭敌人阻击未能渡河。第二十师也进行了逐村搜索。12日8时，第七军发现敌第一八七师已西渡漆水河撤退，遂开始向西追击！

决胜的关键——罗局阻击战

第四军在罗局镇一线阻敌西逃，敌人则欲拼命突出重围。这样，罗局镇阻击战，就成为国共双方的关键一战！

第十师师长刘懋功于12日晨刚到罗局镇，就发现追击敌人的第三十团撤了回来。原来在塬的下面，敌人正以数路纵队的密集队形向西急进。

这股敌人就是第六十五军的前卫第四七九团。第六十五军是广东部队，由第十八兵团司令官李振兼任军长，是渭河以北敌人3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

为阻敌西逃，刘懋功一面通知带领第二梯队的副师长葛海洲尽快布置炮兵阵地，支援部队作战，一面命令第二十九、第三十团直插敌群。这时，第二十八团第二营也从右翼冲了下去。

几支部队互相配合，拦头截腰，打乱了敌人的队形。经1小时激战，毙敌第四七九团团团长于健英，俘敌1600余人。

这时，敌人发现后路被切断，遂调整部署，从12日9时开始，在炮火的掩护下，先以第六十五军，继以第三十八军，轮番冲锋，拼命突围。第四军以第十、第十一师坚守罗局一线，广大指战员在“堵住敌人就是胜利”口号的鼓舞下，坚决阻击，寸步不让！

第三十团坚守的刘家塬至李家塬一线阵地，受到的压力最大。经连续激战，第一、第三营的干部伤亡很大。第一营第三连顶住了敌人1个团的多次进攻。该连第一班连续打退敌人4次反扑，全班8人牺牲7人，只剩下班长张富清1人，还两次负伤仍不下火线！第三营第

七连 100 多人打得只剩下 20 多人。第三营第九连战士王洪安是机枪手，在他的枪口前横卧着 50 多具敌人的尸体。

中午 12 时左右，第三十团第三营的刘家塬阵地形势危急。敌第三十八军不惜血本，企图从这里打开突破口。第三营营长马成林、教导员侯有福率全营与敌人拼起了刺刀，连续打退敌人 7 次进攻。结果营长马成林、副营长王天才牺牲，教导员侯有福负重伤，副教导员景德山临危挑起了重担，率领全营仅剩的 40 多人与敌人浴血奋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第三营阵地被突破。

敌人打到了距第十师临时指挥所 200 米的地方！

第十师政委左爱拔出手枪高喊：“共产党员们，不能让一个敌人突围呀！”带领指挥所干部和警卫员冲到第一线去堵击敌人。

这时，第四军副军长孙超群正在第十师指挥所，他立即抽调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第三十一团两个营和第三十二团 1 个营，统归第十师指挥，对敌进行反击。第三十一团团团长王学礼主动请求分配任务。刘懋功让他侧翼出击，由北向南打。王学礼遂率其两个营从一片玉米地包抄过去，把敌人拦腰切断，压下塬去，夺回了阵地，化解了危险。

与此同时，敌第六十五军 1 个团企图从眉县火车站突围。第十师第二十九团第二营，在营长折仲恺的带领下，勇猛顽强，连续打退敌人 8 次冲锋，教导员周凤翔、副营长程金声牺牲。第二营第五连据守一片坟地，打退敌人 6 次进攻。子弹、手榴弹全部打光，就用刺刀与敌格斗，最后只剩下 5 人，在连长纪长富带领下阵地仍屹立不动。

战后，第三十团第三营和第二十九团第二营被第四军政治部分别授予“罗局镇战斗英雄营”称号，第三十团被第二兵团授予“罗局英雄团”称号。他们出色的战绩，在这个光荣称号面前是当之无愧的！在第十师激战的同时，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郭炳坤，以部分兵力监视小寨之敌第三十八军第五三〇团，率领主力进至刘家塬以北地区，南

与第十师衔接，打击突围之敌。12日11时许，第三十一团第二营和第三十二团第一、第三营包围小寨之敌。第三十二团第三营教导员马宜生率第一连刚进入阵地，便与向西突围的敌人1个团接上火。马宜生与第一连连长迅速组织火力，封锁800米的开阔地，7小时打退敌人的8次反扑。

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向刘家塬之敌连续冲击，尽管部队伤亡较大，但终于打退了突围之敌，使师主力向前推进了500米。

坚守罗局镇东南强家沟阻击的是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第二营。在与敌人的反复搏杀中，副团长高增岳双腿被敌人的重机枪子弹打穿，站不起来，胸部也受了重伤，浑身流血。战士们要抬他下去，他坚决不肯，手拿“加拿大”手枪，坐在地上高喊：“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直到头部中弹，光荣牺牲。在高增岳精神的鼓舞下，全营战士们高呼：“为高副团长报仇，狠狠地打！”直到全团攻占强家沟。

第四军第十、第十一师的英雄事迹不胜枚举，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诠释了什么叫“誓与阵地共存亡”！

第二兵团党委在1949年7月20日的《战役检讨》中写道：

部队在行动中和作战中作到了隐蔽、迅速、勇猛、坚决、机智的动作，一夜经一百四十至一百六十里行军，能及时到达，甚至到了就打。六军到多少就打多少。四军插得快，攻得猛，抗得凶，尤以三十团、二十九团打退敌人九次猛攻，人人参战。二十九团四连弹药打完了，拼刺刀，没有刺刀的，拿洋镐和抬炮弹的木杠与敌人拼。

战斗中干部党员，不断鼓励群众，边打边评，干部伤亡了，党员自动代理。

各军都坚决勇猛，负伤隐瞒不报，负伤不下火线，带病作战之例甚多。部队从十一日晚开始，至十二日黄昏战斗结束，没有休息，没

有吃喝，因而在行军期间，战斗中，各军热倒数百人，死十六人，没有叫苦。三十团一个战士说：“这时有口水喝才美哩！”受到战士的批评。

由于作战地域是敌占区，正值暑天，没有饭吃，没有水喝，还要连续作战，战士之苦可以想见！为给部队送水，第十师管理科副科长、老红军阎合献出了生命。即使搞到些水，也根本不够喝。到这时，口渴之苦比牺牲更难忍受！无奈之下，战士们只能嚼玉米秆甚至以尿解渴。

罗局镇村口有一个池塘，直径有十七八米，是村民平时洗衣服的臭水坑，也被战士们喝光了。当时，刘懋功由于连日征战，眼睛红肿，流血不止。孙超群副军长见指战员们舀池塘的水喝，急得大喊：“你们别喝完了，得给你们刘师长留一碗呀！”后来，孙副军长找来大夫用生理盐水冲洗，才把刘懋功的眼睛流血止住。

当第四军浴血奋战时，许光达及时调动第六、第三军从青化镇以西、以东地区向南向西攻击，使敌军更加混乱。

黄新廷以第三军第九师攻占扶风，击溃第一九一师，迫使王治岐率第一一九军向西南逃跑，并且冲乱了李振第六十五军的阵脚，造成敌人自相践踏，全线动摇。

在青化镇南武村战斗中，第三军第七师第二十一团副团长刘永成光荣牺牲。

12日13时，第六军第十六师第四十六团向成马沟（陈马沟）进攻，至14时半歼敌第三十八军第五十五师第一六五团两个营，另1个营逃跑。军长罗元发命令该师追歼逃敌。第四十六团经龙蹄沟、老君巷向陈马塬进攻，于16时攻克该地，接着以主力向南追击。在追击过程中，第四十六团第五连第五班班长王耀群带8名战士，深入敌群，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在孤军深入的情况下，王耀群把负伤的3

名战士安置好后，把剩余的战士分为两个组，从下午一直战斗到黄昏，封锁了敌军 1 个营的逃路，最后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迫使敌人乖乖投降。

第六军第十七师于 12 日 10 时开始向南进攻。第五十团攻占四户村后，遂以第一、第二营向敌人的腹地地带高望寺进攻。该村有敌军 1 个营。第五十团遂以第六连占领高望寺西北土寨子，以第一营断敌退路，以第二营则由东北向西南进攻。守军试图突围，第六连连续打退了其 5 次反扑。战至 15 时，第五十团攻克高望寺，俘敌 300 余人。

第五十团第六连的英勇阻击，不仅确保了高望寺战斗的胜利，还掩护主力直插敌后，切断了料妻（料地）、豆村与午井镇之敌的联系，打乱了这一线敌人的防御体系。

第十七师攻占高望寺后，继续向南攻占相国寺。敌人占据有利地形，以密集炮火阻击第四十九团前进。程悦长师长在第四十九团团长聂凤彦和政委张世功的陪同下，到前沿观察后决定，采取正面佯攻、背后突击的办法消灭敌人。背后攻击的任务交给了第四连。连长张米贵带领部队向侧翼运动，遭敌火力拦阻，两个排长牺牲，全连剩下 22 人，张米贵也负伤了。但他忍着伤痛，命令 1 个班作掩护，亲自带 1 个突击班突然从侧面攻入敌阵，连续打退守军 8 次反冲锋，配合主力全歼敌人 1 个营。

占领南窑后，第四十九团跟踪敌人到料妻（料地）。守军 1 个团部率 1 个营利用村庄起伏地和高苗地进行顽抗。第四十九团即协同第四十七团进攻料地之敌。第四十八团因出击道路受阻，便主动加入到进攻料地守军的战斗行列。在解放军在猛烈打击下，守军被歼一部，其余乘隙逃跑。

在围歼战中，第二兵团各部队之间团结协作，共同歼敌。正如第二兵团党委在 7 月 20 日的《战役检讨》写道：

军与军、师与师、团与团之间，火炮自动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六军部队到时，观察四军方面打的很激烈，未接到命令，就自动前进，攻击敌人，减轻四军负担。三军观察四、六军方面战斗，迅速出击，配合四、六军。不同建制而能听指挥，并告知友邻指挥，直到歼敌后，配合非常合拍。战斗中没有发现争俘虏、争胜利品的现象。真正做到了以战斗行动达到团结的要求。

到 12 日下午 3 时，彭德怀根据各兵团报告的情况，下令对敌发起总攻！

于是，第四军由西向东，第六、第三军由北向南，第十八兵团由东向西，逐步将敌人压缩到罗局镇到午集镇东西宽约 10 公里、罗局镇到渭河北岸不到 3 公里的狭小地区内。

第六军趁国民党军全线溃败，以乱制乱，乱中取胜。第五十团第四连趁混乱伪装成敌人插入敌阵，俘敌 200 多人。第四十七团 1 个班迂回敌后，俘虏敌人 1 个班，缴机枪 1 挺。

在围歼敌人的最后战斗中，第三军第二十七团第三营“号目”（司号班班长）李珍，虽然年仅 17 岁，在营长、副营长相继牺牲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指挥部队，重新调整兵力，向敌人发起冲锋，战后荣获“特等功臣”光荣称号。

第四军由西向东出击。由于部队牺牲过大，建制被打乱，但战士们自觉服从兄弟部队干部的指挥。第三十团除大批伤员外，所剩的兵力已经不多，但团长武志升仍然派出 140 人参加追歼作战。其中，第三十团副连长丁兴发，在本连已无战斗力的情况下，带领第二十八团 1 个排追歼逃敌，俘虏敌军 180 余人。第二十九团第七连解放战士雷洪宾孤胆深入敌群，俘敌 27 人。第二十八团第五连第九班班长柴三，带领全班冲锋在前，坚守眉县火车站渭惠桥头 1 个多小时，与增援部队一起俘敌 284 人，战后被授予“特等功臣”称号。

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第二连连长白生辉，于12日下午率全连66人进攻敌第三十八军的腹心阵地强家沟。勇士们以手榴弹和机枪开道，前仆后继，待攻占了强家沟时，只剩下了19人。敌人垂死挣扎，拼命反扑。白生辉和指导员不时鼓励每个战士：“共产党员，人民战士，要打得狠，守得牢，我们一定坚持到最后胜利！”在此后的40分钟内，19名勇士打退敌人5次反扑，毙伤敌100余人，与友邻第3连一起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在解放军东、西、北三面围攻下，敌军像雪崩似地垮了下来，军找不到师，师找不到团，团找不到营，完全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敌人狼奔豕突，被赶下北塬，进入渭河北岸河滩地，争相泅渡渭河逃命。

时任敌第十八兵团司令兼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回忆：

最后决定南渡渭河。乃用电话征询李振西的意见，他很赞成。我遂派第六十五军特务营先行渡河，占领眉县城，掩护主力南渡。渡河前我们的企图就已经暴露，解放军由罗局方向集中炮火轰击渡河点并封锁渡口。河水深而流速急，部队在解放军猛烈炮火轰击下进行强渡，军队序列异常混乱，伤亡很大，不会游泳的官兵被水淹没的颇不少，重武器、各种弹药及辎重损失殆尽。

14日中午到达距宝鸡约30里的一个小镇（地名已忘记）时，胡宗南的宝鸡指挥所主任裴昌会已知道我们突围出来，派了一辆吉普车来接我们。到了指挥所，大家见面，会心苦笑，齐叹：完了！完了！

时任敌第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回忆：

12日下午，解放军的攻势愈来愈猛烈，包围圈愈来愈缩小，第十八兵团部、第三十八军军部被压迫得挤在一块。“尸横遍野”一语，在这时已不是形容词，而是真实的情况了。

我们借包谷地的隐蔽跑到祁家坡时，解放军已先到那里，封锁了下塬的道路。适第五三〇团团团长王立志带一营赶到，他们在掩护我们

下塬的时候，也全营被歼灭，团长王立志被击毙。此时，各军的溃兵都被赶到河滩。当时还以为第九十军在渭河以南抵抗，纷纷向渭河南岸逃跑，我也拉上第五十五师师长黄维汉，挤在溃兵伙里游到南岸时，谁知第九十军已被击溃，解放军已封锁了渭河。我同黄维汉又在几个小兵的扶持下，潜流到下游，由空隙中偷上岸，伏在稻田里，直爬到午夜，才溜出来，沿河滩向宝鸡跑。12日（应为13日——引者注）晚到宝鸡时，才知道李振腿部也负伤，王治岐同我们一样在水里藏了半夜，才跑出来。

总计参加扶眉战役的国民党军一个兵团部、四个军、十个师两个骑兵团，共约十万多人，结果只剩下2万多人。

时任敌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回忆：

我随溃军到渭河岸，正想渡河，看到李家沟败退下来的第六十五军部队，游到中流时，被南岸解放军炮火打翻到河里的尸体，纵横皆是。我即未敢渡河，顺岸西行，于晚10时到蔡家坡附近，误入解放军步哨线，当刺刀纷纷向我们刺来时，我拨开刺刀，纵身跳入渭河，不意陷入泥淖中一时无法移动。

我在泥淖中整整困了三四小时，听到哨兵暂时休战之后，才泅水渡河，到12时始赶上第二四四师残部到了宝鸡。

全军近两万人（一九一师不算），所余尚不到8000人，武器弹药器材等损失，更无法计算。

在解放军三面围攻之下，渭河以北的敌军纷纷缴械投降。

泅渡到渭河南岸的敌人，正遇上向西追击的解放军第一军追击部队。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记载：

“3、4两团于追击中，先头进至槐芽以东，歼俘由渭河北岸泅水南逃之敌500余名后，继向眉县急进，黄昏前我两团进抵眉县东西地区，正遇敌由渭河北岸泅水南逃千名，两团于中甘沟、下泔沟地区当即发

起多路突击，敌已溃不成军，完全失去斗志，我当于河滩俘敌 38 军、65 军、119 军等部 8000 余人。”

7 月 12 日，彭德怀在建国公园野司作战室的神情既严肃又兴奋，他从早到晚一直在紧张地指挥作战。

当副参谋长王政柱等向他报告四军在罗局镇的战斗情况时，他不是说“好，好！”就是讲“这一下子敌人可就跑不了啦。”当王政柱等向他报告泅渡到渭河南岸的 8000 多敌军被一兵团俘获时，他高兴地用拳头在桌子上狠狠一击，笑着说：“很好，这才叫全胜！”

战至 12 日 20 时左右，渭河以北的作战才告结束。

就在各兵团乘胜追击之时，13 日下午谍报人员传来消息，称宁青两马准备向扶风方向增援。

彭德怀、张宗逊遂命令部队停止追击，并于 7 月 13 日酉时致电中央军委：“十二日晨至黄昏战斗，将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一一九军、九十军等，基本消灭，所向无踪。十三日晨向宝鸡、凤翔追击前进。十三日未时谍息，青宁两马向扶风方向进击，故令二兵团停止于岐山、横水、彪角镇地区。十八兵团停止于蔡家坡、罗局地区。一兵团停止眉县以西，但该兵团可能进至宝鸡南。十九兵团仍在乾、礼。明十四日各兵团拟就地休息一天，看清情况再动。如青宁两马继续南进，拟十六日围歼麟、永地区。”

宁青两马试图救援胡宗南、王治岐部，确实不假。据马全良、卢忠良、马光武、马宝琳回忆：“7 月中旬，解放军发动攻势，大军西进，将扶眉一带胡宗南部包围，青、宁两兵团奉命抽调部队赴援。宁夏兵团第一二八军和青海兵团第八十二军出发到崔木镇时，第一一九军王治岐部已被歼灭，救援未成。”

14 日，中央军委复电彭张赵：“（一）十三日两电悉，歼胡四个军甚慰。（二）马匪既有反扑援胡消息，你们主力停止追击准备打

马是对的。”

结果，两马未敢来援，第一、第二兵团分别派出部队继续向西追击。

第四军第十二师于14日3时解放宝鸡。

第三军一部于14日解放凤翔。

第六军于14日向凤翔开进，军直到达杜甫村、第十六师到达南纸房、第十七师到达南古城地区。

第二军的追击作战，由于马家军出援问题一波三折。

13日拂晓，第一兵团参谋长张希钦当面告诉第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渭河以北敌军已被歼灭，正以一部向宝鸡前进，兵团命令第二军于当日继续沿长益公路急进140华里，赶至宝鸡以南，控制渭河大桥，切断宝鸡之敌的退路。

第二军遂奉命西进，沿途在五丈原、唐家原、斜坡击溃敌掩护部队，20时左右进至马峪河左右地区。这时，接到野司命令，要求就地停止，准备迎战马家军。第二军主力遂奉命集结，仅派第十一、第十三团继续西进，并于当日24时进至马营镇地区，歼灭敌掩护部队。14日7时，第十一团沿秦岭北麓、第十四团沿西宝公路继续西进。

14日16时，由于马家军未敢出援，第二军主力又奉命向宝鸡以南追击。

当第二军主力进至宝鸡以南清水河东岸时，发现李家堡、益门镇均有敌人。第四师奉命西渡清水河，以一部攻占李家堡及其以西高地，接着又以一部在东河里一带歼灭宝鸡保安团和第二一四师各一部。第五师先头第十三团则直逼益门镇，向敌第二一四师两个团展开攻击，当即占领刘家湾，击退敌人1个营的3次反扑，继向益门镇东山攻击，但遭到敌人侧射，两次进攻不成。师主力到达后，决心围歼该敌。但正当部队运动时，敌弃防逃窜，第十四团及第十三团两个营追至观音

堂歼敌一部。

14日晚，第二军攻占益门镇，扶眉战役胜利结束！

彭德怀历来是赏罚严明的。

战役结束时，彭德怀对王政柱等人讲：“四军这次打得好，这次立了功。一年以前在西府战役中，四纵队（即后来的四军）打得不好。那时部队组建不久，缺乏大兵团的作战经验。这回有很大的进步，这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嘛。部队虽伤亡大一些，但打出来一个好的战斗作风。”在以后的会议上，彭德怀还多次表扬第四军。第四军从此打了翻身仗！

彭德怀对第四军就如同对第三十八军一样。第三十八军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战役中打得不好，遭到彭德怀的严厉批评。结果在第二次战役中穿插三所里和龙源里，切断敌军退路，对战役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彭德怀在电报上写下了“三十八军万岁”。这就是第三十八军“万岁军”的由来。让部队知耻而后勇，是彭德怀的治军方法之一。

扶眉战役从1949年7月10日开始至14日结束，历时5天。歼敌正规军1个兵团部、3个军部、8个师、1个师部、3个团，即第十八兵团部，第三十八军军部、第六十五军军部、第一一九军军部，第二四四、第五五五、第一六〇、第一七七、第一八七、第一九一、第二四四、第二四七师，第十二师师部及1个团，第六十一师2个团，毙伤敌13000人，俘虏31060人，共歼敌44060人。

缴获骡马2400余匹，各种炮290余门，机枪1160挺，长短枪9000余支，汽车8辆，电台26部。

解放军共伤亡、失踪4600余人，与敌损失之比为1:10。

时值盛夏，部队中暑者约千人，热死者达百人，但各部队表现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第二兵团是连夜行军一百三四十华

里进入战斗的。第四军第十二师两昼夜前进了 240 华里，还战斗了 14 个小时，仍然坚持追击，才“使宝鸡、虢镇、蔡家坡地区之工厂、火车完好无损，敌人已在机器、火车上安好了炸药，连发火都没有来得及”。

西北大决战以解放军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

西北大决战以宁青两马向后撤退、胡宗南残部逃往大散关而降下了帷幕！

历史将会永远记住第一野战军同胡马联军在八百里秦川的这次英勇较量！

十九军陕南血战牛蹄岭

扶眉决战结束了，我们还得把画面从关中主战场切换到陕南辅助战场。

1949 年 7 月 10 日，又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

这一天，第一野战军主力发起扶眉战役。

这一天，第十九军发起了陕南战役第二阶段作战。

然而，这两个作战同时展开，并不是预先约定，而是因为天公不作美，接连下了两天的雨，使第十九军的作战不得不从 7 月 8 日推迟到了 7 月 10 日。

这次，第十九军的第一仗，就是攻克鄂陕边界的要隘关垭子。

在战斗发起前，敌第六十九军第一四四师接替了敌第二十七军第一三五师在关垭子一线的阵地，并以第四三一团位于关垭子及其以南的三宝寨；以第四三二团位于关垭子以北的擂鼓台、老阳山一线；以第四三〇团和第一三五师之第四〇三团为预备队。守军还配备了化学迫击炮营和竹溪保安团全部。

鉴于守军刚刚换防，地形不熟，刘金轩、汪锋决定：以第五十五师并配属第五十七师的第一七一团共 4 个团从正面发起进攻；第五十

七师（欠第一七一团）从南侧迂回到敌后之石牛河口，防止敌人增援，并阻止关垵子之敌西逃；以谭友夫司令员率安康军分区部队由白河经裴家河向神河街方向佯动，剿灭土匪，配合主力作战。

10日1时，战斗打响。第五十五师经半夜激战，至11日拂晓全部攻占守军阵地，随即向西发起追击，至当日19时在石牛河口将残敌全部歼灭。第五十七师在三里寨歼灭前来增援的敌第一五八师第四七二团1个营大部，因受河流阻隔，10日才到达石牛河口。

关垵子战斗，共俘敌第一四四师师长符树蓬以下1732人，毙伤敌917人，10日第二次解放了平利县城。

关垵子之敌被击溃后，敌第二十七军、第九十八军退守女娲山阵地，第九十六军退守安康附近。

女娲山是守军的原有阵地，几经加修，较为坚固。守军以女娲山为基点，组成南北宽约50公里的第三道防线。

刘金轩等分析认为，正面攻击女娲山不易奏效，必须采取迂回包围战术，将敌分割成数段，并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灭之。

7月15日，第五十五师沿女娲山阵地的南侧，经洛河街、狮子坝、大贵坪向老县迂回前进；第五十七师主力拿下岳妇山后沿女娲山阵地的北侧向老县迂回前进，并以第一七一团从平利向女娲山正面进攻。20日，女娲山守军发现腹背受敌，即全线溃逃，其所谓的第三道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

女娲山阵地被突破后，敌第六十九、第二十七、第三军一部撤到安康外围阵地——牛蹄岭，第九十八军残部撤至岚皋。

刘金轩、汪锋决心乘胜进攻牛蹄岭，并以第五十五师担任主攻，以第五十七师为预备队，以便攻占牛蹄岭后直取安康。

22日，第五十五师击退敌狗脊山警戒部队后进至县河口。23日拂晓，第五十七师第一七〇团攻占了牛蹄岭东北之大帽山，保证了第

五十五师的侧翼安全。当日黄昏，第五十五师之第一六三、第一六四团向小牛蹄岭和大牛蹄岭发动攻击，与敌3个军各一部展开激战。24日上午，敌人飞机也赶来参战。战况之惨烈，前所未有。当年的中共陕南区党委机关报《陕南日报》以“坚决夺取小牛蹄岭”为题，对牛蹄岭战斗报导如下：

小牛蹄岭是敌人在安康外围防线的主要阵地，工事坚强，敌人以一个团主力盘踞在山顶上。7月23号夜我军某部以一连从正面攻击，七、八连由侧面迂回担任主攻，各路健儿们以神速勇猛的动作，抢占了小牛蹄岭阵地。

深夜1时半左右，敌人反扑开始了。敌二十七军三十一师以其主力九一团，集中全师炮火向我轰击，并以密集队形向我冲锋。当敌人进到我一连前沿阵地时，被我一排子手榴弹打了回去。敌人一阵猛烈的炮火后，第二批又反扑上来，一连王自全同志首先端起刺刀与敌人肉搏，刺死了6个敌兵。七、八连的同志们，又一阵手榴弹扔下去，数十个敌人又滚了回去。当东方发白时，战斗格外激烈，我军以少敌众，一部阵地陷入敌手。然而我全体同志都知道牛蹄岭阵地必须坚守，连九连一个排的预备队也加入了战斗，该连副连长同安国同志，率队在前面端着轻机枪，边打边冲，打死了不少敌人，负伤不下火线的七连排长姬小勇同志，八连杨平、曾华、赵宝贵、赵强等同志，奋不顾身地顽强战斗，经过一场恶战之后，夺回了原来阵地。但敌人经过一阵疯狂的炮轰之后，再次发动反扑了，我英勇的健儿又是一排子手榴弹扔出去，敌人倒下去了。第一批敌人被打下去，第二批又扑上来，我英勇战士们就只用手榴弹一批一批地把敌人打了下去。这样的争夺约50分钟后，我战士们的子弹袋、炸弹袋差不多都空了，于是小牛蹄岭暂时落入敌人之手。

“不惜一切夺回小牛蹄岭”，这是所有战士们的决心。我二〇一

部正副政教干事李玉厚、朱俊杰亲自率领二、三连发动冲锋，在密集的炮火下打进敌人阵地。战士们坚决勇猛，三连班长段堂海小组和敌人拼刺刀，手上负了伤，还在继续肉搏。顽抗的敌人遭到我们痛击以后，就不顾一切地逃命，不到 20 分钟小牛蹄岭又被我二次占领。但敌人又组织反扑，副政教干事朱俊杰同志喊道：“准备刺刀拼！”80 个勇士仍然用手榴弹、刺刀，反击着数倍于我的敌人。敌人打来的数百发炮弹使阵地变成了火海，二、三连又被迫暂时退出了阵地。

24 日上午 12 点钟，二、三连重新组成二梯队。火热的太阳下，同志们面孔粘满了炮火轰起的尘土，汗水流成一条条的花纹，大家空着肚子，干涩僵硬的舌头，喝不到一口水。虽然敌炮猛烈，敌机盘旋，敌人又增调新三军一部加入集团冲锋，但这都没有使勇士们有丝毫的动摇，而且与敌数次激烈的争夺后，得到的结论是：“敌人真稀松”，最后终于被我们击溃。在我乘胜追击时，敌人更表现得狼狈不堪。整整战斗了一天，反复争夺八次，击退敌人最后反扑，胜利地完成了打下安康外围主阵地的光荣任务。

事实上，第五十五师经 10 余次反复争夺，歼敌 2000 余人，自己也付出了重大伤亡。直至第五十七师第一六九、第一七一团加入战斗，才将敌人赶下山，最终攻占了牛蹄岭。

25 日拂晓，第十九军进至安康新城，守军陷入一片恐慌。胡宗南一面从四川调第一一〇军前来增援，一面留下第二十七军第三十一师 1 个团守安康老城，主力连夜撤至汉水以西。

鉴于攻城需要准备，部队又伤亡较大，26 日刘金轩、汪锋遂命令各师撤离安康，转至平利、触河地区休整。

牛蹄岭战斗共俘敌 552 人，毙伤敌 2023 人，第十九军伤亡 1200 余人。

陕南战役第二阶段作战，从 1949 年 7 月 10 日开始到 26 日结束，

历时 17 天。第十九军俘敌 2128 人，毙伤敌 2810 人，共歼敌 4938 人。

整个陕南战役，第十九军共歼敌 1 万余人，牵制了胡宗南的第二十七、第九十八、第六十九、第三、第一一〇军共 5 个军 4.5 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第一野战军的关中决战，不愧为彭德怀所借重的偏师！

西北大决战的胜利，当然也有第十九军的一份功劳！

第五章

西北大决战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双桨划出来的，用大车拉出来的

陈毅曾讲，国民党军进攻山东时，解放区的各县长都成了“民工头子”。

这就是说，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山东解放区的各县长亲自带领自己县的民工参加支前的各项工作。

由于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心任务，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成为解放区各项工作的根本方针。由此也就形成了人民军队在前方打仗，解放区各级党政机关带领人民群众在后方支援的宏大的人民战争场面，从而保证了革命战争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其实，不光山东解放区，西北等其他解放区也是一样。

西北党政军齐动员， 全力保障西北大决战的胜利

为了迎接第十八、第十九兵团等部由晋入陕，进而取得与胡马决战的胜利，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军参战，从而掀起了西北人民群众的支前热潮。

1949年4月30日，张宗逊、赵寿山致电中央军委、西北局、西北军区和彭德怀：

下次战役准备工作简报如下：

（一）前曾报告按河西现有部队人数自三月二十日到六月底共需粮食十四万一千石，已布置十二万石，尚差二万一千石，西北[局]意见待新粮下来后再筹拨，以目前情况再向敌区筹购四万石供华北兵

团六月入陕用是可能的。

（二）下次战役预计伤员一万五千名，各军医院可收容五六千名，野卫四个医院可收容六千名，拟再由河东抽调能收容三千名的医院过来，血衣一万五千件，血被一万五千床，均已准备好，但医院器械方面则缺各种注射器具，输血用具一百具，手术器械五十套，能否设法补齐。

（三）由禹门通向西南汽车路三条：一条由石堡经白水通蒲城（由齐家河渡河，现有渡汽车船一只），一条由韩城经澄县永丰镇渡洛河到蒲城（准备汽车船两只、渡人船三只），一条由韩城经大荔到故市（距大荔二里渡河，有汽车船一只，另经船舍渡河须搭浮桥，可通行驮骡，不能通汽车）。三路均派员协同大荔分区进行勘查修用，拟于上下山坡及易存水地逐渐铺碎石、砖块，以备雨天亦能通车。三条路以韩澄蒲线为主要干线，其余两条为补。禹门渡口原有汽车船一只，另已修起三只，拟再修两只渡人船，告军区着手准备，应于辰胥前由河保放六十五只到禹门口。

（四）西野原有机车三辆（因无机油以麻油代替已将两部车烧坏）。军委已拨西野四十三辆（内美造道机二十辆，日造同和二十辆，小吉普三辆）现尚未到。据知同和车机件不好，不宜山地长途载重用。因西北交通工具困难，希多拨一部分好车并能早来，以解决运输困难，并希配拨足够的零件（虽军委后勤已拨西北各种汽车零件一部，但实感不足，我们意见，每车须配足全部两套自动零件，特别汽缸上涨圈最费缺，能发三套更好）。汽油、机油因西北地处山地，机油最费，否则对机件损坏大，故希按汽油总数百分之二十配发机油。

由上可以看出，西北党政军民为即将开始的西北大决战进行了粮食、道路、船只、血衣、血被等各种准备。但也同时可以看出，第一野战军后勤保障的现代化程度还很低，缺少汽车等现代化交通运输工

具，后勤保障主要还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大车等作为运输工具。据《第一野战军后勤运输部 1949 年工作总结》称：

蒲富战役（指 1949 年春季战役——引者注）到咸阳抗击战，弹药物资转动主要动员民畜力来担任，自己当时仅有一个辎重营（在刘家洼出发时，该营改为团），牲口不足三百头，汽车不上四辆的运输力量。西安解放后增加火车运输，但由于敌人跑时对桥梁及轨道之破坏，虽说抢修的快，但也动员了不少畜力参加了抢运工作。自己参加这一阶段运输工作的计有辎重一团和辎重二团（由联勤拨出），共大车百辆，驮骡不上六百头，汽车到兰州后才百十辆，并雇用过商车，但基本上依靠了自己的运输力。

西北人民就是在第一野战军十分落后的后勤保障条件下进行支前的！

随着 20 万大军由晋入陕日期的临近，以习仲勋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布成立由刘景范全权负责的支前委员会，并于 1949 年 5 月 5 日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告一野前委，大荔、黄龙、三原、彬县地委：

为迎接大军西渡，我们决定由景范分工全权负责筹划所有支前工作，并在其下设委员会，由陈希云（后勤）、白如冰（财厅）、王子宜（民厅）、高登榜（交通）、朱早观（军区）、刘卓甫（贸易）组成，以便联系。由王子宜带去一百干部到大荔地区，负责与野司联络指挥和帮助前线各地党政支前动员工作，大荔、渭华、三原、彬县、宝鸡分区，以全力支前与群众动员工作为中心任务。渭华、宝鸡分区干部已配就，日内即出发，以便与我军一同前进工作，具体计划行情况，随后续报。

之后，西北局还向各地发出关于支前工作的具体指示。据《群众日报》称：

中共中央西北局顷特指示各地党委积极发动群众，迎接和支援人民解放军向西北各省大进军。指示飭令有关各区，必须全力做好各项战勤工作，并把它当作当前的首要任务。指示上说：有关各地应即动员和组织群众，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时，热烈欢迎慰劳；特别是对于远道前来的人民解放军，必须十分热情，十分关切，西北人民应该热烈地欢迎长途跋涉向西北各省奋勇前进的英雄们，应该更加亲切的接待他们。除了在适当地点举行欢迎大会外，应发动群众夹道相迎，茶水招待，到宿营地问寒问暖，帮助缝洗衣服，并组织各种小型的军民联欢，互相勉励。对于他们的粮秣、油盐、菜蔬、柴炭的运输、交通、住房的布置，必须及早筹划妥当。指示并指令全边区所有地区，应即依照所分配的军鞋、担架、牲口大车等动员工作，必须按时完成，同时并须抽派得力干部随军协助，各地各级一切党政负责人，应及时、经常和部队指挥机关取得联络，向他们报告当地情况并征求意见，和协助他们解决困难。指示指出：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各地党委必须首先在干部与群众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为了迅速解放西北，早获胜利，必须勇敢地排除一切困难，再努一把力。反对干部中任何畏难苟安思想，激发广大群众积极支援革命战争、迎接胜利的最大热情，慷慨捐输，踊跃担负各种勤务。指示最后指出：支前工作还应和目前春耕与即将到来的夏收工作，恰当地配合起来，最主要的是对劳动力和畜力的有计划的组织和支配。必须大力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以解决到时劳动力不足的困难。

根据西北局的指示，西北解放区各地均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副书记或县长为主任的支前委员会，全力做好支前工作。

也正是在西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第一野战军才取得了西北大决战的胜利！

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

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双桨划出来的，那么以扶眉战役为标志的西北大决战的胜利，则是人民群众用双桨划出来的、用大车拉出来的！

晋陕人民迎送 20 万大军由晋入陕

为保证 20 万大军顺利地由晋入陕，隶属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的中共晋南工委和行署派出一位姓张的同志，到太原与罗瑞卿、周士第、胡耀邦、陈漫远和第七军军长彭绍辉等请示支前事宜后，于 1949 年 5 月 15 日致电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和晋南行政公署主任武新宇等：

将工委和行署所提意见向太原线罗周胡陈首长及彭军长报告，兹将决定择报如下：

（一）七军，三、八两师于五月二十三日由驻地出发，二十六七日到洪赵，军直及十九、二十两师于二十五日出发，二十八日到洪赵，经新绛、禹门口过河。随该军担架二百七十付，二十五日集中洪洞交军政治部，该军在汾城、古城、襄陵、临汾一线休息。

（二）十八兵团于二十八日由驻地出发，于月底全部出动完毕，先头部队六月三日可到临汾、洪赵，[行军]四日休息一天。现决定该兵团三个军、炮师及直属队分三路（一个军由安义过河到新绛再过河，一个军及直属队沿同蒲线，一个军走大阳郑庄线），全部走晋南区，不走太岳区属县了，请即准备粮草，到闻喜以南、运城北休息一天。随该兵团担架一千三百六十二付，于十二日前分别集中安邑、解县、平陆、芮城交兵团后勤部。决定风陵渡、茅津渡各过五万人及一部分牲口，如潼关敌人逃走时，可能大部或全部走风陵渡过，不走沙窝渡过了。

（三）十九兵团于六月六日由驻地出发，十日可到洪赵一线，禹门口过河。据陈部长讲：邵阳之榆冰村（河东吴王渡附近）有一渡口，每日可渡四次。兵团首长意见，应该派专人调查，如能过四次时可过

一部步兵，如果每日夜只能渡过一次时，就全由禹门渡过。随该兵团之一千二百六十二付担架于十二日集中河津、稷山，交后勤部。

（四）所有到西北部队之弹药及其他资材，由灵石到赵城，由华北负责，到赵城后由晋南分别送禹门口与风陵渡、茅津渡（过河后如何运输未确定）。运到赵城之弹药，首长们意见，多调车辆，争取赶大车下去时运到运城和禹门，以免军队过时拥挤。为此各单位分别在赵城成立联合转运站，统一分配运输力及划定路线等。

（五）行军宿营路线，我带回去，详情待回去面报。

为保障第十八兵团南渡西进，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兼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也赶到太原，与徐向前等协调民力运输。5月4日，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陈漫远致电中央军委和彭德怀等：

陕州、灵宝地区，现有船只不多，建议由华北、中原自下游调集若干船只，并有若干大船，能装载十五公分之榴弹炮（一万斤）。

据井泉来谈：晋南民工仅能支援十九兵团由韩城西进。建议十八兵团过黄河后之民工，由河南省委解决。我们同意此意见，估计需在河南动员三万民工。

这就是说，第十八兵团的由晋入陕，除山西外，还要动员3万左右的河南人民群众参加支前。

经过动员，“晋南地区，仅在五、六月间，华北大军过境时，即供应粮食十八万三千多市石，草四百九十万斤，油肉菜等八十余万斤，柴炭八百六十余万斤。此外动员民夫十六万多人，合六十余万个工，牲口十六万多头，合五十八万多个工。”

经过1个月左右的休整，第七军和第一军第三师以及第三军第八师率先出动，随后是第十八和第十九兵团，先后踏上西进的征程，沿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群众日报》以“临汾市民献光荣花送礼品夹道欢送西进大军”为题，对欢迎盛况进行了报导：

临汾市民数日前当我整齐威武的西进大军路过该地时，全城各大街，就已经搭好欢迎彩楼，大街两面墙上新刷的大幅欢迎标语与漫画，反映着临市军民的欢迎盛意。当先头部队唱着“三大纪律”歌行经城区时，各机关学校工厂的工作人员学生工人及市民便纷纷打着欢迎旗帜，奏着音乐涌上街头、城关，向沿路大军欢呼致敬。在北大街妇女插进行进中的部队同志行列中，将一朵朵光荣花挂在解放军同志的胸前。劳动妇女任香桂抱着一大束花匆匆寻找着带有奖章的战士面前，热忱的说：“带上它吧，好叫人人人都知道你们的光荣！”不少立了功的大炮上也被挂上了一朵光荣花。在东大街，许多市民端着茶水纸烟，热情请求着行进中的同志喝几口；一个商人焦急地说：“同志们，喝上我一口水，也就表示我对同志们敬爱的心情呀！”好多妇女同志拿出自己缝制的慰问袋、碗套、袜底硬塞在战士们的饭袋中。当部队走出东关及西城门时，一排排整齐的欢送行列中，此起彼落地呼喊致敬与希望的口号，伴之以各种拥军的音乐唱声。先头某师同志们特向临汾市民们写信，感谢欢送之盛意，并表示过黄河后当坚决执行命令，干净彻底全部地消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全部解放大西北。

为保证部队顺利向西北开进，第十八兵团部根据不少战士是晋南人的情况，开展了“新大禹运动”。其主要内容是：要发扬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战士之间开展思想互助和体力互助，圆满完成进军西北的任务。为了配合这一运动的开展，部队事先通知沿途战士的家属在部队经过的地点进行欢送。这样，“新大禹运动”与晋南人民的迎来送往相结合，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慰问人民子弟兵活动！

《群众日报》以“华北大军西进途中晋南人民亲切慰问”为题，对这一活动进行了报导：

向西北进军的华北大军某部，于上月底在太原近郊举行誓师出发后，沿途受到军民热烈欢迎。各部经过政治整训及诉苦教育，士气高

昂，许多英雄模范纷纷订出向大西北进军的立功计划。某团一连曾在攻取太原登城战斗中荣获“城头堡垒”奖旗，特等功臣六班长林西桓向全团功臣模范发起挑战，保证大进军中作好全班团结互助，遵守群众纪律，争取红旗。该班二等功臣张兴顺，行经他家门口，他母亲赶着欢送部队，母子见了面非常兴奋。张兴顺在诉苦出征计划上，曾向全班表示，我班许多南方同志，帮助大家了解自己的家乡，咱们晋中人也应该坚决打过黄河去解放西北西南穷苦弟兄。他为了实现自己出征计划不愿请假回家去，副指导员陪送他回家去看望母亲后，立即又跟上大军前进了。晋南沿途人民像亲人似的欢送华北人民的子弟兵，沿同蒲线，十里一个茶站，三十里一个粮站，翻身农民组织了慰问组，担水组，切菜组，洗衣组，欢迎西进大军。

永虞昭义一带翻身妇女，连夜帮助战士洗衣服，某团卫生队房东，一夜没睡给弟兄们烤干了全部军衣。该团后卫部队因下雨失掉联络，山庄小屋出来一位老太太给部队领路，一直引上大道。一些掉队的病号，各地群众照顾特别殷勤，老太太，小学生，把煮熟的鸡蛋，装在病号的饭包里，某团一个解放军的战士，穿的草鞋，把脚打了泡，一位妇联会员马上给另换了一双。这位战士说，乡亲们对解放军太好了，我一定要赶上部队，要掉了队赶不上打胡马匪，太对不起华北的老百姓。

山西人民就是这样迎送解放军的！20万大军所得到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支援，更有精神上的鼓励！这对完成进军任务是至关重要的！

1959年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一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写道：“晋南党、政领导与广大人民对进军部队的热烈支援、鼓舞与关怀，则不能不是进军所以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部队进军之际，正处于农忙（麦收）季节，但晋南人民，仍然组织了大批民工、牲口、车辆，全力进行支援。同时，对部队必经道路、桥梁预

先进行了修补；所需的粮、草、柴、菜以及油盐等物资，亦备放于沿途主要村镇、临路村庄，遍设茶水站，休息亭。村边、路口都插起路标，注明里程和各个村名，能住多少部队。村内各家门口，也写着：腾房几间，可住若干人。各个村镇，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并张灯结彩，遍帖标语，犹如过节。部队临近村庄时，群众就远出村外，打锣敲鼓欢迎；部队住下后，又自动给烧开水，搞铺位，协助做饭和缝洗衣服甚至刚结过婚的新房、新被也让给部队用；部队走时，则群送出村，并呼口号进行鼓励。晋南党、政领导与广大人民对部队这种热情洋溢、无微不至的、情同骨肉的爱戴与关怀，给部队以极大鼓舞，并大大激发了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为人民服务的光荣感与决心。”

南下大军过了临汾来到侯马一带，即开始分路行进：第十八兵团继续沿同蒲铁路继续南进，直趋风陵渡；第三、第八师和第十九兵团则改道向西，直趋禹门口。

禹门口和风陵渡，自古就是黄河天险的重要渡口。从禹门口和风陵渡分别西渡和南渡黄河，才能进入陕西。这样，能否从禹门口和风陵渡安全顺利地渡过黄河，就成为大军西进的一个重要节点！

据《西北军区后勤部关于1949年支援各个战役的后勤工作总结报告》称：太原战役后，“我们与政府协商关于船只的调集及公路修筑，在河西方面，并责令运输部派得力干部亲赴各段公路上督修。同时在禹门组织一个河防司令部，统一指挥军队渡河事宜，指令后勤禹门保管处兼负其责。这一时期（五月至六月）在晋南关于船只的调集及公路整修，根据晋南的总结，船只方面为新造黄河上渡汽车的大船十五只，汾河渡口船十七只，补修黄河渡口船二十八只，并且抽调晋西北公船八十只及沿河渡船，总共一百余只。整修公路方面，为汽车路九百六十华里（即赵城至风陵渡，侯马至禹门渡，夏县水头镇至茅津等三段），大车路六段计一千华里，新补与新建公路桥梁四十座，

架设汾河浮桥五座，可供大军通行，新绛三林镇浮桥并可通行汽车。由于解决了船渡与交通问题，大大的便利了华北大军西渡，使他们能在西安解放后迅速进入新区参加战争，击退了西安敌人的反扑，并长驱直进，有助扶眉战役的胜利。”

山西、陕西以及河南三省当地的船工和水手，在地方党和政府的动员下，不分昼夜，积极投入运送大军过黄河的任务，对大军由晋入陕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日报》称：

在支前热潮中，黄河天险禹门渡的水工们，已完成支援西进大军任务。该渡口约十余丈宽，两岸悬崖峭壁，河水急流直下，东西横渡的船只，在狂风中与恶浪斗争，有时船舵搬差一分，船桨有一下无力，均会遭到沉覆的危险，然而禹门渡机智的水工们在解放战争中创造了多次的功绩，他们载运过打运城的解放军，打刘戡的炮弹和大量的军粮，现在又运载着华北的英雄过河来要解放整个大西北，他们非常兴奋，日夜不停的苦干，在东岸的码头上各船水工们抢着让解放军上自己的船，当一船一船的战士英雄们平安登上西岸时，工人们感到光荣，轻松地笑了，并兴奋地喊着：“英雄上岸了，反动派要丧命了。”接着，“啊！哟！”声起，船又离岸东驶，迎渡第二批第三批队伍了，X号船过来，XX号船过去，无数船只穿梭在汹涌的浪涛上，当一批批队伍登上西岸时，战士们向水工们表示谢意并保证说：“我们要坚决的打胜仗来答谢你们。”运过来的炮弹箱上，水工们用粉笔写了许多“打到新区去！”“打到汉中去！”等有力的口号。

不言而喻，在风陵渡也是人民群众用双桨把第十八兵团主力送到黄河南岸的。第六十军一七八师则是在茅津渡、太阳渡由当地水手从黄河北岸送到黄河南岸的。

从禹门口渡过黄河的部队，一路向西，直趋三原。

与山西人民一样，陕西人民群众同样踊跃支前，场面火爆。

沿途各县筹足了粮秣，在重点地区分设粮站；在部队行军经过的要道和集镇搭建彩门，沿途设有开水站，保证日夜不断的开水；动员了大量民工整修道路，加固桥梁，动员妇女为部队缝洗衣被、做军鞋；发动群众写慰问信，送慰问品。在部队宿营的村庄，提前打扫好房子，有的县全部换上新席。大荔县贫苦农民王崇实因自家房子破旧，特地在门上贴出“此房虽旧情谊深，欢迎亲人解放军”的字条，被人们传为佳话。许多地方组织秧歌队、锣鼓队，当解放军到来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秧歌队起舞，气氛十分热烈。

据1949年《陕甘宁边区支前工作概述》记载：“新区广大群众，为了自己的早日解放，在老区群众的影响下，其支前的情绪也是非常之高的。每一声号召，有成千辆大车出动运输军粮，成千副担架转运伤员；其对过境解放军的欢迎的热烈情绪，当地的老乡说：‘这是亘古未有的现象。’只以合阳一县为例，当华北大军经过该县九十里长的县境时，沿途群众设开水站81个，水缸690个，供给了785担开水，都是从往返十里以外的沟下担来烧开的，真正解决了部队行军中的喝水问题。”

对人民群众的踊跃支前，《第七军简史》写道：

在进军途中、沿途蒙受晋、陕广大人民和政府的热烈欢迎；敲锣打鼓、献花献旗、五花十色、开会演剧、高唱欢呼、开水站、宣传棚、扶老携幼，各地人民把人民解放军当成自己的子弟兵迎来送往，所有这一切象征着祖国人民和家乡父老欢送自己的子弟兵奔赴前线，鼓舞着每个指战员高兴地接受自己父老的嘱咐与希望，使我们全体指战员在炎天暑热的行军中，忘记了自己的疲劳，克服了各种顾虑。无数的指战员路过自己的村庄，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不把革命战争胜利到底不入家门。许多家庭父母、妻子、兄弟赶来叙谈握别，均能表示互相勉励和安慰。由于广大人民和政府的热爱和父老、兄弟、妻子的欢送，

使全体指战员体会到人民战士的光荣。沿途这种情况不仅鼓励了全体指战员的进军情绪，同时更加激动了每个指战员的杀敌勇气和坚定斗争的意志，终于达到欢欣的离开自己的家乡，胜利地完成进军到达大西北的光荣历史任务。

第十八兵团在风陵渡南渡黄河后要在潼关乘火车西进，该兵团的全部、第十九兵团的大部笨重装备及弹药，也由潼关用火车运输。这样，潼关就成了重要的转运枢纽。地方党政军机关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大军西进！

据《西北军区后勤部关于1949年支援各个战役的后勤工作总结报告》称：“西安解放直至扶眉战役与宝鸡解放，这一时期运输工作的重点为迎接十八、十九两兵团西渡，并立即准备保卫西安及准备扶眉战役。这时在禹门、风陵渡两地只弹药一项就一千万斤以上，另外在永丰镇尚有二百余万斤。这些弹药，由于战争的急迫，需要迅速转运，集中西安待命，尤其是水丰的弹药，当时是准备在西安作战用的，因此我们即命运输部派出得力干部亲赴永丰督导，并由大荔分区动员大车二千四百辆，星夜转运至渭南，然后转火车来西安。”

在潼关既转运弹药，又运送部队，能否有效组织群众对完成转送任务至关重要。1949年7月22日的《中共潼关县委支前总结报告》称：

自6月6日起至下旬是华北兵团渡河，每天过的完全是部队物资弹药，其次就是从西安来的4家人，每天有2000多人拥挤不能渡河，部队虽每天过1万多人，他们自带粮食，不吃潼关的粮食合[和]草料，也不拼房子，过来时在大树底下休息，吃[喝]开水后就乘火车去了西安。每天就是宣传股工作很忙。须得动员群众烧开（水）四五百担，这里共设3个开水站，牲口饮水站1处。共设水缸297口，共烧水5667担。

第二阶段军队的大部队快要过完，随后十八兵团、十九兵团、西北后勤部弹药物资继续渡河。下船后还有4里多路，每天要过数10万斤，就要动员民夫下船上车搬运弹药，动员小车给车站转送。但所有推车子的大部是穷人每天依苦力维持生活，无法动员。经过于司令员（指渭南军分区司令员于占彪——引者注）讨论后指示，代雇小车、大车，决定以北门外拉至车站小麦1斤半，推至城内陕西省银行附近，半数民夫发粮食，由支前委员会报销。在这个时期内继续有各部队后之机关部队及地方机关干部，如炮兵团医院渡河。每天平均要渡过四五千入，大部分都不带粮食，但是火车发生阻碍，又住三四天不能乘车，就要领粮、料、草、烧柴。

还是其它县动员了几千万斤柴才解决了问题。

在欢迎华北大军入陕的过程中，渭南地区所属渭南、华县、华阴、潼关、临潼、蓝田6个县，在支援第十八兵团西进的过程中，筹借军粮24万石，做军鞋30万双，动员大车1.1万余辆次，人力212.8万多人次，畜力58.8万多。

大荔地区所属的合阳、澄城、韩城、白水、大荔、朝邑、平民等8个县，1949年5—7月，共筹措军粮11.25万石，军草1100万斤，动员民工23.26万余人次，担架2613副，大车3.5万余辆次，牲畜8127头，修路1394里，修船15艘，修桥24座。

正是在山西、河南、陕西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20万大军才顺利地到达与胡马决战的前线！

陕中、扶眉和陕南战役车轮滚滚

陕中战役发起后，由于胡宗南部在撤退时炸毁铁路、公路桥梁，迅速恢复西安、咸阳等地的铁路、公路交通，对解放军追歼逃敌和挫败胡马联合反扑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也成为群众支前的一个重点。

修石渡公路桥是咸（阳）榆（林）公路咸阳到泾阳段的主要桥梁，

被撤退的国民党军炸毁。在泾阳县政府的领导下，当地船工、木匠群策群力，于5月26日修复了大桥。

如果说修复公路桥重要，那么迅速修复陇海铁路桥更重要。由于胡宗南部撤退时大肆破坏，致使西安原有的60辆机车剩下43辆，沔河、灞河、浐河、渭河、泾河、清河等铁路桥被炸毁。第十八兵团及大批火炮、弹药都需要铁路运输，迅速修复陇海铁路成为西安解放后支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西安军管会迅速组织铁路工程技术人员和大批工人，抢修铁路桥梁。

1949年6月6日《西安市军管会工作通报》称：“复工工程正积极进行中，5月29日，沔、灞、浐、渭、泾、清等桥开始动工，潼西段6月8日至12日可竣工，咸同段尚需半个月，或20天。最缺乏的是木料，枕木缺8000根，桥桩缺2000根，钢梁采取拆移办法，不足时用枕木墩架起，铁料也很困难，需要20余吨，又氧气需要15桶。总之所需器材正设法尽量收购。修桥工程费预算为人民币2800万元，修复机车厂房预算580余万元，两项共3500余万元之谱，物价上涨至当追加。职工情绪也很高，每人已发维持费2000元（两袋多面）。”

由于工程技术人员和铁路职工争分夺秒地工作，使潼关至西安段铁路于1949年6月7日提前通车。《群众日报》称：

陇海铁路潼关至咸阳线及咸铜支线，已于二十二日正式通车。按在临潼、长安之间的灞桥、浐桥，长安咸阳间的沔河桥、渭河桥等未修复前，潼关至普集镇间早于五月二十七日即已分段通车。灞桥、浐桥六日修复后，七日潼关长安间即正式通车。长安咸阳间二十一日下午六时通车。咸阳铜川间二十二日下午八时通车。

陇海铁路长安段员工，积极工作，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为了迅速把人民解放军运至前线，某日一整夜曾开出与开入兵车XX列，另

外并开出与开入水车、工程车等 XX 列（比平时多开车三分之一）。司机司炉过去都睡在家里，现在已自动搬到机厂住宿，准备随时开车。全路员工的口号是“宁叫车等军队，不叫军队等车。”

也正是铁路员工的大力支援下，第六十一军率先进入西安，接替第六军防务；第一八一师进驻咸阳，为此后能够“皮旅”咸阳战“青马”，彻底粉碎马继援“中间突破”的战略计划创造了条件。没有西安铁路员工的大力支前，解放西北的历史可能要重新改写！

胡马联合反扑开始后，位于户县地区的第一、第二军不仅在西面要打退胡宗南部 3 个军的进攻，南面还受到北出秦岭的敌第十七军等部的威胁，压力较大。为了确保白马河防线，屏障西安，第一、第二军构筑工事需要大量木料和门板。

户县人民全力以赴，不仅大力筹集构筑工事所需的木料，还帮助部队修筑工事。中共户县县委在《关于户县解放后 50 天工作报告》中写道：

这次支前活动，群众情绪很高，全县 1500 合磨子日夜旋转，送粮送草的人络绎不绝。城关区的群众修筑工事时硬不要军队同志换班。他们说：“你们多歇一歇，多打死几个敌人！”构筑工事的门板不够，不等部队到区署去借，群众都自动把门板送来了。像这样热烈的现象，在我县境内是少有的。因为粮草供给、担架运输的及时，部队的战斗力没受到影响，各连队反映很满意，因此军民关系是很密切的。这次借粮 4 万石全部完成，直接由军队管理支配。

据不完全统计，户县先后筹粮 5.8 万石，出担架 1197 副，大车 1583 辆，石磨 1500 合，修筑工事木料 6400 根，门板、芦席 680 页，铺草 9000 斤，民工 1970 人，军鞋 3.5 万双。

正由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才使胡马联合反扑成为泡影！

《西北军区后勤部关于 1949 年支援各个战役的后勤工作总结报

告》说：“进攻西安的敌人被击退后，我们立即布置扶眉战役。关于这一战役弹药的转运，经运输部与野勤共同商决，分为三路：一为周至（南线），是一兵团；一为礼泉（北线），十九兵团；一为铁路沿线（中线），是十八兵团和二兵团，另有一兵团的七军。除被服、装备、医药、票币外，弹药需每个兵团准备四个基数，每兵团基数七十万斤，共计为一千一百多万斤。除决定各兵团自带两基数外，余两个基数由军区后勤追送距前线总指挥部 120 华里交野勤。当时因火车未全通，就经过政府在渭南、咸阳分区动员大车 2400 辆，组成四个大队，由运输部派出干部亲自率领，全部于七月十三日起程，七月十六日至月底先后分别转运于指定地点之弹药共合五百九十五万斤，完成了支援前线计划。”

为解决部队的吃粮，“四安解放后，原在延安由党政军负责组成之支前委员会在政府刘副主席领导下，对于支前的粮秣及军运起着很大的作用。在支前委员会的指导下，粮秣工作较前更有计划，并制定征粮政策。从六月一日起至七月底止，为了配合支援前线作战，粮秣工作曾作三个阶段的布置：第一阶段为六月一日起至六月二十五日止（保卫西安战役期间），这时根据部队人马数需要约为粮食十八万市石，料六十六万市石，分别在渭南、三原、咸阳、西安等地布置借征一百万市石，结果由各地先后送到者共二十八万市石，基本上保证了部队的吃粮。第二阶段为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即部队出击经扶眉战役到宝鸡解放），这时布置在咸阳筹麦子十万市石，三原筹麦子四万市石，邠县筹麦子四万市石，西安每五天筹送白面三万袋。第三阶段为七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底（即平凉战役及向兰州进军这一期间），……。综合从六月二十六日起至七月底止，在西安供应粮食折合麦子九万二千六百三十八石，三原分区供应了粮食折合麦子三万二千零一十八石，咸阳分区供应了粮食折合麦子八万五千二百二十石。

根据支前委员会的统计，从五月十日起至八月十日止，仅关中地区四十二县（人口五百五十一万余）先后筹粮即达百三十余万市石，基本上保证了部队的吃粮。至于粮秣支前方面，除上述外，为保证部队前进中的粮秣供给，支前委员会并调集大批干部组成粮食处随军行动，并派粮食局长负责。给予这一临时的粮食机构，对各区粮秣有筹集调动之权。同时并派民政厅副厅长率领军区后勤派出之干部携带电台，随兵团沿西兰公路西进，负责检查督促粮秣弹药之筹划运输。这些措施，对部队作战的粮秣供应有了很大的作用。”

7月10日扶眉战役开始后，大车队、担架队随部队沿西兰公路、咸宝公路、长益公路和部队指定的路线前进，犹如一条条长龙，车轮滚滚，浩浩荡荡，牛吼马叫，蔚为壮观！

正是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第一野战军经过5天激战，终于取得了扶眉战役的胜利。

然而，胡宗南的飞机早不来晚不来，在扶眉战役结束的时候来了。在敌机的轰炸之下，不少牲口被炸死、大车被炸毁。

1949年7月20日彭德怀在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此次战役每兵团均动用当地牛车千辆，牲畜被热死者，被敌机打死者数目相当大，虽然从缴获牲畜中赔偿了一部分，群众损失仍不少。”当然，群众的损失由政府补偿。

在支前过程中，涌现出了大批英雄群体和模范个人，受到部队和地方的表彰。

陕中战役开始后，支前民工郝炳义挑着40多斤的担子与部队一起徒涉泾河，结果被激流冲到下游200多米的地方。他上岸后，部队已经走远。第二天，他挑起晒干的东西上路追赶，整整走了10天，才在绛帐火车站找到了部队。战士们与他紧紧地抱在一起，都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时年 32 岁的扶风县人赵栋学，在扶眉战役中任支前运输队副队长。他赶着自家的牛车给部队运送粮食和弹药，心爱的老黄牛在途中累死后，他义无反顾地推着独轮车坚持把弹药送到前线，返回途中又抢救了一名伤员，战后被授予“支前模范”称号。

为支援扶眉战役，西北大学医学院组织暑期战地服务队，参加了野战医院第 3 服务队随军工作。他们于 1949 年 7 月 10 日从西安出发，在普集镇、阎家堡一带，转送伤员 1500 名，预计 10 天的任务他们仅用 5 天就完成了。

在扶眉战役期间，甘泉担架队工作出色，荣获两面奖旗，《群众日报》以“支前模范胜利归来”为题对他们的事迹进行了报导：

甘泉县第三期参战担架队，荣获“支前模范”、“吃苦耐劳”两面奖旗，胜利归来。七月十八日，该县党、政、军、民各界举行欢迎庆功大会。该队在今年一月由队长郭凤祥、指导员康全胜率领全队六十三人开赴前线，深受战士及群众的欢迎。该队有如下几个优点：一、发扬了高度的阶级友爱，热爱伤员。很多队员把自己的单子、襖子给伤员铺盖。杨俊财、张树旺、高海彦把自己的钱自动拿出给伤员买鸡蛋吃，买茶喝。二、加强领导，贯彻了为伤员服务的精神。该队有个别队员情绪上曾有过波动，但经开会批评和个别谈话以及该县党、政领导同志亲自写信劝说后，也渐渐地平静下来。带队干部和该队九位退伍军人，亦经常给队员们讲时事和军事常识，使担架队员信心很高，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在人、畜上均没有损失。三、遵守群众纪律，帮助群众做活。该队抽出空闲时间共帮助群众收麦、锄草一百余工，修磨一个。平常帮助驻地居民担水、扫院子更是普遍现象；并向新区人民宣传我党政策和老区的情况。

该县参战担架队（前线的编制是一个中队）由于有以上优点，曾被某军政治部两次评为全大队的第一。杨俊财、高清海二人并立功入

了党，周福贵等十八人分别受到物质与口头奖励，全队共得到两面锦旗。同时队员们在军队中还学会民主讨论问题和唱歌子。

十八日欢迎庆功大会上，县书刘生源、县长惠光第，号召队员们将前线胜利的消息和大家服务的情况带到农村去广泛宣传，鼓励群众努力生产支前，并勉励参战队员回到农村，要成为农村一切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陕南战役期间，鄂西北和陕南人民群众克服山高路远的困难，动员支前民工 58 万多个工日，筹集军粮 344 万斤，食盐 6.1 万斤，香油 3.4 万斤。用大车等交通工具运到前线，支援第十九军作战，并涌现出了一批支前英模。《陕南日报》称：

我长春部某部（指第五十七师第一七〇团——引者注）在 6 月 7 日平利西马厂（场）沟塆的阻击战中，当地群众对解放军表现了高度的热爱与积极的支援。山下几家老乡，不顾战斗的激烈，不停地用自己的大米、绿豆熬成稀饭，于炎热的太阳下，冒着敌人的炮火，把稀饭和开水送到我山头阵地上。黄昏时战斗结束，敌人狼狈溃逃，部队急于行动，老乡们便自动转运伤员。一个姓谭的老乡第二天将我五团（指第一七〇团——引者注）一个伤员，一直送到离他家 30 多里地的某地。北沟的一个老乡将我六团（指第一七一团——引者注）一个伤员藏在他家一个石洞里，一天送 3 顿饭。后来我部队去找人，起初老乡还不承认，同志们再三给他解释，并把我们的臂章符号给他看后，他才承认说：“我怕你们是‘国军’知道了要杀他！”

要知道，当时的平利地区是第十九军撤出的地区，是国统区！

国统区的群众自发地给解放军送稀饭、藏伤员，帮助解放军而不帮助国民党军，说明他们心向共产党和解放军。这种人心向背，只能说明国民党气数已尽，国民党军焉有不败的道理！

陕南支前民工为第十九军运送粮食、弹药，救助、运送伤员，并

且表现了极大的积极性。《陕南日报》以“两郟及竹山支前民工转运伤员勇敢负责——牛蹄岭等战役涌现很多模范”为题，对他们的英雄事迹加以报导：

郟西第二批民工自7月6日随我军某部西进后，在各个战役中，都很积极负责，转运和照护伤员，完成任务，并在工作中涌现了不少的模范。如在安康外围小牛蹄岭战斗中，民工邢启成、孙道福、朱秀季、董学财等奋不顾身的冒着炮火，转运伤员，转送子弹，途中朱秀季受了伤，邢启成、孙道福二人怕影响大家的情绪，立即很坚决的号召大家说：“河北民工来帮助解放了我们，我们今天就不去帮助解放别人吗？”说着自己就一股劲跑上前去，鼓舞了其他民工也一齐跟了上去。在关垭子战斗中，民工锡章恒、郭海福为了把伤员及早转运出战场，两人抬一副担架（本来4人轮抬一副）。

夜晚战场上看不见人，有些民工们就爬在地上，听哪里有呻吟声，就到哪里去抬伤员。民工夏教义说：“不论在任何困难情况下，我们都要设法把伤员同志送下火线去。”在转运途中，对伤员的照护也很周到。天下雨了，民工陈先道把帽子让给伤员戴；姚玉奎把雨伞让给伤员打；杜兰圣没有帽子和雨伞，就把自己穿的衣服脱下来，给伤员盖上，并想办法找竹筒子，给伤员同志小使用；李有三把开水一口一口的喂给伤员喝。有两个伤员很感动，把自己仅有的一条毛巾拿出来送给民工，姚玉奎和其他几个民工异口同声回答：“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深感对不起你们啊！同志，不要着急，好好地休息吧！”

上面枯燥的数字和鲜活的事例，蕴含着以下十分深刻的道理：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赢得战争。

西北战场军事上的胜利，是和边区人民的有力支援分不开的。正如彭副总司令讲的：“没有边区这样的支援，要取得今天的胜利是不

可能的。”

尽管时过境迁，对山西、陕西、湖北及河南人民对西北大决战的各种支前数字，难以作出准确的统计，河南的支前数字一时没有找到，现在呈现出的陕西各地的支前数字也不完全，有的还包括了支援兰州战役的支前数字。但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加上鲜活的支前事例，足以使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是人民群众用双桨送解放军过风陵渡和禹门口的，是人民群众用大车把粮食和弹药等作战物资运送到前线的。所以，以扶眉战役为标志的西北大决战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双桨划出来的、用大车拉出来的！

第六章

扶眉战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扶眉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场上国共双方投入兵力最多、规模最大、歼敌最多、战果最辉煌的一次重要战役，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其重大意义，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西北大决战的高潮和收官之作

纵观战略追击阶段其他战场的作战，基本呈现了“秋风扫落叶”“风卷残云”的特点。第二野战军主力进军西南，从湘西经贵州迂回到川南，基本没有遇到国民党军大的抵抗，即使在成都战役中国国民党军共有7个兵团，除了李文的第五兵团稍事抵抗外，其他6个兵团纷纷起义投诚。第三、第四野战军除在金门、青树坪等地遇到了局部或小的抵抗外，进军也算基本顺利。

西北战场则不同，第一野战军一上来就遇到了胡马的疯狂反扑。为确保咸阳、西安，第一野战军被迫放弃西府的泾渭三角地带，撤至渭南泾北。即使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到达后，胡马仍然摆出了一副决战的姿态。这是西北战场不同于其他战场的显著特点。

西北战场的这一特点，是由胡马为避免唇亡齿寒而结成的生死联盟所决定的。

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还要作最后的垂死挣扎。胡宗南部屡遭西北野战军的歼灭性打击，因而还比较知趣，太原战役后即收缩防线，接着又向陕南撤退。宁青两马特别是青海马步芳部，没有遭受过西北野战军的歼灭性打击，因而不识时务，总认为自己能够决定一切，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况且，在行将覆灭之时，胡马都十分清楚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苟延残喘，进而用西

北屏障西南，才不会被第一野战军很快各自击破，因此才有了胡马联合反扑的历史闹剧。第一野战军要想迅速完成解放西北的任务，就必须以决战对决战，彻底粉碎胡马企图阻击解放军前进的妄想。

因此，西北大决战是胡马反扑造成的客观形势，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为了赢得西北大决战的胜利，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第一野战军打了一套组合拳：第一次出拳，是乘胡宗南部撤逃，发起追击作战，解放了西安以及虢镇以东的关中地区，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及第三十师等部，为西北大决战奠定相当的物质基础；接着是收拳，即在胡马联合反扑之下，第一野战军诱敌深入，张开两臂（第一、第二兵团分别撤至渭南泾北），袒露胸膛（用先到的第六十一军第一八一师等部进行咸阳阻击战），以极大的忍耐完成了阻敌和兵力集结，确保了咸阳和西安的安全，在此期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等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之间，就“钳马打胡”还是“钳胡打马”进行了反复磋商；最后是第二次出拳，在确立了“钳胡打马，先胡后马”作战方针的基础上，第一野战军以第十九兵团和骑兵第二师钳制两马，集中3个兵团歼灭了胡宗南、王治岐部主力4个军，迫使胡马纷纷撤逃，从而取得了与胡马决战的胜利。

与胡马决战的这套组合拳，从1949年5月11日开始至7月14日结束，历时65天。第一次出拳和收拳是陕中战役，第二次出拳是扶眉战役。所以，扶眉战役是西北大决战的高潮和收官之作，也是西北大决战的画龙点睛之笔。

不仅如此，与胡马决战，除了关中主战场之外，还包括陕南的辅助战场。所以，西北大决战共包括陕中、陕南和扶眉3个战役。

从歼敌人数上看，陕中战役歼敌40895人，陕南战役歼敌10190人，扶眉战役歼敌44060人，如果再加上第六十军第一七八师在河南

歼敌 895 人，共计 96030 人，即 9.6 万余人，近 10 万人。

这就是西北大决战的全部内涵。

曾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陈士榘指出：“胜利者在回首往事、总结经验时，往往容易贬低对方，掩饰自己的困难，把艰苦卓绝的斗争，说成了万事如意，一举成功。”“这样做给人的印象是，前人的胜利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微不足道’的。所以，前人如果忘掉了自己的困难，后人就容易忘掉前人的胜利。”

我们提出西北大决战的概念，并不是故弄玄虚，而是要尊重历史，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在战略追击阶段西北战场最初两个多月的真实情况。

要尊重历史，就不能把全国战略追击阶段的“秋风扫落叶”“风卷残云”的基本特点，简单地套用在西北战场身上；就必须承认西北战场还有过战略决战；就不能报喜不报忧，只讲第一次出拳和第二次出拳，对中间的收拳或胡马的疯狂反扑则羞于启齿或一笔带过。

要尊重历史，还要尊重作战对手。毛泽东从不轻视作战对手，即使在全国战略决战之后，他也一再告诫全党：“南京、武汉、西安等处还有几个大仗要打。”“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在陕中战役和扶眉战役期间，毛泽东、中央军委与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等之间来往的电报就达几十封之多，足见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西北大决战的重视。

西北的战略决战，又不同于辽沈、淮海、平津战役那样的全国战略决战，只是局部战场的战略决战，自不待言。

解决了长期制约西北战场的瓶颈问题

由于解放战争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最后决战，双方都是全力以赴。在西北战场上，为了实现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驱逐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的战略目的，蒋介石不仅派胡宗南率大军进攻陕北，还

把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的部队也调来参战，使西北战场的形势更加严峻。

胡马深知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道理，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结成了生死联盟。尽管马受攻时胡必然援马，胡受攻时马未必援胡，但胡马联盟给西北野战军造成了相当的困难和危害，使西北野战军的多次重要作战行动难以完全实现预期的作战目的，甚至功败垂成。

1947年6月，西北野战军进行陇东战役打击两马时，“胡军积极支援”。由此，胡马配合作战、联合反扑初露端倪。

延清战役后，鉴于榆林只有左协中的第二十二军9000余人驻守，而中共中央在米脂、绥德一带不安全，为解除后顾之忧，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于1947年10月下旬发起了第二次攻打榆林战役。彭德怀原以为“马军不会怎样积极增援，胡军来不及”，不料绥远的邓宝珊率整编第十七师6000余人从包头南下增援，马鸿逵部3.5万人从三边倾巢而出驰援榆林，蒋介石、胡宗南出动大量飞机为其守军、援军空投粮食、弹药。尽管西北野战军于11月15日在元大滩歼灭宁马3000余人，但其主力仍然绕道进入榆林，使西北野战军的二打榆林遂被迫停止。

宜川战役后，西北野战军包围洛川，准备围城打援。但狡猾的裴昌会率部到宜君后静观其变，迟迟不动。在打援不成、部队缺粮的情况下，为缩短西北解放战争的进程，彭德怀于1948年4月中旬指挥西北野战军发起西府陇东战役。彭德怀当时的作战企图是，“第一步建立麟游山、千山山脉根据地，并从外线的进攻中达到收复延安，夺取洛川，巩固黄龙新解放区的目的。第二步即是依靠麟、千山脉根据地北出平凉、固原，速达收复陇东、逼退三边之敌”。当西北野战军攻占宝鸡之后，“胡宗南采取了异常迅速的手段，从延安、主要是从河南调集最大的兵力，和青海马继援部一起向我夹击。我撤出宝鸡后，

搞得很疲劳，因为过度疲劳，使本来可以歼灭之敌而未能歼灭。”由于胡马联合反扑，使西府陇东战役只完成了一半任务，即光复了延安，夺取了洛川，巩固了黄龙解放区，而未能完成建立麟千根据地及收复陇东、三边的任务，并使西北野战军“遭到了不必要的损失，增加了疲倦，把新的战役推迟了一两个月，同时增加了黄龙群众数万石粮食的负担”。

1949年2月17日，彭德怀离开西北前线，前往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次日，张宗逊等按照与彭德怀商定的作战部署，率领第一野战军发起1949年春季战役。此次战役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就粮区，以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因储备的粮食只能吃到2月底。部队一度攻克铜川、耀县、蒲城、富平、大荔等地。为了与解放军争夺粮食，胡宗南部除早已把大荔等地的粮食运走之外，还联合青海马继援部发动联合反扑，使第一野战军于3月下旬基本上退回到原来的位置。

在陕中战役期间，胡马又进行了第5次联合反扑。彭德怀本想保持泾渭三角区，以尽可能多地为入陕大军争取粮食。但在胡马联合反扑之下，只能忍痛放弃泾渭三角区，退守渭南泾北。

纵观整个西北解放战争，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胡马联盟是长期制约西北战场的瓶颈问题！不粉碎胡马联盟，打掉这只进军西北的拦路虎，西北战局就无法打开！

扶眉战役彻底粉碎了胡马联盟！使之分置南北，再也无法直接联合起来兴风作浪！

尽管在1949年8月26日第一野战军主力解放兰州的当天，胡宗南曾派出部队分兵两路企图攻占天水 and 宝鸡，但在周士第第十八兵团主力于30日攻占秦岭主脉东河桥隘口后，其两路援军遂纷纷后撤。所以，胡宗南部的这次进犯，只是对青马的覆灭表示哀悼而已！

铺平了进军西北、西南的道路

早在全国战略决战期间，即 1948 年 12 月 12 日，毛泽东就有了徐向前、周士第兵团参加西北作战后还要南下川北的考虑。此后，毛泽东与彭德怀多次谈过这一问题。毛泽东的基本考虑是，华北第十八、第十九兵团于太原后加入西北战场作战，待胡马主力歼灭后，第十八兵团由贺龙率领南下川北，配合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解放西南，第十九兵团则准备随时增援华北，防止美蒋袭扰天津、秦皇岛等地。

由于胡马联盟在扶眉战役中被彻底分割，无论是单独对胡、对马，第一野战军都是绝对优势。

因此，扶眉战役后，第一野战军已经开始了某种程度的分兵：彭德怀率野战军主力发起陇东追击战，在固关地区消灭青马骑兵第十四旅和第二四八师骑兵团大部共 1 万余人，直逼兰州城下，1949 年 8 月 26 日解放兰州，接着解放了青海、宁夏，促成了绥远和平解放，并准备进军新疆。与此同时，除第六十二军作为野战军主力的预备队以后归第一兵团指挥进军青海外，第十八兵团主力位于宝鸡，防御胡军进犯，并为南下川北做准备。随着兰州战役的胜利，第六十二军南下归建，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分兵。1949 年 11 月 1 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发起进军西南作战。第十八兵团于 12 月开始尾随胡宗南部南下，最后与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相配合，把胡宗南等部歼灭于成都地区。

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扶眉战役为肇始的。

所以，扶眉战役为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西南铺平了道路！

总之，扶眉战役是西北战场的战略决战及对胡马的致命一击，使第一野战军从此踏上了胜利的坦途，顺利地向西北、西南展开战略追

击!